毛泽东
哲学思想史

庄福龄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二卷

本 卷 作 者

- 第六章、第九章　　余品华
- 第七章、第八章　　丁世尤
- 第十章、第十一章　　黄文松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第二卷 目　录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条件……（351）
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面经验的哲学总结……（352）
二、分析和解决抗日战争空前尖锐和复杂的矛盾的需要……（354）
三、三十年代国内新哲学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前提……（356）
四、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和几本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翻译出版……（361）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哲学活动……（369）

**●第二节　《实践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375）
一、对实践范畴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发……………（376）
二、全面和集中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第一
的地位和作用……………………………（380）
三、深刻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385）
四、明确提出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388）

●第三节　《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和对唯物辩证法的
发展……………………………………（390）
一、全面、深刻地阐发了“矛盾”概念……………（391）
二、明确提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398）
三、系统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407）

●第四节　《两论》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413）
一、对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理论总结……………（413）
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
的主导地位……………………………（416）
三、提供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和融
合的宝贵经验……………………………（418）

第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展开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抗日战争的特点
和规律……………………………………（422）
一、揭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分析“亡国论”与
“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422）
二、唯物辩证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发展

阶段……………………………………………………（ 427 ）

●第二节　运用矛盾转化原理提出军事战略的转变…（ 432 ）
一、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客观依据………………（ 432 ）
二、正确处理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辩证关系，把游
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439 ）

●第三节　论述抗日战争中诸矛盾的辩证关系………（ 445 ）
一、战争与政治……………………………………（ 445 ）
二、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 447 ）
三、防御与进攻……………………………………（ 449 ）
四、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 452 ）
五、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 453 ）
六、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456 ）

●第四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461 ）
一、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决定力量……………（ 461 ）
二、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 464 ）
三、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
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467 ）

第八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
运用和展开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哲学思想…………（ 470 ）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 470 ）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479 ）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
辩证统一……………………………………………（485）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哲学思想………（49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491）
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阐明中国革命的
性质、对象和任务………………………………（496）
三、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制
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498）
四、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
阐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501）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丰富和发展………（504）
一、毛泽东伦理道德思想的产生和发展……………（504）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
想的核心…………………………………………（506）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512）
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的伦理思想………（517）

第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521）
一、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一个伟大创造……………（521）
二、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527）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革命文艺领域中的运用（535）
四、刘少奇对王明主观主义的批判…………………（540）
五、《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主观主义的
总清算……………………………………………（543）

●第二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545）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过程………………（546）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命题的丰富内涵…………（551）

●第三节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554）
一、毛泽东历来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重视哲学原理或思想路线转化为方法和工具的功能和作用………………………………………（555）
二、整风运动不仅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要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557）
三、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559）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566）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过程………………（567）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过程…………（574）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条件及意义………………………………………（577）

第十章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及其哲学基础

●第一节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及其唯心主义哲学…………………………………………（581）
一、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582）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化、系统化。《中国之命运》的发表……………………………（58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唯心论哲学的批判…………………………（592）
一、对《中国之命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594）
二、对唯生论的批判…………………………（597）
三、对力行哲学的批判…………………………（600）

●第三节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的哲学思想…………………（607）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608）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客观依据…………………………（611）
三、唯物辩证地分析了两种可能性，论述了争取光明前途的条件…………………………（613）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新中国制定革命纲领提出战斗任务…………………（614）
五、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而奋斗…………………………（617）

第十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哲学分析…………………………（621）
一、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622）
二、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625）

三、进步的光明的历史总趋势……………………（631）

第二节　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634）
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635）
二、十大军事原则与战略战术的新发展……………（639）
三、坚持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645）

第三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648）
一、第三条道路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648）
二、毛泽东对美国《白皮书》唯心史观的批判……（654）

第四节　揭示民主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665）
一、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666）
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思想…（669）
三、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673）

第五节　建国前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678）
一、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678）
二、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辩证统一…………（682）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684）
四、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消亡……………………（687）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第二卷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重要标志

1937年开始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最活跃、最丰富、最生动的一个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下称《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理论高潮，其特征是自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两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硕成果和结晶，又是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纲领性文件。《两论》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日趋成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面经验的哲学总结

哲学是更深层、更高的理性思维的抽象，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从思想路线、思维方式方面，概括和总结人类认识的经验教训。因此，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归根结底离不开实际经验的积累，离不开各方面具体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正反面经验的比较和总结。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积累，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成熟奠定了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蒋介石的叛变，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路线。经过全党努力，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国革命从失败重新走向了胜利。但是由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再一次陷入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因而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胜利到失败主要由于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胜利到失败则主要由于“左”倾错误。两次失败归根结底都由于错误的思想路线。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的比较，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飞跃，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同时也认识到，能否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特别在“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两次总结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经验的基础上，党具备了更深刻的哲学反思的条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革命战争终究离

不开人去参与，去指挥。人的认识正确与否，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往往决定着革命行动的正确与否。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必然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基础。要彻底克服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不但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以批判，而且还要从理论上、哲学上进行清算，也就是从认识路线，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根本的批判。

《两论》是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成果。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就开展了调查研究，从理论上、哲学上论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思想路线”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提出“洗刷唯心精神”，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实质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提到了认识路线的哲学高度。1935年毛泽东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内外各种矛盾问题。1936年11月，他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论述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问题，成为《两论》的先导。随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又直接运用矛盾学说分析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所有这些方面的哲学总结，都为《实践论》、《矛盾论》的产生，从理论上作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

可以说，没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两次胜利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就不可能产生《实践论》和《矛盾论》。对此，1962年毛泽东曾说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

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

二、分析和解决抗日战争空前尖锐和复杂的矛盾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矛盾的集中反映。为了做到象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所要求的“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

伟大的抗日战争实践对《两论》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

一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胜利解决，提供了处理矛盾的丰富经验。

西安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毛泽东正在抗大讲课，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雏形）。西安事变突出了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矛盾面前，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又提供了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它的成功经验，因之成为《两论》写作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是从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而抗日战争又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被压迫受奴役走向全民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进行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表明中国矛盾的复杂性和变化多端性，表明各种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决定着形势的发展。分析形势就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5页。

要善于捕捉主要矛盾，分析其变化。党中央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左中右三翼的变化，分析了张学良从大资产阶级代表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的代表这一变化，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来了抗日的高潮。西安事变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驾御局势，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和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高超领导艺术。正是在西安事变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文中提出矛盾概念达二十八次之多）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文中提出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突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成为《矛盾论》、《实践论》的直接前导。

二是抗日战争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日益发展，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的过程，战争的实践是最重要的革命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也主要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直接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的同时，也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1936年秋，他从哲学高度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以《军事辩证法》为题，在当时延安红军大学作了讲演，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后的《论持久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系统化，从而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要求革命理论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在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大党，必须公开系统地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纲领政策，回答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指出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特别是西安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升级，抗日战争面临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局面。在新的考验面前，如何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如何科学预见战争发展的全过程，这些问题都尖锐地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要求在总结前两次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分析，使革命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特别是要求把党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使全党能在复杂的形势中清醒地、自觉地进行工作。

三、三十年代国内新哲学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前提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国内开展了新哲学运动，它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所谓“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重点已从唯物史观转到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了。

艾思奇把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的风行，称作是迎来了“哲学的新时代”。这一哲学思潮如狂风暴雨，“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

①《艾思奇文集》，上卷，66页。

学问的基础。”①唯物辩证法思潮这时出现，并非偶然，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作过分析。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马列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注：指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出现了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变为广大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的努力。

此时不仅翻译出版的哲学原著增多，而且翻译出版了苏联三十年代的几本哲学教科书。特别是，出现了中国人用中国语言、中国实例自行撰写的“善于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和教科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真正发挥社会功能、科学功能和认识功能的作用，就必须为中国更多的人所掌握。这就需要有一些大众化的读物，有一些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既能简明扼要，又能深入浅出地阐明大量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艰深的、抽象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步虽仍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但与一般的宣传和介绍相比较，无疑又有长足的进步，因为它已开始结合中国的情况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三十年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优秀代表是艾思奇和李达。艾思奇在三十年代就尝试用中国事例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尽量贴近中国人民的生活。1934年11月他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以后一

①《艾思奇文集》，上卷，66页。

年在《读书与生活》杂志上共发表二十四篇哲学文章，后结集成《大众哲学》（《哲学讲话》）。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则如毛泽东称赞的那样，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本哲学教科书”。

艾思奇为使哲学更加贴近抗战的生活而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大众哲学》正是为了满足当时广大青年要求认识救国救民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的迫切心情。它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确解答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问题，用群众最切身的失业、失学等例子，讲述在现实面前，有人抗争，有人畏缩自杀，是因为世界观不同，因此哲学并不神秘，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它还用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七十二变”以及“猫哭老鼠”、“笑里藏刀”、“在劫难逃”等生动比喻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本书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人民生活结合的最初尝试，因此出版后受到广大知识青年热情欢迎，两年内再版十次，不少青年甚至通过它走上革命道路。

艾思奇的另一本书《哲学与生活》较之《大众哲学》理论性更强。1937年9月，毛泽东对它进行了摘录，共三千字左右，并致信艾思奇，表示“我读了得益很多”，还就差异是否矛盾的问题，和艾思奇进行商榷。艾的第三本书——《思想方法论》于1937年1月第二版，毛泽东不仅读过，还写了文字批注。

艾思奇这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探索和哲学实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一正确方向的可贵尝试，对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讲哲学、写作《两论》有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的新哲学运动为《两论》写作作了思想资

料准备，打下了理论基础。毛泽东1936年10月给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去电，提出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之用”①。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三十年代新哲学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它于1937年5月首次出版。毛泽东前后读过十遍，认为在十年反动时期有这样一本书是难得的，并推荐给抗大等校使用。毛泽东还写信给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这本书对毛泽东写作《两论》也有一定影响。毛泽东的《讲授提纲》在总体框架上和它有一定近似之处。虽然现在还很难断定，毛泽东写作《讲授提纲》（《两论》初稿）时是否已读到此书，但考虑到《两论》有一个修改过程，从思想观点的借鉴上看，是可能有影响的。

《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内容作了全面介绍，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论述的科学性、系统性、深刻性和明晰性，在当时国内哲学界是少有的。它的出版表明此时中国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二十年代偏重唯物史观，进到对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掌握。从全书的结构、体系和内容来看，它较好地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论理学（逻辑学）三者的一致。它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掌握，还力图从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一致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是以前一切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所没有做到的。书中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在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包摄着”其余诸规律和范畴。

①《毛泽东书信集》，60页。

此书和《大众哲学》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了把哲学交给群众的必要性。在序言中李达说，这本书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际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①

但是艾思奇、李达等人限于自身的条件，不可能从更高的要求上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们还没有解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此艾思奇自己有过正确的评价和总结。他说："辩证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而且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②他还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小），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③

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这一工作是由毛泽东在延安写作《两论》及其它著作而成功地实现的。

①李达：《社会学大纲》，第5页。
②《艾思奇文集》，上卷，第552页。
③同上，第387页。

此外，三十年代围绕唯物辩证法问题开展的哲学论战，也促进了新哲学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在新哲学论战中以叶青、张东荪等为一方，以艾思奇、邓云特（邓拓）为另一方，就辩证法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论战，其中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反映论与实践论在认识中的关系和地位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列宁哲学思想的地位问题等等，又都与苏联批判德波林派有关。中国的这场论战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为毛泽东写作《两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毛泽东的《两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场论战的总结。

四、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和几本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1930年——1931年苏联开展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并持续到1936年。这一批判不仅对苏联国内哲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引起一定反响。

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对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情况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通过三十年代的新哲学论战，特别是艾思奇在论战中所写的《思想方法论》、《大众哲学》等著作；二是通过苏联三十年代的几本哲学教科书，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新哲学大纲》，它们都是苏联哲学家在批判德波林之后的成果；三是通过翻译过来的苏联的一些批判文章。

关于当时对德波林的批判，1960年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一卷"德波林"条目指出，德波林著作的特点是：哲学理论脱离实践，低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革命转变的意义，低

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等等。

毛泽东写作《两论》，接受和参考了苏联的批判的一些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吸收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理论与实际分离、哲学与政治分离的错误的论点。这一批判论点，适应了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需要，对毛泽东从哲学方法论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动，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毛泽东运用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来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他把德波林唯心主义称作“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把王明教条主义称之为“中国德波林派”，说“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①。他指出，1927年前，中国哲学界对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成分”。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在思想特征上和德波林唯心主义相同。他说：“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②

第二，苏联批判德波林派混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低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根本转变的意义，为毛泽东在《两论》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变革，强调唯物辩证法的特征，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

---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3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德波林等人把辩证唯物论看作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集合体”，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不仅包括其辩证法，也包括其体系。苏联批判他们经常把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相提并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克服并根本改造了旧唯物论和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崭新的世界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总结了苏联和中国三十年代关于辩证法论战的经验。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①。

第三，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低估列宁哲学遗产、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时，强调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重视吸取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德波林派认为，俄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认为列宁主义不过是“政策和策略”而已。

苏联哲学界于1931年后加强了对列宁哲学遗产的研究，在几年时间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论著。毛泽东在写作《两论》的过程中，通过苏联几本哲学教科书和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了解了苏联哲学这一进展，利用了苏联对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深刻的说明和发挥。

当然，三十年代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也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很好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把某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学术观点上的错误同反党倾向和党内路线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和派别斗争、小集团联系起来；批判范围扩大化；在批判中缺乏全面、具体分析，以至有些观点的批判后来走向极端；通过批判导致把斯大林哲学思想定于一尊，过分突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走向斯大林时期的新的教条主义；等等。

不过苏联当时这些错误作法，对《两论》的写作尚未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因为毛泽东批评王明主观主义，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出发，实际上反对的正是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两论》在批评王明的主观主义时，着重于从思想方法论上进行分析，后来又采取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没有采取过火斗争的不正确作法。

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过程中，还加强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写出了一些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其中毛泽东读过和写有批注的，计有三本（至今找到两本）。一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1935年9月中文出版。毛泽东在1936年11月——1937年4月看过该书的中文第三版，并写下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一千二百多字。二是《新哲学大纲》（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毛泽东于1937年8月前读过此书。但他读过的那本书未保存下来，故现在也见不到他的批注。三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著），中译本1936年12月出版，毛泽东阅读时间是1937年7、8月以前，写下了2600多字的批语。

毛泽东阅读苏联这几本哲学教科书，写下的近一万五千字的批语，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笔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它记录了毛泽

东在延安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轨迹，是毛泽东为革命发奋读书和著书的生动历史见证。

这些批语，有的是对原文内容的提要、归纳与复述，有的是对原文观点的评论和质疑，也有的是抒发自己的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还联系中外历史，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对比，对一些重要哲学观点和命题，进行了发挥和发展。

从批语的内容来看，在哲学原理方面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领域。这是毛泽东对这几本书批注的核心和主干。在认识论中，对认识运动的过程和阶段，对主客体辩证关系和实践观等批注较多。辩证法方面，则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内因与外因、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等基本范畴批注较多。另外，从思想方法论角度对各种机会主义和其它错误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加以评析的评语，占有相当的数量。

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确曾从苏联几本哲学教科书中吸取过思想资料，作为写作《两论》的重要借鉴和参考。例如《实践论》中关于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论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最显著特点的论述，关于对旧唯物论的局限性的批评等，都可在苏联这几本书中找到一定的原型。《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观点，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分析以及对外因的批判等等，也都可在这几本书中找到一定的端倪。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就普遍原因来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必然要吸收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思想成果，都要利用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各种思想资料；就特殊原因来说，毛泽东到延安前后虽看过不少马克思主

义哲学经典著作，但由于国民党对延安封锁包围，即使已翻译出版的一些经典著作，有的在延安一时也难以收集到。这种历史条件使得毛泽东当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已经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来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了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研究苏联几本教科书的历史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批注也表明，毛泽东根本不是简单抄袭或搬用苏联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许多哲学思想作了新的发挥，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贯穿《两论》的红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具有中国的重要特色。与苏联教科书相比较，无论在体系上、结构上，还是在理论重点和特色等方面，它们都有明显差别。形成这种总体上差别的基础，是《两论》的写作目的不同，进行哲学总结所依据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文化背景与苏联都不同。

《两论》不同于苏联教科书和一般哲学著作，它有鲜明的直接现实性，有为解决革命现实需要的明确写作目的。它是针对性、批判性、战斗性极强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

《两论》不是书斋哲学，不是学究式的研究或经院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两论》不是为了介绍哲学原理而去联系实际事例，而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革命实践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两论》写作的目的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①。所以《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动，正如艾思奇所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95页，题解附注。

“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①

延安青年哲学家和培元1941年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一文中也说：“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② 这是对《两论》的重大特色的正确评价。

可见，由写作的目的性、针对性和批判性所决定，《两论》在哲学理论上必然有所创新和发展，它不可能和任何一本哲学教科书雷同。《两论》也不是象苏联教科书那样一般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着重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方法和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两论》在理论上突出的重点及贡献，也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独特经验有关。

如果说毛泽东在抗大系统讲授哲学的《讲授提纲》在体系上和苏联教科书还有一些近似之处，那么《两论》和教科书则已完全不同。而且即使是《讲授提纲》也并非编纂、摘录苏联教科书，而是在内容上大量总结中国的经验，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结合中国哲学界当时的争论和中国哲学史，调整了论述的角度和重点。并非如一些人所说，仅仅是加上中国的一些实例。在《讲授提纲》中已经突出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个命题，形成完整独立的体系，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从现有的哲学

①《艾思奇文集》，上卷，387页。
②《中国文化》，第二卷，第2—3页。

原理、公式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两论》和《讲授提纲》其它章节有很大不同，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和独立，都表明了这点。它们已是两个完全展开的独立著作，是在总体上渗透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只有把握《两论》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才能理解它所具有的特色，理解它如何借鉴教科书，而又大大超越教科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践论》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对矛盾，完整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过程，明显地不同于苏联三十年代流行的认识论体系。这同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有关。《实践论》中提出的关于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关于认识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以及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表述，都是苏联教科书所没有的新认识。

《矛盾论》在结构上对矛盾理论进行的层层深入分析，它的各节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将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苏联教科书所不具备的。苏联教科书阐述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但并未对分析矛盾特殊性作出任何说明。毛泽东对矛盾学说作出完整而系统的阐述，是由于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复杂，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丰富遗产。

《两论》的特色与其作者毛泽东的独特实践活动和理论创作活动有关。这也是《两论》根本不可能重复任何其它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既是革命家和领袖，又是哲学家和理论家，他具有苏联哲学家和中国艾思奇、李达等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他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指挥了革命战

争。

他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三十年代共产国际中流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他的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经验，他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些都是三十年代单纯从事理论研究的苏联哲学家所望尘莫及的。

任何一种理论固然要以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但是任何理论观点的形成，又都有自身的思想逻辑发展过程，与主体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密切相关。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独特内容，正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特殊性的反映。因此，反映和总结这种独特实践经验的哲学理论，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和国内外任何一种教科书雷同。

总之，在研究《两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时，既要看到它与苏联三十年代几本教科书的一定联系，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既不抹煞苏联教科书对《两论》写作的一定影响，又不过分夸大这种影响。正确看待《两论》与苏联教科书的关系，不仅涉及如何正确看待《两论》的理论来源问题，而且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总脉络、总线索，才能对此得出正确的结论。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哲学活动

1935年毛泽东到达延安后，立即着手研究哲学。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因而也是理论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毛泽东这时突出研究哲学，除因革命需要外，也由于有如下有利条件：

一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较稳固的陕甘宁根据地，有了一个较安定的客观环境，便于坐下来研究理论。同时西安事

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内阶级矛盾暂时有所缓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的那种反革命围剿已被迫停止。尽管整个中国仍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但陕北较之抗战前线又属于后方，这样毛泽东等人有可能抽空坐下来读书，研究哲学。

二是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大批知识分子从白区投奔延安，使延安汇聚起一批党的理论工作队伍，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在抗大等校向干部讲授哲学，一方面对中外哲学史和中国革命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这支队伍在延安出现，便于毛泽东集思广益，切磋琢磨，集中全党智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是经过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国内几次哲学大论战，特别是艾思奇和叶青等人的辩证法论战，加上苏联三十年代反对德波林派斗争的影响，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这成为在延安掀起哲学高潮，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过渡到“掌握具体的、中国化的、带着中国民族特征，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①，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正是上述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使得毛泽东得以完成《两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更加紧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活动，包括他个人研究哲学、讲授哲学和写作《两论》的过程；二是毛泽东组织党政军一批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在延安掀起“新哲学运动”，成立“新哲学会”的过程。

---

①《艾思奇文集》，上卷，592页。

毛泽东到延安后首先广泛收集哲学书籍，刻苦攻读。1936年9月他和周恩来等人致电彭德怀、李富春等人，建议在延安组织流动图书馆，每十天交换图书一次。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在1936年6月至10月发愤攻读哲学书籍的情形。毛泽东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也读古希腊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他特别重视马、恩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他在土地革命中攻打漳州得到一本《反杜林论》，始终随身携带。在读哲学书的过程中，他在延安写下了八本书的批注，计二万余字；同时还写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三千字及《读书日记》近千字。从1936年11月至1941年秋近五年中，他刻苦钻研哲学，是他哲学思想飞跃发展的五年。

毛泽东在延安重视读书，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的需要，特别是和党内教条主义斗争的需要。由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讥讽"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实践为"狭隘经验论"，所以毛泽东说，到延安后，他就"发愤读书"。1938年初，他在致艾思奇的信中说："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①1939年初，他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又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②这表明他刻苦钻研哲学的意愿和决心。

毛泽东不仅自己钻研哲学，而且在1937年4——7月还亲自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处，向干部和学员讲授哲学，共计一百多个小时。只是因"七·七"芦沟桥事变，这一讲课才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118页。

②同上，136页。

中止。根据当时听课同志的回忆，他的课不仅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且从脍炙人口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中，引用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用以说明艰深的哲学道理，做到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使听众不时发出掌声和笑声。

为了讲授哲学，他于1937年7、8月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虽然它仅是一个讲课或研究提纲，但包括丰富的内容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它共分三章，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唯物论”，共分十一个专题，包括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及实践论等内容；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法则，即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同时论及辩证法诸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后来在审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重点整理了这个提纲中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和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两节，形成《实践论》和《矛盾论》两个独立的哲学名篇。

《讲授提纲》在1949年前已广为流传，多次印行出版。最早是1937年9月延安的油印本，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接着1938年广州半月刊《抗战大学》从第一卷第六期起分期连载（铅印），署名“毛泽东主讲”；1940年和1942年又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分别出版；1946年上海中国书店和大连大众书店也都曾公开署名印刷发行。据斯诺回忆，1938年他还曾看过《两论》手抄的翻译稿①。

1950年《实践论》重新发表时，在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上，都保持了《提纲》中的原貌，只在数字、条例或解说方面

①见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附录。

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共五处）。《矛盾论》在重新发表时，较之《提纲》中"矛盾统一法则"一节，修改的稍多些。除增加了原稿中没有的一些新观点，删去了一些不准确的部分和一些例子之外，主要是使原稿中已有的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深刻和完整，并明确提出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总之，后来重新发表的《两论》，在框架结构和基本观点上都是1937年原稿所具有的。如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的过程以及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具体把握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正确认识和区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等思想，都是原稿中具备和奠定的。这表明毛泽东在1937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哲学理论水平。

毛泽东在延安从读哲学书、写批语到写作《讲授提纲》，最后形成《两论》，大约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在自己钻研哲学的同时，也组织身边的同志学哲学。1937年底，他首先在杨家岭自己的办公室内，组织身边的同志学哲学，每周一次。后来一些高级干部如朱德等也来参加，最多时人数近二百人。在他的带动下，延安很快出现了学哲学、学理论的热潮。1938年6月毛泽东还在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①。

为了修改好《两论》，同时也为了推动全党学哲学，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六人哲学小组，重点讨论《矛盾论》，也讨论《实践论》问题。参加者除毛泽东外，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杨超。据杨超回忆，凡有关《两论》的指导思想和重大问题如矛盾的发展、主要矛盾、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522页。

盾诸方面、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等观点，在讨论中都有所涉及。毛泽东根据讨论的意见对《两论》进一步进行修改。例如在《矛盾论》初稿中有“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矛盾阶段”这一小标题，后来在定稿时他吸取大家意见，取消了“主要矛盾阶段”的不确切提法。

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毛泽东还建议成立“新哲学会”。1938年9月30日由艾思奇、何干之等十八人发起，在《解放》杂志第53期上登载了《新哲学会缘起》。《缘起》强调，抗战的伟大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救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

为了宣布“新哲学会”成立，毛泽东提议召开並亲自参加“新哲学会”的成立会。1940年6月在延安又召开了“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毛泽东再次出席。他在讲话中总结了两年来“新哲学会”的成绩，强调中国革命进行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一大缺憾。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哲学会”的成立，对推动延安掀起学哲学热潮起了积极作用。1940年党中央建立了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各单位都成立了学习小组。1940年朱德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曾指出，“新哲学会”的成立，引起了前线和后方研究新哲学的兴趣。两年来辩证法大大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哲学。许多干部现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①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延安的哲学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1）把读书、批注、讲课和写作结合起来，使研究哲学和

①《解放》周刊，第110期。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成为统一的过程；

（2）个人研究哲学和组织党政军干部大家学哲学相结合，使哲学从书斋中解放出来，为广大干部所掌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现实化、具体化紧密联系；

（3）个人写作《两论》和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相结合，实际工作者和哲学专业工作队伍相结合，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4）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贯穿《两论》，贯穿全部哲学活动的红线，进一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要求；

（5）《两论》的完成，既是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的丰硕成果，又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起点。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完整地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程中，以及写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全面展开和发展。

第二节 《实践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实践论》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从而阐明、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论》的根本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性、自觉的能动性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和中心线索，对实践的含义和内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作了深刻阐述，建立起一个以社会实践为中心的认识论体系。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实践范畴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发

在人类认识史上早已提出过什么是实践的问题，但真正形成科学的实践观和实践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

过去哲学史上对实践的理解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唯心主义把实践理解为纯粹的精神活动，或则认为是道德修养活动，或则认为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例如中国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把"行"（实践）看作是一种意念，把意志的决定、意念的活动都看作"行"。这样他认为实践就等同于思想（知），因而"知行合一"。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看作向绝对真理的过渡。他同样认为实践不是物质活动，而是逻辑观念、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活动。黑格尔将观念分为"实践的观念"和"理论的观念"两种，认为"实践的观念"是"向善的观念"。"善"就是绝对性、普遍性、现实性。由于"实践的观念"具有这种品格，因此它高于"理论的观念"。

旧唯物主义者如费尔巴哈虽然承认实践是人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虽然把"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①，但是他却把实践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②，或者理解为日常生活上的个别交往活动，看不到社会的实践。他把实践只看作一种感性活动，而非理性活动，"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实践，看不到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的能动活动，因而他轻视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

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范畴。马克思在探索历史活动的客观基础时，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合理思想，创立了崭新的社会实践观。他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从而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①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已突出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实践观点。他把实践不仅规定为人的物质的活动，而且规定为革命的、主观能动的活动。他把实践理解为社会的实践，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突出实践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列宁在二十世纪初继续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他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观点。”② 他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实践是人们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针对黑格尔的观点，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③。

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在《实践论》中，他对实践这一范畴作了系统阐述：

他首先指出，实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认识论范畴，是认识论的最基本范畴。他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对待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的根本区别。

其次，他明确指出实践的特性不仅是客观的、感性的或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观的活动，而且是“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也就是说，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它是能动不是受动；是主动不是被动；是客观活动，但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感性活动，但又是理性活动。

实践是一种同主观认识相区别的客观活动。但是实践活动又不同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的运动过程，也不同于动物的行动。它是主体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正在于能够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

第三，他全面阐明了实践的社会内容，指出实践是社会的活动，是包括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一切领域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类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

毛泽东强调实践不是个人彼此孤立的某项活动，而是“变革”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是“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是“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等等，强调了实践的社会性。

第四，进一步界定了实践的范围和形式。毛泽东指出，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是三大革命实践，即生产斗争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他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分别论述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但是把它们统摄于社会实践之内来加以完整地论述，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21页。

义认识论的一个贡献，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辩证统一。

第五，他指出实践的历史性。实践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而每一次实践都比前一次更高级、更有所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最后，毛泽东把认识论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结合在一起，阐明了社会实践的群众性。既然实践是社会的实践，因此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正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创造的。社会实践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实践的社会性、群众性，逻辑地包含着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这样毛泽东就把认识论的实践观和党的群众路线融为一体。

毛泽东的实践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总结；又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问题的长期争论的解决；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的哲学体现。

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实践范畴，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年代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需要，即反对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轻视实践，轻视各国革命具体特点的需要。

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指示神圣化的倾向。中国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特征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轻视实践，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教条

主义者动辄以“拿本本来”为口实，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同时以小农意识为基础的狭隘经验主义也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正是为了从哲学认识论根源上分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危害。

《实践论》突出“实践”范畴，又是对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是对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到孙中山关于知行问题的理论总结。知与行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命题之一。自《尚书·说命》提出“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后，先秦孔墨诸家都阐发过自己的知行观。到宋明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王阳明等人，对这一命题更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朱熹提出知为先，行为后。王阳明则提出以心本体论为基础的“知行合一”说。明末清初顾炎武进一步提出“经世致用之学”，王船山则提出“先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把格物致知和履践力行联系起来。颜元则讲求习行哲学。颜元的《日知录》，反映了他“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的实地考察精神。现代的孙中山也对知行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提出“知难行易”说。毛泽东的《实践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上述诸人的知行观，但却多次直接使用“知行”这个中国哲学史上习用的哲学范畴，反映出他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特别是1951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一个副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立意解决中国哲学史上这一长期争论。

二、全面和集中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第一的地位和作用

《实践论》以实践为基本线索贯串认识诸问题——认识的基础、源泉、动力、目的以及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形

成一个关于实践的系统观或系统的实践观。

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

认识的源泉问题，即认识从哪里发生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主义者。"① 他指出，实践是认识得以发生的最初动因。"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②

"认识从实践开始"，因为认识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但客观事物只有成为实践对象时，才能进入认识的领域。人们只有通过变革客观事物的实践，才能接触到它的现象，进而暴露其本质，认识其规律。"无论什么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③ 所以实践是人脑和客观事物的中介，是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活动。离开实践，认识就无从发生。我们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正是说实践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而且是推动认识不断前进的动力。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实践的发展使新情况不断涌现，向人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要求，推动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新的认识。没有社会实践的新发展，不可能有认识的新发展。毛泽东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26页。
②③同上，129页。

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在《哲学批注》中，他又说，党对“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①。“我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属性问题、军事问题[认识]的发展，由于实践的发展”②。

第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给人们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工具，促使认识不断深化。以社会历史的认识为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③。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④

鉴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割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特别批评了教条主义式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抽象的无目的的，因而这种认识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是毫无意义的。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第一的地位和作用，还在于只有人们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3页。

②同上，第4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121—122页。

④同上，第131页。

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探讨过真理的标准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①这就是说，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不是在思想理论范围内能争论清楚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恩格斯也说，"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生活中，在实践中，在劳动中"②。列宁也专门论述了"认识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他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标准"③。"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④。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深刻阐述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针对王明等人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拿本本来"以及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等"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他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⑤，从而突出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

实践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既是由实践的特性，也是由真理的本性决定的。毛泽东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有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②同上，第3卷，387页。
③《列宁全集》，第14卷，227页。
④《列宁选集》，第3卷，39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122页。

接现实性的品格”的思想，指出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但是思想认识本身没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就是说思想对外界的反映是否符合外界现实，思想意识自身不能自行验证。客观世界本身也不能直接回答人们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因为实践的特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的这种特性和优点，是它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主要依据。

毛泽东还发展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的思想。他着重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论述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此外并无其它标准，这是真理标准的绝对性、确定性。它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划清了界限。但是社会实践不是僵死不变的。任何实践都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因而有历史性、局限性、不确定性。所以不能以一次社会实践的成功或失败来评价认识的真伪性。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实践的反复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社会实践是一个过程，检验真理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

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同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学说作了全面的发挥。他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指出真理是在同谬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还着重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把绝对真理比为一条“长河”，而相对真理则是这个长河中的水流。“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他指出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没有终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

路”①。

毛泽东对真理观，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发挥和发展，深刻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经过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真理，而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王明教条主义的谬误，则是断送中国革命前途的。

三、深刻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过程论思想贯串毛泽东认识论的始终，体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人们在实践中，主客观矛盾怎样趋于统一，经过怎样的途径趋于统一，对此马克思没有作更多的专门论述。恩格斯最先提出辩证的过程论思想。他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②。他还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③。

列宁进一步对认识的过程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认识的过程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④。但是怎样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怎样又从抽象思维到革命实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9—240页。
③同上，第3卷，63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181页。

的飞跃，列宁对这一具体过程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完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分析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他从过程论角度对认识进行分析，即强调认识的发展和历史性，这是他分析认识过程的基本前提。

从毛泽东1936年11月——1937年4月读《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的批注可以看出，他是从过程论角度来摘引书中的一些观点，并写下许多有关过程的论述，例如，“如不具体研究过程，无法了解对立的同一性即相互渗透。”“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它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①等等。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他指出，认识不是无运动的、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的运动过程中。他着重批判了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观点，指出它们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在真理问题上他也贯串过程论思想，指出旧哲学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所以毛泽东的过程论的认识论，是辩证的认识论和认识的辩证法的统一。

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得到发展的”。因此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他提出了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在过程中又区分出不同的阶段，明确指出人类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组成。他论述了人怎样从不知到知的过程，分析了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理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1页，42页。

论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等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趋于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还分析了从感性认识阶段飞跃到理性认识阶段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只有感觉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①；二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六个字表明透过现象，揭示事物本质的科学抽象。

但是，达到了理性认识，认识过程还未完结，还需要第二次飞跃，这就是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个过程就是用理论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性。鉴于王明教条主义者只知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他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更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最终达到认识的目的——改造世界；同时也只有这第二次飞跃才能检验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是正确还是错误。

毛泽东关于认识的过程论思想，从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上，揭示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唯心主义根源。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他说，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去找寻，离开认识的过程，不可能解决此问题。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其根源也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去找寻。这正是他突出强调认识的过程论的重要原因。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67页。

四、明确提出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

毛泽东提出认识的“过程论”，正是为了研究认识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矛盾如何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认识论的主要问题。这一基本矛盾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又不断得到解决。明确提出这一解决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同一”过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贡献。

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个结论是贯穿《实践论》通篇的中心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毛泽东提出这一结论不是偶然的，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哲学批判。他指出，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都是离开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特征是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把幻想当做真理。如王明看不到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国家。他照搬十月革命经验，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不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发动苏联那样的十月革命，因而犯了认识超越实践的急躁冒进错误。右倾错误同样离开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变化　如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在于看不到当时世界已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

已经从理论到实践；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诞生，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其思想仍停留在旧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上，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不能由无产阶级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结局是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过漫长时期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不能随实际的发展，而提高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民主革命的水准上来。

毛泽东从认识路线、认识的方法论高度，对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的完备、深刻、犀利的剖析和总结，在各国党内、各国革命过程中都是罕见的。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体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对"左"、右倾认识根源的分析，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对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下称《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都读过多遍，下功夫也最大。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毛泽东曾寄给他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彭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在书上他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①

另据在延安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上述列宁这两本书，并写了一些批语。1942年延安整风和1948年解放战争中，他又提倡全党来读。列宁在这两本书中侧重于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战略上分析"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则着重从哲学认识论高度进行分析，因而具有更浓厚的哲学色彩，从而使《两论》成为总结"左"右倾错误的

①《彭德怀自述》，第183页。

专门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和论述认识论的各个问题时，特别可贵的是提出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这个总规律是毛泽东关于认识的过程论的更高概括和抽象。认识的过程论思想就是认识中矛盾展开和解决，在实践中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这个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有其发展的总规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列宁等人所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认识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指的就是认识运动的"全部"的即总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性。它是《实践论》所阐述的中心和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个结论，是对列宁《哲学笔记》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认识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它实现了列宁所未竟的揭示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任务。

第三节 《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着重阐述了对立统一思想，并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的基本方法。列宁在《哲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73页。

学笔记》中进一步提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毛泽东继续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这一"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在继承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基础上，《矛盾论》全面论证和进一步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了当时堪称最严整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体系，并对它作了系统阐发和论证。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独立地探讨唯物辩证法的成果，是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

在《两论》写作之前的读书批注中，毛泽东已突出地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其它规律和范畴。《矛盾论》进一步把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的丰富内容，按其内在逻辑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首先从宇宙观的高度，阐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概述了两种宇宙观的发展过程，接着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体系之完整和科学，结构之严密，内容之丰富和深刻，文字之简洁和明晰，都是当时国内外哲学著作中少有的。它对对立统一规律所作的创造性的、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反映了人们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客观辩证过程，体现了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三者的统一。

《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是：

一、全面、深刻地阐发了"矛盾"概念

①《列宁全集》，第38卷，240页，

“矛盾”这个哲学术语是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基石和核心概念，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整个体系乃至他的政治和革命活动的理论基础。

“矛盾”范畴来自中国古代哲学。二千多年前的《庄子》篇，记述一个卖矛和盾牌的人，自夸他的盾好，没有什么东西能戳穿它，同时又自夸他的矛好，能刺穿任何东西。有人问道：“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若何？”这一寓言初次提出了矛盾和逻辑矛盾的含意。

毛泽东讲述对立统一规律，以《矛盾论》为篇名，标题就带有民族特色。中国的《易经》在东方最早提出对立统一思想，它用八卦形式推测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也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些朴素辩证法的命题已朦胧地猜测到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矛盾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道德经》列举了大量的对立面的同一，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孙子兵法》更是包含丰富的敌我双方攻守的矛盾思想。韩非在他的《难一、难势》中也已开始用“矛盾”来表述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

“矛盾”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多义词：一种含义是指“互相对立”和“逻辑上不相容”，即二律背反的意思；一种含义是指“既对立又统一”，即相反相成的意思。“相反相成”来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

来，获得了同一性。”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之类，表明两个矛盾的方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互相补充的关系。“矛盾”一词还有一种含义是指“相对立又相互转化”，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包含着相互依赖又相互转化的关系。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曾读过《易经》、《道德经》及先秦诸子典籍。在他1914年写的《讲堂录》和1917年写的三篇早期著作中，提出“差别”普遍存在，“抵抗”（对抗）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强调发挥内因的作用等等。他参加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更自觉地继承和改造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已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分析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批判了革命队伍中的悲观思想，作出了革命高潮必将来到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更大量地运用“矛盾”范畴，是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间必然爆发明争暗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指出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②，从而明确地把“矛盾”范畴运用到认识领域。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34页。

②同上，第163页。

他在抗战前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以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文，还深刻分析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情况，指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范畴，对矛盾范畴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矛盾是一个动态复杂结构。在《矛盾论》中他指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①1937年9月他在《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中又指出："差别就是矛盾。"1942年他还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指出了矛盾贯串一切事物和过程始终的普遍性。总之，"矛盾即现实"，"矛盾即存在"，一切存在无不是矛盾。

"矛盾即是运动"。无论是就简单运动还是复杂运动来讲，运动都是矛盾，矛盾也都是运动。简单的机械运动就是事物同时在这点上又不在这点上。高级的生命运动就是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己，同时又不是它自己。

"矛盾即是事物"。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也就是说，内部都包含矛盾结构即对立的两方面。任何事物不仅有内部矛盾还有外部矛盾即外部联系。所以事物是一个矛盾复合体，是矛盾的系统、动态关系系统。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

"矛盾即是过程"。过程是矛盾的逐步展开，是矛盾的发展史。毛泽东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任何过程包含着新与旧的矛盾，"旧过程完结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94页。

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①]无论是量的发展还是质的发展，都是运动和矛盾发展过程。

“矛盾即是思想”。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思想就是主观矛盾的展开过程。人们的思想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客观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因之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思想）也必然充满着矛盾运动。“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②]再者，人的认识过程本身也充满矛盾，不仅充满个别和一般的矛盾，而且也是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的矛盾过程，是人类无限的认识能力和单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的矛盾过程。所以思想即是矛盾，无矛盾也就无思想。

矛盾即是“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③]。他以矛盾观为中心，论述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就是提出或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也就是“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阐明了革命就是解决社会矛盾，工作也是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因此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矛盾，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解决问题。

“差异就是矛盾”。在《矛盾论》中，他强调，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这个思想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又是针对当时德波林学派否认矛盾普遍性的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8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272页。
③同上，第3卷，796页。

判。他不仅认为上下、正反等差异和对立是矛盾，而且一切差异在一定条件下都构成矛盾。黑格尔认为内在差异是矛盾，外在差异仅仅是杂多。毛泽东则指出，一切差异只要在一定条件下联结起来，即具有了同一性，即构成一对矛盾。从矛盾发展过程来看，应当承认差异就是矛盾，否则就否定了矛盾是一个发展过程。当然差异还只是矛盾发展的起始或潜伏阶段，马克思称之为“隐藏着”的矛盾，列宁称之为“矛盾的胚芽”。差异还不是矛盾的全部或发展成熟了的矛盾。差异更不一定就是对立、对抗。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他对“矛盾”概念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对矛盾普遍性的阐述。因为矛盾即是运动、事物、思想和过程，包括了主客观一切领域，也包括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一切差异都是矛盾。一切问题都是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贯彻始终。在对矛盾范畴作出科学规范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作了精确的概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这就是“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的全部涵义和更高抽象。

第二，毛泽东的“矛盾”范畴既是方法论中的关系范畴，也是本体论中的实体范畴，而且是一个动态关系范畴。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曾说：“所谓矛盾，就是自己推翻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排斥自己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件事物的内部，总包含着一种和它自己本身相反的要素。”②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80页。
②《艾思奇文集》，第1卷，208页。

泽东的“矛盾”概念较之艾思奇的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作为实体范畴，矛盾指的是对立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构成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都可以一分为二。作为关系范畴，矛盾中的“对立”指的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对立关系，即相互排斥的斗争性；矛盾中的“统一”指的是它们双方之间的统一关系，即相互联结的同一性。“对立统一”指的是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地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关系，即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结合。作为一个动态关系范畴，矛盾指的是事物都有内部和外部双重关系，即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两者都是动态关系。也就是说，它们都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构成了矛盾的动态关系。在动态关系中反映了矛盾是一个复杂整体和复杂过程，具有复杂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

第三，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或矛盾观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成果，而且是人类辩证法史上“矛盾”范畴历史发展的结果。

对“矛盾”范畴的历史考察表明，它在西方辩证法史上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最早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矛盾”概念。他提出形式逻辑的矛盾同一律。在逻辑推理过程中，从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去揭示逻辑上的矛盾。黑格尔大大扩充了“矛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矛盾”已不再是单纯表述逻辑学上两个命题的不一致或相互排斥的术语，它也成了本体论的术语，即存在与非存在。它表示事物在其发展的辩证否定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环节”，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否定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赋予“矛盾”范畴以科学内容，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他们把“矛盾”看作是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概念，认为现实充满着矛盾或对

立。他们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抛弃了其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特别是他们把矛盾概念用于社会中，从而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基本矛盾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几种经济形态，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对“矛盾”范畴发展的功绩，在于在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对对立统一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进一步把矛盾概念看成一个“社会——政治——历史”的概念。

毛泽东继承了前人的思想，他继续把“矛盾”范畴用于社会领域，分析社会矛盾；用于认识过程，分析了认识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发展了列宁“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最关键和最核心部分，是最基本的概念，正如柏拉图的“正义”概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概念是他们哲学的基本概念一样。毛泽东从“矛盾”范畴引出他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理论，构成他的各种理论大厦的基石。可以说，不了解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就不能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伦理等思想。

二、明确提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

关于矛盾学说的精髓问题，在哲学史上并未专门提出或论证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论述过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但没有明确阐释它们和辩证法或矛盾学说的关系。黑格尔已显示出把共性个性关系问题和矛盾学说联结的意向。他说：“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抽象地看来，

也就相同于同、异和根据。”[①]但他也没有讲清这二者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一般”、“价值一般”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抽象——具体——抽象的辩证逻辑。但他也没有对矛盾学说的精髓作深入论述。列宁在研究《资本论》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著作的基础上，已接近这一问题的解决。他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提挈了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并进而说明了这一规律在认识过程中的体现，即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但是列宁仅仅将个别和一般即共性个性问题作为认识论的精髓，而非作为矛盾学说的精髓，还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对立统一）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他既指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又指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转化是“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在唯物辩证法史上的杰出贡献，就是第一次论述了这个精髓问题。《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主线，展开了矛盾问题的各个方面，建立起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它是一篇具有完整而严密的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著作，融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为一体。它从两种宇宙观的高度出发，以扫除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矛盾问题作了层层深入的分析，涉及了矛盾问题的诸方面。但是其着重研究点是矛盾特殊性问题，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把它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提出来，表明了矛盾体系的实质所在。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

①黑格尔：《小逻辑》，334页。

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说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具体的，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接着他又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总结了人类认识史的科学成就，概括了矛盾问题最基本、最本质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新结论、新贡献。正确地理解这一精髓思想，对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实际工作有重大意义。

在矛盾的精髓问题中，最关键的是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认为，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也认为，矛盾的特殊性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他还以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为依据，研究了矛盾的结构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提出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三十年代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等人在论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③时，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是苏联学者对这一概念没有展开论述，更没有把它和矛盾普遍性联结起来，作为矛盾的精髓问题提出。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作了详尽、系统的发挥，为唯物辩证法增加了新思想，为人们理解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为在实践中正确分析和处理复杂的矛盾，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针对普列汉诺夫不理解辩证法的规

①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中文版，115页。

②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③《列宁选集》，第4卷，290页。

律，不懂得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着重阐述了个别向一般的转化，强调的是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着重强调的是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确定了“矛盾特殊性”的范畴，分析了它作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五个层次，即：（1）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有特殊性；（2）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在其发展的每一过程，也都有特殊性；（3）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也有其特殊性；（4）各个发展过程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亦各有特殊性；（5）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也有其特殊性。

认识事物或矛盾，也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这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毛泽东说：“研究从辨异入手”①。“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它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②。“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③他在《矛盾论》中又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④。所以“辨别事物”就是把握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指出，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互相联结，二是两者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具体说来：（1）每一事物内部都包含矛盾的普遍性，又包含矛盾的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2）矛盾的普遍性即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41页。

②③同上，4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284页。

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特殊性即无普遍性；（ 3 ）普遍性不等于特殊性，共性不等于个性，普遍性、共性只能大致包括特殊性、个性，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即本质的部分；（ 4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为特殊性。

毛泽东认为，不理解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不理解矛盾问题的精髓，就等于不理解辩证法，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现实的矛盾都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揭示了事物自身最本质的关系，是客观事物的多种多样对立着的多个侧面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两个侧面。只有懂得这个关系才能从总体上，从相互联结上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如果不认识矛盾的共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根据；如果不研究矛盾的个性，就无从把握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

第二，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贯串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矛盾学说的整个逻辑结构就是以矛盾精髓原理为主线展开的，不了解它，就不了解整个矛盾学说。

无论是两种宇宙观问题，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问题，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对抗和非对抗问题等等，都贯串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这一关系的展开和具体化。同样，无论是质变和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和现象、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等诸种范畴，也都体现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所以，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是一切矛盾运动中最普遍、最本质的关系，它渗透于矛盾分析方法之中，是整

个矛盾原理的核心。

第三，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客观辩证法，也反映了人类认识的主观辩证法，是掌握人类辩证认识运动的关键。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提供了正确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基本方法，它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秩序和总规律。认识发展的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毛泽东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①

第四，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是把矛盾的精髓原理化为党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关键。

毛泽东运用这一矛盾精髓原理，在1943年曾提出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也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它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大量丰富的个性概括出共性；“到群众中去”则是从一般到个别，从共性到个性，即将概括出的共性、普遍性，用于指导具体的实践。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正是这一矛盾学说精髓的体现。毛泽东抽象出这一矛盾精髓问题，不仅为辩证法理论增加了新内容，而且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84页。

使唯物辩证法便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化为群众手中的工具，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的功用。

第五，矛盾学说精髓的原理，提供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奠定了理论同实践结合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条原则实质上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结合的原则。理论就是抽象出的一般，是从大量个别、特殊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因而是特殊的、有条件的实践。

不懂得共性个性的关系，必然在认识过程中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陷入主观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种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①

在矛盾精髓问题中，毛泽东还对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作了分析，并将这种差别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矛盾特殊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毛泽东说："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面。"②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在苏联三十年代教科书中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85页。

②同上，295页。

曾有类似提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曾提出过“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概念），但是没有展开阐述。毛泽东在此书的读书批注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了1200字的一段批语，对主要矛盾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刻的发挥，进一步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区别及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它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① 不仅矛盾有主次之分，矛盾的两方面也有主次之分。他说，“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②

在《矛盾论》中，他进一步指出，事物发展过程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须具体分析，分清主次。矛盾的双方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所以不能平均对待。他认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时，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7页。

②同上，第88页。

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①所以主要次要之别正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主要矛盾是指处于领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是指在一定的事物中处于从属、服从地位的矛盾。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次要矛盾可以很多。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抓住主要矛盾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在《矛盾论》写作之前，毛泽东为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分析抗日战争形势，在1935年至1937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四篇文章，就是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分析形势的理论根据的。可见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不仅是继承列宁的哲学思想，而且主要是对中国现实复杂的矛盾运动，进行具体比较分析的结果。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主次矛盾及矛盾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认为这表明了矛盾的网状结构（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与单一的线性结构（简单的统一体）的区别，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③

毛泽东还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着的两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基本形态。有时候它们似乎势均力敌，但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301页。
②同上，第297页。
③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68—170页。

的现象。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即取得支配地位的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可以互相转化，从而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这个结论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

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还阐明了对抗也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并非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他指出，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矛盾的斗争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对抗性的矛盾必须采取对抗的形式，非对抗性矛盾则采取非对抗形式。对抗与非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矛盾精髓的原理，特别是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中有重大作用。

三、系统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

在中外古代辩证法思想中，都有转化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曾指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并向对立面转化。他说，“反者道之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大”即事物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转而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其《论自然》的残篇中，也提出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斗争是万化之源等思想。

黑格尔对对立面同一和矛盾转化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历来重视矛盾的转化问题。恩格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① 他还说：“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①列宁也说：“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②他还说：“辩证法是一种原理。它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③但是列宁在这里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列宁这一思想，阐明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从而第一次深刻地论述了矛盾转化思想。

首先，毛泽东明确论述了矛盾同一性的涵义。他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指的是矛盾的两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这是差异的同一性。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④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最高体现和充分证明，是同一性的展开和深入。

那么，什么是矛盾的斗争性呢？黑格尔很少用“斗争”一词。列宁从政治生活中借用这一术语，把它提升为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并经常使用。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是从恩格斯关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页。
②《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303页。

述中受到启发而提出的。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斗争性的观点。他指出斗争性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相互斗争的性质。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为矛盾双方不论相互依存或相互转化，都依赖于一定的具体条件。而矛盾的相互排斥、分离、斗争则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

但是斗争性和同一性这种绝对和相对的区别又是相对的、不确定的。认为斗争性从来不需要任何条件，或在任何条件下都起决定作用，只讲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把斗争性的绝对性绝对化，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这从他的哲学批注中也可看出来。1939年他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上的批注，更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分析。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①这就是说，如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他还说："一定条件下的斗争与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原文忽略了这种一定条件。"②"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③这里就指出了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时间之久暂）是互相转化的。而且矛盾的同一性或斗争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能起主导作用。所以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二者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他还指出，"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④。

毛泽东在阐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特别强调矛盾的

---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374页。
②同上，373页。
③④同上，374页。

转化思想。转化是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中与联系、发展并列的一个总体范畴。什么是转化？即事物一种质态向他种质态的过渡、转变。毛泽东分析了矛盾转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地位的转化，即矛盾双方"向着它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一方取代另一方，互换主次地位；另一种是矛盾双方"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了去"，这是直接的转化，达到直接同一。转化除上述两种基本形式外，其它还有双方性质上的转化——正为负、好为坏；作用上的转化，主要作用转为次要作用，或反之；矛盾双方的综合、融合；一方"吃掉"另一方；以及矛盾双方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等等。矛盾转化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双方的具体联结关系。

毛泽东其所以特别强调矛盾的转化思想，这是因为：

第一，转化就是革命，就是新陈代谢，就是矛盾的解决。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就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就是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没有向对立面的转化，新事物就不能代替旧事物，客观事物就不可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所以矛盾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转化贯穿矛盾运动的始终，它既包括质变、飞跃，又包括量变、渐进。矛盾从产生到解决，都是矛盾的转化过程。只有通过矛盾转化，事物才能发展，社会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正体现在矛盾的转化上。所以转化就是革命，就是革旧鼎新。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①。

第二，转化就是发展，承不承认转化，是辩证法与形而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305页，

学的两种发展观的分水岭。

形而上学一般说来也承认发展，甚至承认矛盾，但绝不承认转化，不承认质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否把转化和发展、和质的飞跃联系起来，是两种宇宙观的分歧所在。

毛泽东把转化提到两种宇宙观的高度进行分析。他说：“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①

第三，转化也就是联系，是更深刻的联系。

毛泽东把同一性概括成两种联系：一种是矛盾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的联系，一种是对立双方各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联系。正如列宁所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片，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②没有转化也就没有联系。

从坚持辩证的唯物论出发，毛泽东着重论述了转化的条件性，即转化的现实性、客观性、具体性，从而坚持了转化的唯物论。这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转化的关键在于条件。“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③

毛泽东强调转化必须有条件，这是科学的具体的同一性和幻想的同一性的分水岭。因为现实矛盾的具体转化，是客观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304—305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307页。

转化，不是主观幻想，不是随心所欲的神话或童话中的转化。研究转化的条件性，也就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王明教条主义者只讲“转化”，不讲转化的条件、脱离中国的实际，因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强调转化的条件性，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应当发挥能动性，创造必要的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方面转化。

毛泽东还指出，矛盾双方之所以能够互相转化、互易其位，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矛盾的转化既离不开同一性，也离不开斗争性。矛盾双方能够互相转化，一方面在于斗争性。“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转化又离不开同一性。只有同一性才为转化提供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联系的基础，使矛盾与转化结果建立联系。所以转化就是同一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转化理论是唯物辩证法中最具革命意义的内容，是毛泽东矛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深刻分析，奠定了转化理论的基础。他强调要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要注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要注意分析转化过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转化的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当然，我们在肯定转化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时，也应当看到，并非任何情况下的转化都是革命的进步的。矛盾的转化既有前进、发展的趋势，也有暂时倒退的趋势。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促成革命的转化，即促成矛盾向有利于前进、发展的趋势转化。

第四节 《两论》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它们不仅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在：

一、对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理论总结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主线，同其它各种哲学思想包括错误哲学思潮相互斗争、相互争论、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得到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是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的历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同党内错误思潮——主观主义作斗争，而且对中国现代史上其它哲学思潮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新哲学论战（辩证法论战），也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回答，《两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

诚然，《两论》并没有直接提到辩证法论战的双方代表人物，也没有直接引述或批判叶青、张东荪等人的错误观点。论战当时（1933—1934年），毛泽东还在江西，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哲学论战。但是，他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以及国内其它一些著作，了解了新哲学论战中双方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是一本以答读者问的形式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批判叶青、张东荪的论文集。该书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

毛泽东迅即阅读，以后又读过几遍，作了几千字的摘录。同年十月，毛泽东还约艾思奇在延安面谈此书。因此《两论》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对理论论战中错误思潮的批判和回答。当时论战集中的几个问题，如形式逻辑学的存在意义问题（后来《矛盾论》收进《毛泽东选集》时，已予删去）；黑格尔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反映论与实践论在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党性和功能问题；内因与外因，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差异是否矛盾等等；《两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

针对叶青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点是吸收"观念论"的，是"以思维决定存在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物质论和观念论的统一"等论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黑格尔观念论的根本不同。

针对叶青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并将实践和认识等同起来的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提出"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提出实践与认识是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阶段，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不能等同，也不能绝对分开。它们的关系不是僵死的直接的同一关系，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三十年代新哲学争论的深刻总结。

针对叶青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同起来的论点，毛泽东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279页。

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改造世界分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两个方面，指出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人的认识能力，改造客观世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而不是叶青所说的“把观念转化为实在”的意思。因此，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针对叶青的“外铄论”，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指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在《矛盾论》中从矛盾转化的角度把事物内部的矛盾看作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把一事物与它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看作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即外部条件。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这个科学结论是他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这从1937年他在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可以看出来。他说：“‘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①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还着重分析了矛盾特殊性问题，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来阐述特殊性，从根本上揭露了叶青把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8页。

特殊性和普遍性绝对对立、用前者否定后者的错误，深刻阐述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道理。

针对叶青认为“辩证逻辑虽承认矛盾，但亦有不承认矛盾之处”的论点，毛泽东指出“差异就是矛盾”，一切差异在一定条件下都构成矛盾。

针对叶青建立在心物综合观念论基础上的“哲学消灭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指导作用。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一节指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学习唯物辩证法。针对叶青宣扬用科学代替哲学的谬论，他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科学也需要哲学的指导。

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两论》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体系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这两篇著作大大超越同时代国内的其它各哲学流派的著作，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的强大威力，奠定了中国当代气势磅礴的主流派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中国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不仅产生了革命的需要和实际的革命运动，而且产生了推动革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以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基础。

本世纪以来，中国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直面临着

一个重大历史课题的困扰，即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对本国的传统哲学和外来的各种哲学流派进行比较、选择和建构。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着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任务：一是如何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二是如何使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所谓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在现代条件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存亡继续问题，使之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二十年代以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都在这方面作过不少尝试和努力，创立了诸如“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学说，构成所谓的“新儒学”或“儒学第三代”。但是它们并未能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显学”，更未能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在三十年代也推出了国民党官方哲学——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尽管也力图用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但收效更微，几近湮没无闻。这样，传统哲学能否现代化、怎样现代化，仍成为今日中国争论之热点和急待解决的课题。

关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产生了最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自唐代吸收佛教文化后，学习、吸收和包容外来优秀文化的再一次成功范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两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十九世纪的西欧，是西方现代文明、现代精神财富中的精华。二十世纪初它传入中国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历程，已成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主流，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它在中国所取得

的成功，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科学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它是当代最科学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普遍的真理；特别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有他们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处的主导地位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提供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宝贵经验

《两论》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提出和说明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和原理，也不仅在于对中国革命实践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还在于它提供了如何将西方文化加以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它对“五四”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种种争论，提供了一份现代启示录；对“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等观点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首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现代的哲学主流的经验表明，在对待西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无论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尊孔崇儒的“国粹论”，或借口“国情特殊”而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情论”（叶青），还是一味照抄照搬，食洋不化，不问中国国情而生搬硬套的“全盘西化论”，都是错误的。《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既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坚决否定，又是对教条主义的“全盘西化论”的坚决否定。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指出，由于中

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这表明，中国的传统儒家哲学早已落后于社会的进化，不能解决中国现代面临的任务，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必须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是考虑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对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就是“全盘西化论”的一种典型表现。“全盘西化”是在外来文化面前的一种自我失落，是一种丧失主体性的文化观。不反对教条主义，不反对“全盘西化论”，就不可能有对西方文化的真正选择、吸收和融合，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次，《两论》表明，任何外来文化要移植到中国并生根、开花、结果，都离不开中国文化场上主体文化即传统文化对它的作用和影响。所谓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现实化，不仅指使它具有必要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去消化它、改造它、应用它，在于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所谓“中国的实际”，不仅指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国情也不仅指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地理环境、人口等等国情，还包括由中国传统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等构成的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特征的社会文化样式、文化类型、文化结构。中国文化历史悠长，有巨大的凝聚力，是人类文明中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任何外来文化面对这种古老悠久的文化，在接触中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产生所谓的“变形”。这种“变形”往往既有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一面，也有受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消极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

响，从总体上看，其“变形”是积极的，是东西方 哲学 的 交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例如《两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对矛盾结构的揭示，对矛盾特殊性的阐明）；高扬主体的能动性；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的进一步阐发——提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关于军事辩证法的思想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推进，同时又无不渗透和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光辉。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足，例如缺乏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从理论思维和方法论上进行概括等缺陷。

总之，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成就和不足，是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份宝贵资料，值得在今后中西文化讨论中认真研究和借鉴。

第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展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科学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撰写了许多著作，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它们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哲学著作。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适合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是紧密相联的。可以这样说，毛泽东许多精彩的哲学思想正包含在他的军事著作之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先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两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已见端倪。这部著作是《两论》的前导，而《两论》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军事形态到哲学形态的升华。《两论》之后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则是对《两论》阐述的哲学原理在军事领域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敌我双方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倾向，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为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光辉范例。

一、揭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分析“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

抗日战争是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进行的。在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一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侵略性的军事同盟。德国、意大利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是社会主义苏联，坚决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三是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既不同于德、意，也不同于苏联，而是采取两面政策。同时，在国内也存在着三种势力：一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二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三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各种势力在如何进行抗日战争这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一条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另一条是国民党所推行的消极防御、单纯由政府包办的片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结果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丢失了祖国的大片土地。在抗战问题上，国内还存在着两种错误倾

向：一种是"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投降派汪精卫等人，大肆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等，为他们准备公开降日制造舆论。这种亡国论调不仅存在于国民党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使这种思想在某些阶层中，甚至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另一种是"速胜论"，国民党蒋介石从抗战一开始，就幻想依靠外力的支援取得速胜。早在"八一三"事变时，蒋介石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他们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一年胜利"等等。特别是在1938年3月下旬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这种侥幸速胜的心理更大为滋长起来。

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革命力量，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速胜。他们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看不到国民党集团腐败反动的阶级本质，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蒋介石。同时，有些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人，也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中国的抗战可以速胜。对台儿庄胜利的夸张宣传，更迷惑了一些人的视线。

抗日战争开始后，每一个为着自己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都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进程究竟会怎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这是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揭露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批判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各种错误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

胜利，毛泽东于1938年5月至11月间先后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国际环境等诸因素，分析了双方各自的特点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了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倾向，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适时提出了军事战略的转变。

如何认识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想象出发，这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毛泽东一贯遵循这一认识规律，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运用于研究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在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中日双方政治、军事、经济、自然条件等客观情况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首先把中日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具体把握住战争的时代特点和战争的根据，揭示这场战争的本质。他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所在。这一论断指明了战争的时间、地域、性质以及战争的激烈程度，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即这场战争与其他任何战争的质的区别。

毛泽东还从时代特点这个总的根据出发，进一步具体分析

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

其一，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上述诸方面都不如敌人。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不可避免，也是中国抗战之不能速胜的基本原因。

其二，敌退步我进步。二十世纪初，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是它的内外矛盾激化的结果，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反动行为。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产生了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日本侵华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但却处在由旧变新的飞跃前进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的代表。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是完全相反的。

其三，敌小我大。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和中国相比，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不能供长期作战之用。毛泽东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通过战争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却适得其反，结果将因战争而更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而中国则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兵多的大国，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的一个客观有利条件。

其四，敌寡助我多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

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中国则由于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得到国际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分析和研究事物的特点，是认识矛盾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仅仅了解了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点，还是不够的。毛泽东不仅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而且从矛盾特殊性的联结中，从矛盾双方诸要素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中，从战争各方面的长处与短处的比较中，去把握矛盾的总体，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经过辩证的分析和综合之后，认为中日矛盾双方的这些特点，规定了战争的进程和最后的结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可能速胜，但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剖析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抗战10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论调是错误的，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特点，把它当作全部依据，而忽视了矛盾其它的特点。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主观的。速胜论者则忘记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或则夸大中国的长处，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同样是片面的主观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反对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这一论断把对战争问题的认识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坚持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原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4—415页。

理。

二、唯物辩证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使矛盾逐步激化，事物在发展的长过程中又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据此从动态上对中日战争的矛盾运动进行分析，他根据中日双方各种矛盾互相制约、互相消长的情况，科学地推断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最后胜利。他预见抗日战争发展的总趋势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战争的客观进程必然形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了更好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毛泽东科学地描绘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轮廓。

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在这一阶段中，敌我力量都有向下向上两种变化。一方面，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敌人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这是敌人暂时的局部的向上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我乘敌后空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威胁到敌之占领地的保持，使敌军力、物力遭受很大的消耗，出现了士气颓靡、人心不满、财政竭蹶、国际舆论责备等向下的变化。随着这些向下因素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必将引起质的变化。从我方来说，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的表现在量上，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受到了很大的消耗。而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

现在质上，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我方积累了战争的经验，军队经受了考验，人民得到了动员，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还得到了国际的援助。总之，这一阶段将逐步地改变敌强我弱的状态，中国将逐步上升，日本将逐步下降，但这种变化还是处于量变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达到其战略进攻之终点，以后则转入战略保守阶段。

第二阶段，双方势均力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继续走下坡路，中国继续向上发展，经过长期斗争，将逐渐达到平衡，从而敌我力量对比表现为势均力敌的状态。但从矛盾总体上看，还没有发生根本质变，还是处在总的量变阶段之中。敌方企图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持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但是他们又面临着顽强的游击战争。这时，我军转入敌后，依托敌人未占领的一切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于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毛泽东指出：这一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之努力程度。因此，这一阶段的任务，必须动员全国民众，齐心协力，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扩大统一战线，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奋斗，熬过这一段艰难的历程。在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疲惫和大量消耗敌人，使敌人力量继续下降。而我们将逐渐积蓄力量，向上发展，从而摆脱劣势，这就为战略反攻作好了准备。

第三阶段，收复失地的战略反攻阶段。这时敌之力量下

降，我之力量上升，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质变，我由劣势转为优势，敌由优势转为劣势，直至彻底失败。还要看到，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加强相联系的。毛泽东在综合分析国际形势发展趋向的基础上作了生动的比喻："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在每一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时，不仅区分向上的变化和向下的变化，而且还区分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在这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相互消长，每一方都经历着两种相反方向的变化。开始，我方有向下的变化，也有向上的变化；敌方有向上的变化，也有向下的变化。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我之向上的变化不断扩展，向下的变化不断缩减；而敌人向下的变化不断加剧，向上的变化不断减少，直至我方取得最后胜利。当然，这三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如果第一阶段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就不会有相持阶段的到来；如果没有相持阶段的充分准备，就不可能转入反攻阶段。上一阶段是下一阶段的必要准备，下一阶段又是上一阶段的必然结果。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中日战争内部矛盾运动的客观进程。

毛泽东精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抗日战争三个发展阶段所做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在复杂的事物中量变的复杂性和把握量变总方向的必要性，提出了在量和质上有新与旧、向下与向上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变化的区分。这不仅显示了理论的创造性和预见性，而且也为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在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指引下，全国抗日军民的思想认识趋于一致。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广泛宣传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诸矛盾的特点，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客观依据，得出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论断，从而科学地确立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向全国人民指明了经过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景。

《论持久战》既是一部杰出的马列主义军事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等学说，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如果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那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对抗日战争新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和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论持久战》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的科学预见性，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眼光和预见能力，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强大威力。可以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作出的科学预见，既具有认识的超前性，走在战争实践的前头并指导着抗日战争的实践；同时，这种科学预见又具有认识的概括性，它是建立在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

对过去内战时期实践经验科学总结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就曾分析战争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战胜敌人，但又不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的两重性，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是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即战略的持久战。1938年2月一4月初，即写作《论持久战》前夕，他在《读书日记》中记下了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情况，极为重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从内战向民族战争转化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论持久战》中，他以对一般战争本质的认识为指导，以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为指导，分析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条件的新变化，指出敌大我小这一基本特点虽然未变，而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却会发生具体的变化。他由此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论。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场持久战的深入研究，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的原则。他善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现实，从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中去把握战争的发展前景，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各阶段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从过去推断现在，从现在又推断未来，用历史的眼光把三者统一起来。他善于对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作辩证的逻辑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分析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预见战争发展的未来方向和主要趋势，不为敌人表面强大所迷惑，善于作出科学的判断。

毛泽东总是把军事和政治统一起来，从政治斗争的高度来看待战争，从而把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和军事家的机智的应变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他对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

具有很高的准确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科学预见是在实践中从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化。战争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对未来只能作出大致方向的判断和估计，这是认识的不确定性；但战争的发展变化又总有朕兆可寻，随着战争中各种矛盾的逐步暴露和展开，随着战争的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发展，战争发展进程所展示的多种可能性，有可能通过正确的判断和分析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确定战争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又是认识的确定性。

第二节　运用矛盾转化原理提出军事战略的转变

战略是基于对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部署和指导。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一贯重视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问题。他在抗日战争中，除写有《论持久战》外，还写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专门著作，不仅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战略，而且还运用矛盾转化原理，依据战争形势的演变，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方针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客观依据

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战争从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战争的内容、性质和敌我情况因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要求军事战略作相应的变化，即从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

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总战略是紧密相关的。持久战的基本作战方式或军事战略就是游击战。诚然，古今中外的游击战本属战术问题，但在抗日战争中，它却担负起战略任务，取得了战略地位。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大创造。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强调了战争的游击性，划清了游击主义和游击战的界限。在抗日战争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预见到抗日游击战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1935年1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确定游击队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

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召开，确定了在敌后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任务。接着，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以后又逐步完善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指导了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的军事战略的转变。1938年1月—3月，毛泽东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联系"可能性与现实性"这对范畴涉及的抓"链上的特殊一环"时写道："西安事变时抓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今日的游击战争是新的东西。"①同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62—263页。

年5—11月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进一步全面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军事战略，具体阐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毛泽东对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作了历史的考察。他指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经历着四个战略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在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从军事战略的发展转变中，毛泽东深刻阐明了从国内战争后期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强调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①"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正是毛泽东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双方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在转变时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才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为什么要从第二个战略时期向第三个战略时期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呢？既然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 游击战是辅助的，游击战只是战术问题，为什么又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6页。

它看作战略问题呢？这是因为，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中国有广阔的空间，众多的兵员，适宜进行游击战争；但它又是一个弱国，不适宜象苏联那样完全进行正规战。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在数量、规模、兵种组成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都比我军强大；友军则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虽然参加了抗战阵营，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的抗战路线，从开始对我军就怀有敌意；战场则主要是地域广大的华北。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和发展自己，有效地打击敌人，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不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只是在正面战场打正规战，就既不能消灭强大的敌人，又不能分兵发动群众，在游击战争中壮大自己，反而会使自己遭到伤亡损失。只有把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才能有效地发展自己，坚持持久战，最后消灭敌人。正是这些特殊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共产党力量的弱小，决定了中国的抗战既无一举退敌之力，也不能指望国民党军队取得速胜，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才能最后战胜敌人。这样，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在广阔的地区里大规模地进行的游击战；是长期作战，而不是短暂作战；不是只停止在游击战争阶段就结束了，而是在具备了必要条件后发展为正规战。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

察。”①

抗战开始后，党内外有很多人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认识不足，特别是王明等人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面，主张集中主力配合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和敌人拼消耗。这种打大仗打正规战的思想，不适合当时形势的客观要求。为了使全党适应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需要对新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斗争经验加以分析总结，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及各项政策，给予系统的阐明，并从哲学思想上加以论证。毛泽东在一系列报告中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军事强国，我们的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处心积虑地企图借日本之手消灭我军，而我军质量虽高，但数量有限，要实现我军的任务，就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这样，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充分估计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要对蒋介石国民党在陕甘陈兵10个师保持应有的警惕，要按情况使用兵力。在陕甘宁边区必须留有适当的兵力，以防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洛川会议所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项决定，为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准备。

但是，当战争实际要求我军实现战略转变时，对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有些同志认识还不足。在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之后，又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在有的文件中，时而提出“运动游击战”，时而又提出“游击运动战”，就是这种模糊认识的反映。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在1937年9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页。

连续致电前方的同志。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什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在1937年9月12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等等。

其二，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又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9月25日给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德等人的电报中，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其三，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国民党华北战场即将溃败，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因此，他强调必须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从战争实际出发，提出三个师分散配置的部署；并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正是在毛泽东这些正确指示指引下，八路军自觉地实行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开赴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开创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在这期间，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也根据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刘少奇在1937年10月16日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并能打胜仗。"①游击队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充分依靠群众，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这些论述，对于阐发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引导党和军队及时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德在1938年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根据党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时代的产物，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是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抗日游击战争，是十年国内游击战争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它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寇而奋斗的人民战争。朱德还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它的伟大作用，具体表现为：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它能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81页、83页。

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它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它的广泛发展是打运动战的正规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它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朱德的这些论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指导下，全党全军逐步提高和统一了认识，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向敌人的翼侧迅速展开，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我军已相机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三大山区战略要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是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总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调整了部署，分散兵力。我军主力部队分别以五台山、太行山、管领山和吕梁山为依托，以一部分兵力继续钳制日军；以另一部分兵力组成游击支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区根据地。从八路军出师抗日到武汉失守的15个月内，我军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胜利完成了军事战略的转变。

二、正确处理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辩证关系，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游击战和正规战，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种基本作战形式。游击战是由民兵、游击队或由正规军组成的游击队，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形式。正规战则是由正规军采取运动战或阵地战进行的作战形式。

毛泽东阐明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的辩证关系。他一方面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

助的。这是因为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兵力比共产党兵力强大，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需的，恰当的”。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①。而且，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只有中间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才表现为主要形态，当然这一阶段时间却是最长的。不认识这些，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占领，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更难出现。而且将来我方反攻，也会因缺少呼应而使主力遭到不利。因此游击战虽在战略上居于辅助地位，实际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和正规战紧密相配合，共同解决战争问题。它对正规战的配合，表现在战略、战役和战斗三个方面：

从战略上说，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起了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并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从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不但在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配合正规军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517页。

妨碍敌人保守；而且将来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失地。因此，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从战役上说，游击队经常向着敌人最感危险之点和最感薄弱之点积极行动，紧密配合战役作战，起到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仓库，袭击敌人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的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作用，因而也有战略配合的意义。

从战斗上说，游击队依据正规军首长的指示，往往担负钳制部分敌人，破坏敌人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任务，直接配合正规军的战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来看，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这就形象地说明了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辩证关系，不仅表现在二者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上，还体现在二者的相互转化上。游击战和正规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时指出：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军事战略发生了转变，作战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游击队经过战争的长期锻炼，逐渐地变成了正规军，因而其作战形式也将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了正规战。正如刘伯承在1939年8月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文中所说的，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隔断的鸿沟，而是互相联贯着的。正

规军和正规战扶助游击战，游击战又促进正规军和正规战的发展，这就是游击战和正规战相互关系的辩证法。

毛泽东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系出发，不仅制定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而且还特别研究了抗日游击战的特殊战略。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他在总结我党过去领导游击战争的经验后，制定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特殊情况的六项具体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朱德也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同毛泽东就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抗日战争中，朱德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了许多经验，撰写了《抗敌的游击战术》、《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论解放区战场》等军事理论著作，正确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使游击战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如他提出的“小股进退，

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争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是对“十六字诀”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陈毅在1938年5月关于《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也指出：我军进入敌后，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集小胜为大胜，以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些思想也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游击战向正规战过渡的中间环节——运动战问题，分析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了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的关系，批判了两种错误倾向即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误。

他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了战争中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分析了游击战中运动战的成份随着战争的持久而逐渐增加，从而逐步过渡到运动战，并最后过渡到正规战所必需具备的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他指出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国内战争后期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又从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最后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正规战，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战争领导者、指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毛泽东还论述了游击战与根据地互为条件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要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正是从这

一思想出发，毛泽东指出，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可能支持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①接着，毛泽东又具体分析了建立山地、平地与河湖港汊地三种根据地的可能与条件。他认为，以山地建立根据地最为有利；平地虽较山地为差，但是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河湖港汊也较山地为差，但比平地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为大。总之，只要深刻懂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彻底克服流寇主义思想，采取正确的方针，就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敌后根据地广泛地发展起来。

他根据游击队分散行动和作为低级的武装组织的特点，提出了游击战的指挥关系问题。为了使主观指挥能更好地符合战争的客观需要，他着重论述了分散和集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是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术的分散指挥相结合。战略上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和战役上应该分散的不分散，都是不允许的。前者“在上者叫失职，在下者叫专擅”；后者“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他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强调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可见，毛泽东对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制订，充分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结运用于军事斗争的典范。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第三节　论述抗日战争中诸矛盾的辩证关系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战争领域，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各种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地制定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正确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诸矛盾的关系。

一、战争与政治

战争，是人类用暴力形式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社会运动形式，是阶级对抗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战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暴力行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通俗而又科学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任何战争都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马克思指出："危机的军事原因一部分是与政治原因相联系的。"①列宁也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②这就说明，政治决定战争的产生，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政治决定战争的作战对象以及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③无论是革命战

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3卷，第234页。

②《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争，还是反革命战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决定战争，战争从属于政治，古今中外，一概如此。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政治目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战争在整体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具体的战役战斗和军事行动，也是直接地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朱德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时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而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① 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

战争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就是说，战争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流血”来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各个国家、各阶级和各政治集团之间彼此为着自己的政治利益，长期地斗争着。当矛盾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一定阶段，采取外交的、经济的等等斗争形式再也不能使政治发展下去的时候，就爆发了战争，用战争这种暴力的特殊手段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这样。我们只有把战争作为政治继续的一种特殊手段来研究，看到战争这一事物的个性、特殊性，才能认清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战争去夺取胜利。

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还着重指明战争对于

①《朱德选集》第39页。

政治的反作用。他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①毛泽东还说过，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威力之大，可以改造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抗战的实践证明，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二、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

战争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最基本的矛盾是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原则。他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本质、目的，是一切军事行动，包括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的根据。

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②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是贯穿战争全过程中诸矛盾的共同本质，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两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保存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②同上，第450页。

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原则，贯彻战争的始终。因此，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都必须按照这一原则来制定。

毛泽东阐明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对立统一关系。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是相互对立、排斥的，因为战争双方是你死我活的搏斗，矛盾双方各自都想自己生存，置对方于死地，互争有利因素，互避不利因素，因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二者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渗透、互相过渡的，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法则，推动着战争的前进和发展。

毛泽东还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这就是说，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同任何矛盾一样，矛盾的两方面是不平衡的，是有主次的。从战争全体上看，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但是在战争的某一局部或某一时间，它们可以互相转化，即在一定条件下保存自己也可以变成主要的。这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军事原则中的灵活运用。

保存自己与勇敢牺牲也是辩证统一的，勇敢牺牲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②这就充分说明，一方面只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才能消灭敌人；只有大量地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所

①《毛泽东选集》第450页。
②同上。

以，勇敢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所必要，也是保存自己所必要。另一方面，要取得战争胜利，只有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才能转化为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如果片面强调保存自己，连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也不肯付出，其结果便是全体的、永久的不保存，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战争的实践证明：只讲消灭敌人，不讲保存自己，会导致军事拼命主义；反之，为了保存自己，不敢去消灭敌人，则会导致军事上的逃跑主义。要正确处理牺牲与保存的关系，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积极消灭敌人，勇敢战斗的思想。为了全局，勇于牺牲局部；为了整体，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三、防御与进攻

防御与进攻这对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基本的战斗形式就是防御与进攻。对于防御，马克思主义者一贯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恩格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采取进攻行动。”①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②这就揭示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本质，积极防御在指导思想上，是以保存军力，创造有利条件，进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导致战略进攻为目的；消极防御则相反，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而是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纯地为了挡住敌人的进攻，专以保守地方为目的。

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防御与进攻的问题上对辩证法作了积极的发挥。在他看来，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普遍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又斗争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整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这对矛盾，两者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没有进攻的一方，就没有防御的一方；没有防御的一方，也就没有进攻的一方。防御总是以进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进攻也总是以防御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战争的双方为了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总是依据战争的客观情况，不是以进攻克服对方的防御，就是以防御抗击对方的进攻。

进攻与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任何进攻中都包含有防御，任何防御中也都包含有进攻，这就叫做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弱军在对强军的战斗中，先退一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待强敌疲惫时再后发制人，这就是战争中以退为进的辩证法。再从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军队的进攻，不是同时四面八方一起进攻，必须选择主攻方向，在向某一主要方向进攻时，对自己的侧翼方向、交通线、后方基地等则要加以防御，否则就有被敌人迂回、包围和歼灭的危险。所以，在实行防御作战时，应以规模不等的进攻战相配合，抓住有利战机，适时地实施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在实行进攻作战时，应该以必要的防御相配合，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保障主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就是战争中进攻与防御的互相渗透。战争的历史证

明，凡是能够按照攻防辩证规律去指导战争的一方，就可以多打胜仗，反之，就要受挫折，打败仗。

从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辅助的。但是，进攻的主要地位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在战争的某个阶段，进攻与防御的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有时防御可能是主要的，有时进攻可能是主要的。一般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要力量对比，作战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之变化，基本具备了反攻的条件时，就要依据具体情况，及时地把防御为主转化为进攻为主，毫不犹豫地向敌人实行反攻，直至彻底打败敌人。当然，任何进攻，也必然以防御而告终，或者是进攻失利，不得不转入防御；或者是因胜利而结束进攻，单纯的无休止的进攻是不存在的。正如陈毅所说的："一般军事家对进攻问题永远只是进攻问题，看不见其中包括着别的因素；对防御问题永远只是防御问题，同样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而进攻与防御这两个战争的基本方式，落在毛主席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与新的角度。"①

军事上的形而上学论者，根本不懂得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他们认为进攻就是进攻，防御就是防御，二者是彼此孤立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在进攻时，只攻不防，是军事冒险主义；在防御时，只防不攻，是军事保守主义。因此，毛泽东为防止攻防上的绝对化，提出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战争的实践证明，一个战争指导者只有从战争实际出发，正确处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攻防两种斗争形式，捕捉有利战机，才能驾驭战争，

①《星火燎原》第1集，第142页。

赢得战争。

四、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

持久与速决这对矛盾，说的是战争运动的时间概念。战争的持久，是指某次战争延续的时间较长，而速决则是相反，是指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迅速解决了战斗。敌对双方军力的优劣，是实行持久或速决的客观基础。

毛泽东在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正是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敌强我弱的特点中，得出了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正确结论，并且由于他提出了“持久中的速决”的战略战术思想，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但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战略上虽然实行持久战，但战役和战斗则不是持久而是速决。战役和战斗争取速决，古今中外相同，“兵贵神速”，这是被中外战争史所证明的至理名言。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深刻阐明了实行速决战的必要性，同时还阐明了实行速决战的客观条件，这就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包围迂回战术，有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等等。

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内线与外线的辩证关系。内线持久的防御与外线速决的进攻是抗日持久战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战争形式也不例外。如果割裂内线的持久与外线的速决的关系，只讲内线的持久，不讲外线的速决是片面的；相反只讲外线的速决，不讲内线

的持久，也是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毛泽东强调在战争指导上要切忌这两个片面性。军事上“左”倾冒险主义者割裂两者的关系，忘掉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片面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讲持久，只讲速胜，所以犯了“急性病”、“速胜论”的错误。右倾投降主义者也割裂两者的关系，他们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片面夸大了敌人的力量，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犯了“亡国论”的错误。从认识论来看，两者又有共同的思想根源，都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

五、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

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我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丰富实践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优与劣，强与弱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辩证法。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战争中的优势与劣势，是各种因素构成的。主要是指物质条件，武器装备，军队的数量、质量，战争的正义，人心向背等条件。凡是对于这些条件占优越的一方，就处于优势地位，相反，就是处于劣势的地位。因此，战争指挥员必须认识战争力量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为了教育大家提高战胜强大敌人的勇气，他在这部著作中，一次就列举了中外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成皋之战等十个以劣胜优的战例，生动地说明了劣势的一方，只要战争指导路线正确，指挥艺术高出对手一筹，给敌人造成错觉，就能使劣势变为优势，被动变为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他强调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比如“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

"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待敌"再衰三竭"，采取敌疲我打的战法等等，都是以劣胜优的好方法。战争的实践证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相反，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进行不意的攻击，把优势者打败。

优势与劣势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认为，优势与劣势、强与弱是互相联系，互相比较而存在的。从战争这一事物的本质上来分析，强军不是一切都强，而是强中有弱；弱军也不是一切都弱，而是弱中有强。正如他在抗日战争中所指出的，日军虽强，但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错误。我军虽弱，但得到人民拥护，又有实行人民战争的优点。所以，看力量的优势与劣势，不能只看技术装备，还要看其它的因素。而且，这种优与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① 有时弱点中又同时包含着优点，如游击队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敌人的优点，也要看到敌人的弱点；不但看到自己的弱点，也看到自己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创造条件，扬长避短，以长击短，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

优与劣、强与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毛泽东认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有的强者更强了，弱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9页。

者更弱了，或者是强者变成了弱者，弱者变成了强者，这里转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没有条件是不能转化的。如果否认客观条件，妄谈转化的可能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弱军要战胜强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其中人民这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指出："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① 具体地说，只要我们在抗战过程中努力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可以改变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态势。这里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是敌我强弱优劣转化的军事的政治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由失败转化为胜利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② 当然，优势与劣势的相互转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艰苦过程。一个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努力创造转化的条件，首先造成某一局部的优势，一战而胜，然后再及其余。通过这种局部优势的长期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优势发展到全面优势，从而达到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②同上，第480页。

我优劣形势的根本转化。

六、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是战争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在战争实践中得到解决。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论，要求在尊重战争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深刻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他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带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战争虽然充满着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战争的必然性支配的。只要我们把主观和客观辩证地统一起来，就能掌握战争规律，多打胜仗。

战争的客观决定人们的主观，人们的主观又能正确地反映战争的客观，这种反映越准确，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越充分，而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能正确地揭示战争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指出：如果主观思想不符合客观规律，那就必然打败仗。"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 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战争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如果不尊重客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观规律，就会受到血的惩罚；相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谈不上尊重客观规律。

《论持久战》这样写道："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①这里用舞台和演员这样形象化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客观物质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主要是指双方的军事力量、经济技术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及地理环境等状况。这种战争的客观条件，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任何战争的主观指导，都要以此为前提，都不能超越它所许可的范围。如果脱离物质条件去制定作战计划，必然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是战争中的唯心论。但是应该看到，客观物质条件，只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如果看不到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片面强调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这是一种战争中的机械论。而且，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不能离开人的能动作用；同时，人的能动作用的范围又受物质条件的限制。离开客观物质基础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成为盲动。因此，坚持战争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要把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

怎样解决战争中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呢？首先，毛泽东要求从事战争的人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这是解决战争中主观和客观之间矛盾的前提。用朱德的话来说，就是有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用兵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点。其次，还要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战争实践是沟通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战争和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之又一能动的飞跃，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不断解决主观和客观矛盾的辩证过程。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形势下，要想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发扬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但不违背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这里"自觉的能动性"概念的提出，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就是说，自觉能动性是在实践基础上人的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特殊能力，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基本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特征的。把能动性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

自觉的能动性作为人类的特点，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①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的双方为了取胜，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物质力量和智慧。双方的生死存亡都系于战争的胜负，任何一方如果有丝毫的疏忽，就可能导致死亡、流血，甚至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活动象战争那样要求强烈。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强调，在研究自觉能动性的时候，还要注意研究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这些都是自觉能动性突出的表现形式。战争中的主动性，指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当然，军队行动的主动权不是空想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分不开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的。但是，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可变动的。因而战争的主动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页。

被动也是相对的，可变动的，不能凝固地看问题。同时，我们还须看到战争力量的强弱还不是现实的主动和被动，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战场上实际的主动和被动，是同指挥员的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分不开的。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如果主观指导有了错误，就会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地位。

战争中的灵活性，指的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灵活不是妄动，更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随意性，而是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他用“渔人打网”要撒得开又收得拢的生动比喻，来说明游击战争领导者的灵活指挥。游击队要灵活地使用兵力，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时而神秘转移，时而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灵活使用兵力，特别要注意掌握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也就是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

战争中的计划性，是指一切行动的预先周密计划和准备。指挥员要想达到预想的作战目的，不能离开计划性。但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偶然性，战争中实现计划性较之人类其它社会活动更为困难。战争情况瞬息万变，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战争的计划性还是有客观基础的。只要指挥员善于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又从同一中把握对立，就能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的长河中，找出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稳定性，制定好作战计划。如果认为战争具有流动性，因而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是完

全错误的。

总之，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都是自觉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主动性是中心，是目的；计划性是主动性的基础；灵活性是实现主动性的基本手段；三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论，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对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指导战争，把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当作战争的基点，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明确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将民和兵联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军事工作中的体现，是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那些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历史上的一切社会变革无不是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人民群众既然是社会

前进的决定力量，是阶级斗争的主体，而战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人民群众当然也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对战争的胜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性质，人心的向背。历史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是不能实现的。恩格斯指出："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① 列宁也指出："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地实现。"② 又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指导战争，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而且，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独创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夺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 他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把群众观点系统地运用于军事领域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过，"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3页。
②《列宁全集》第27卷，94—95页。
③同上，第27卷，第47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点。”①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识到，要战胜日本这样一个强敌，“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②他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时明确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③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战争所需要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将一事无成。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抗日战争的后期，各根据地的民兵已发展到220万人，人民自卫队发展到1000多万人，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总数的10多倍。有名的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等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各地民兵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到处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参战174万多人次，作战近30万次，歼灭敌伪军10多万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充分说明，只要动员了人民群众，就能充分发挥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造成弥补武器装备不足等缺陷的补救条件；就能使军队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就能布下天罗地网，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就是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武器装备现代化了，也要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页。
②同上，第2卷，第478页。
③同上，第3卷，第932页。

定不移地坚持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二、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 并特别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因为人民军队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不能对付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就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就不能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这些思想深刻说明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还在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第一，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他指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与军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割裂。如果丢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页。

掉了政治，丢掉了革命化，就不能坚持人民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离开军事、技术谈政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把军队建设搞好。

第二，官与兵、军与民的关系。毛泽东规定的官兵一致的原则，是我军区别于其它剥削阶级军队的重要标志，也是部队战斗力的源泉。他认为官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官兵矛盾的双方又不是均衡的，官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兵是非主导方面。因此，要密切官兵关系，就要开展拥干爱兵运动，着重从干部做起。一方面，干部要爱护战士，端正根本态度，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去带兵；另一方面，战士尊重干部，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把干部当成自己的兄长。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毛泽东还认为，军与民的关系，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辩证统一的。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完全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所以我军的利益和奋斗目标与人民的利益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民要谋取自己的利益，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有一支彻底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人民军队要生存和发展，也必须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第三，军队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强调高度集中，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仅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准则，也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人民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集体，不但要有民主，尤其要有

集中。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没有基础，只能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武断；如果没有集中，就不可能有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军队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不可能打胜仗。因此，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既要认真发扬民主，又要防止和克服极端民主化，健全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

毛泽东在强调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同时，又规定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三大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建设中的生动体现，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坚持三大民主，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维护我军的集中统一，增强内部的团结，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战斗队与工作队、生产队的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为我军规定了三大任务，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是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体现，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人民军队来自工农，为了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一面做群众工作，这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他指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在战争年代，我军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生产，把战斗队与工作队，战斗队与生产队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了千难万险，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但三大任务不是等同的，是有主有次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部队，不同的条件下，部队所担负任务的重点和要求是不同的。但一般来说，战斗队是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

面，而工作队、生产队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人民军队只有在不妨碍根本任务的前提下，才能去完成其它任务，如果忘了这个根本任务，去做其他工作，那就是本末倒置。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体现着活生生的辩证法思想。

三、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我军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组织上正确解决了正规武装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把各种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真正形成一座钢铁长城。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军思想的重大发展。他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把人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他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还有民兵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组织民兵和自卫军，在此基础上，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能产生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由于实行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战的积极性，在人民战争中才能打败国内外一切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体制中，野战主力兵团是主体，地方兵团和民兵是两翼，三者互相联系、互相配合。虽作战分工不同，但目的一致，是党领导的统一的武装力量整体。

主力兵团是我军的骨干，担负着对主要敌人的作战任务，或执行机动性较大的任务，在地方兵团和民兵的大力配合下，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特别是战略决战中主力兵团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兵团是介于主力兵团和民兵之间的人民武装，它相对地比较固定在一定的地域执行着保卫根据地和打击敌人的任务。地方兵团是主力兵团的有力助手。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两者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而且地方兵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还可以转化为主力兵团，以提高作战的能力。

要进行人民战争，只有正规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广大的民兵相配合。这是因为民兵是正规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是支前的主力军。民兵人数多，分布广，熟悉地形，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是正规军的有力助手。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广大民兵，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的打法，到处袭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加强正规军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民兵建设，落实全民皆兵的战略思想。

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固然是武装起来的群众，除此之外，人民群众中还有许多非武装的群众，如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它行业的各种人民团体。动员他们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如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军队，替军

队运输粮食，优待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资困难，甚而帮助军队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都非常必要。如果没有广大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配合作战，就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人民战争的威力。只有把非武装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支援战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战争中人力、物力的需要，才能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

坚持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由野战军随时执行超地方作战任务；地方武装同民兵在一起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民兵除了配合军队作战外，还要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向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且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这样，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野战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就可以把亿万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最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处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第八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运用和展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展开。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哲学思想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的。首先，毛泽东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了“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两对概念（见1936年11月—1937年4月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他指出：“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① 并明确指出：“‘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②

华北事变后，我党即开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进关，以武力要挟。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了极点，矛盾一触即发。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切爱国将领和士兵，一切党派、团体（包括国民党）以及一切民族和侨胞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继“八一宣言”之后，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3页。
②同上，第68页。

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这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就变成了次要矛盾。这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依据。接着，毛泽东在1937年5月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变。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①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基础之上的。

其次，毛泽东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解决中日民族矛盾这一特殊矛盾的主要方法，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②他还指出，"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③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是做不到的"。

第三，他在阶级分析中注意某些社会阶级的两面性或两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②《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

性的分析，在把握其阶级实质的同时，又把握其不同条件下政治态度的变化。

民族敌人的入侵，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他深刻分析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新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认为，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异常软弱，具有两面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动摇着，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当受到殖民地化的威胁时，这一阶级内部有起变化的可能性。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有可能参加抗日斗争，另一部分则有采取中立的可能。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也有分裂的可能。因为中日矛盾"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①。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从阶级关系方面提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第四，毛泽东还根据对时局的辩证分析，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他指出，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

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同样要经过很久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规定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这是形势的另一特点。这两种特点和事实要求"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这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但是，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片面地搬用本本上的教条，把中间势力定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采取打倒一切的"左"倾政策，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毛泽东批判了这种"左"派幼稚病。他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同世界上一切事物可能变动一样，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可能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现时的革命力量不足，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制定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因此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抗日战争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关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光辉著作，从哲学思想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完整的一个历史文献。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

最后，毛泽东还从国际政治力量的估量来分析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客观根据。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各持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国际上不同力量的存在，和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对国际上在对待中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进行了科学分析，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供了国际上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指出：在欧洲，德、意帝国主义自始至终支持、怂恿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德国为了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拒绝参加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讨论日中问题的国际会议，而且积极向日本提供军火援助，鼓励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意大利则成为布鲁塞尔会议上日本侵略者的代言人。

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地位，采取了两面手段。日本要独占中国，威胁着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这时英美同日本之间就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了某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企图利用中国的抗战，削弱日本的实力，达到维持和恢复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地位。这是英、美帝国主义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英美又害怕中国人民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因此，尽管英、美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它们仍然希望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在东方反苏反共的前锋。为此，他们在“中立”的幌子下，坚持纵容日本的侵略政策。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从开始

就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广大群众的同情引到积极行动的道路上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各国共产党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方式，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以国际援助。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坚决支持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8月，苏联主动地和中国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中国以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英勇作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此，毛泽东充分阐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西安事变”这个时局转变的枢纽，采取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联合抗日救国，以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中心，作为逼蒋抗日的重要步骤。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进一步说明了党的抗日主张，表明红军愿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我们首先号召统一反日救国力量组织抗日联军总

司令部”。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共赴国难，第一次公开地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同时，党中央派周恩来赴西安东北军的驻地与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定，并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对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也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就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开始建立起来。

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这封信里，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称国民党军队为“友军”。12月1日，红军将领19人，又致信蒋介石，重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的主张。

12月初，蒋介石飞到西安，紧张地部署“剿共”军事，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剿共”命令，进攻红军。否则他就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并借机搞掉张杨的军队。同时，蒋介石在西安对抗日青年进行逮捕和屠杀。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反对，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12月7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张学良只得硬干，实行“兵谏”。12日清晨，捉拿蒋介石和陈诚等数十名国民党军政大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这些历

史事实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的爆发决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

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扩大中国的内战，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方面的关系。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的利益，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是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张、杨部下将士和西安人民，多数主张杀掉蒋介石。形势十分紧张复杂。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认为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事变可能有两个前途：一是内战爆发；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中央反复研究，决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发动内战的阴谋。

17日，周恩来等抵达西安，协助张、杨处理事变，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使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以实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了国共两党十年的内战，化干戈为玉帛，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西安事变”这一国民党内部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的结果。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毛泽东根据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原理，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党在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上，只讲服从、退让、联合，而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放弃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独立组织一支人民的武装。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党却束手无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认真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矛盾，系统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适时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而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虽然互相联合，保持了一定的统一性，但由于阶级基础和各自的利益与要求不同，因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面前，统一战线中各种政治力量围绕民族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展开着复杂的斗争。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表面上表示要抗日，暗中却准备中途妥协投降。他们既想利用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的进攻，又害怕人民力量的壮大会动摇他们的专制统治，因而顽固地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抗战。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妄图借日军消灭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杀共”之计不成，又生“溶共”之计，在八路军改编时，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在各师及总司令部派驻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要求在教育、管理上完全一致。并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

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国民党要限共、溶共、灭共；共产党要求生存和发展。这样，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对统一战线中组合起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关门主义，反对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则是右倾投降主义，过份的相信和看重了国民党的力量。

这时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王明。早在1937年5月，他在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所写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中就鼓吹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将陕甘宁边区改为特区，也不仅仅是改变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这是党内最早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党的洛川会议上，这种右倾情绪也有所表现。一些人对国民党的进步性估计过高，对其反动性认识不足。红军改编后，由于迁就国民党的干涉，有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削弱了党的领导，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还有些人产生了“议会主义”倾向，主张把革命根据地内的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改为资产阶级国家式的议会制度。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发生了无原则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这些情况表明，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情绪有所增长，投降主义倾向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

1937年11月王明返回延安。他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拼命反对党中央原来制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企图用他自己的一套右倾主张来指挥中国抗战。在王明的要求下，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坚持唯心主义观点，置中国的实际情况于不顾，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党内抛出了一整套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全盘否定洛川会议精神，反对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的观点，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的主张，等等。王明扬言他的有些主张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从而迷惑了一些人，尤其是获得了某些有右倾思想的人的共鸣和支持。

会议以后，王明到了武汉，在长江局全面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12月25日，他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公开宣传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理论，肉麻地吹捧国民党和蒋介石"代表了国民党最大的力量"，"坚决抗日"，有"雄才大略"，只有他能够领导抗战。说什么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等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妄图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这种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抹煞国共两党的阶级本质区别的论调，是王明的唯心史观的彻底暴露。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限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泛滥。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民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加上党内"左"

右倾错误，因而出现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党内矛盾互相交织，异常复杂的情况。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共产党人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还是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革命势力？在统一战线中是一切依赖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抗战成败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一贯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在1935年12月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7年5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时，他还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应争取民主和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他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刘少奇在《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一文中也指出：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常常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因此必然要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放弃与停止对于阶级斗争的领导，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放弃对工农群众的组织与教育工作，放弃对军队的争取和领导。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尖锐地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11月12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

务》的报告，强调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他联系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提醒全党不要忘记“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的严重后果。他分析当时党内的情况时指出：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因此，全党必须坚决地与投降主义作斗争。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他强调，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确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是争取这个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他还阐明了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的相互关系，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又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些阶级分析，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统一战线的生动体现。

1937年11月，周恩来也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的情况，在从山西临汾发给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必须“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训练干部，扩大红军力量，以增强主力的决

定作用，赞成“刘少奇提议三个月扩大红军到十万”的主张。11月16日，周恩来又在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演说，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电报中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1月又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阐明了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始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没有统一性就没有统一战线；但独立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是相对的，居于第二位。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种情况是由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决定的。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阶级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就是统一战线中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

我党由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拒绝了国民党企图控制我们的反动要求，因而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各个革命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

义”倾向，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在军事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因而保证了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工作上的胜利。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矛盾学说的结果。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力量对比，科学地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为我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他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①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制定统一战线方针的一个根本点，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之一。

毛泽东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同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使策略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以保证战略计划的完成。当然，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性，超出原则的让步和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原则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6页。

性是灵活性的基础，灵活性则是为实现革命原则性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斗争时，既不能借口讲灵活性而放弃原则性，也不能把原则性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比如，在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党中央改变了十年内战时期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实行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实行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政策。这样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壮大。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法。

毛泽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法运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成功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广大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力量。这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依靠力量，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因此，只有尽一切力量，发展和扩大进步势力，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争取时局好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为抗战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它们是处于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社会力量，是可以联合和争取的力量。毛泽东出色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

此，共产党的策略是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采取说服和批评，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然，这种争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争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同革命人民是对抗性的矛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当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这两派是有区别的。抗日派有两面性，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只要顽固派还愿意抗日，我们的政策就是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这种时间越长越好。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企图消灭我们，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对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只有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其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能保护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才能迫使他们保持同我们的合作，避免内战。至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中的降日派，则是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对待这种降日派，共产党实行“孤立和斗争”的策略，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制止他们的降日和妥协。这是利用顽固势力中抗日派和降日派之间的矛盾，孤立分化顽固派，进一步发展进步势力和争取中间势力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是毛泽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争取团结了中

间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也只有反对顽固势力，才能争取抗日的顽固派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也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具体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的创造性贡献。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者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必然陷入形而上学。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党内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系的原理。右倾投降主义只讲同一性，不讲斗争性。他们这种思想表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反动派，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左"倾关门主义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他们这种思想表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想，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这里所讲的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那怕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同盟者，同他们结成统一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21页。

线，以打击主要的敌人。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不放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并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转变为武装斗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它进行坚决斗争，革命就会失败。要在联合、团结中看到矛盾和斗争，又通过斗争达到联合的目的。他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里极为生动地说明了既联合又斗争政策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还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反共政策，准备投降日本时，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联合。不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但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有理的原则，就是自卫的原则；有利的原则，就是胜利的原则；有节的原则，就是休战的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这时，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联合，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这就是每一具体斗争的暂时性。如果应该斗争时不去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派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就会走上投降的道路，内战就不可避免。相反，如果应该联合时不去联合，就不能集中统一战线的一切力量，以对付主要的敌人。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使党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有了比较全面统一的了解，克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

抗日战争中，我党多次打退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进攻和

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时，蒋介石国民党突然进攻我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毛泽东"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指导下，我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又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发表严正声明，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参政会和掀起全国的抗议运动，同时在军事上坚决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成功。一方面，联合了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象蒋介石这样的反共顽固派，曾经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曾经调集数十万军队"围剿"红军达十年之久，在抗战时期仍然继续反共。但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我们党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还是同他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限制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杰出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完整而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0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正进入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侵略者的引诱下，妥协空气、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他们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思想领域也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制造一套理论来反对共产党。国社党头目张君励首先发难，于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视为“目前之障碍”，而以“统一力量”、“利于抗战持久”为借口，叫嚷要共产党自动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狂妄提出要共产党把军队交给蒋介石指挥。接着，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主要内容，是要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并确定了反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3月，国民党又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抗战旗帜的掩护下，把国民党法西斯专制主义“精神”合法化，用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纲

领。

国民党为了大力宣传“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收罗了一批反动御用文人，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托派分子叶青，在1939年，接连抛出了《中国政治问题》、《抗战中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章和小册子，造谣谩骂共产党，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声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就不必要了”。叶青还公然主张“取消共产党”和取消“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显然要的是国民党的一党“统制”，要的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假三民主义。

在这场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企图走中间道路。当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层要求的各党派，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反动政策是不满的。但是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达到改善他们政治经济地位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思想的斗争也仍然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已被克服，但其思想影响还继续危害着抗战事业。1940年3月，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再版，就说明了这点。同时，由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党内又发生了某些“左”的倾向，幻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在这个关键时刻，全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心，开展了一场思想理论的斗争。为了回答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使中国革命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不致迷失方

向，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4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揭露了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反动性。同年7月，张闻天发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的文章，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同汪精卫主张的三民主义一样，都是假三民主义；指出真正的三民主义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表示"我们共产党人要同国民党同志们在一起，同全国各抗日党派在一起，同全国人民在一起，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9月，王稼祥发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立场与意见。他指出：共产党人之所以承认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是由于它与马列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在其主要的口号和要求上，是"一般的一致"，所以成为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是马列主义的民族民主纲领比三民主义"更要彻底更要坚决"。他通过对两者进行具体比较的方法，科学地阐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张君励、叶青之流的反共谬论。

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党的状况和所处的复杂环境，提出了建设党的重大任务，论述了如何建党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大法宝的提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都有所论述，但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科学概念还是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紧接着他在1940年1月，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以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形态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的光辉典范。它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认真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正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自周秦以来的全部历史，分析了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变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20年的历史经验，正确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纲领。它以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明确地区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旧两个历史范畴，论证了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它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这些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是毛泽东思想系统化和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我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在四十年代初产生不是偶然的。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看，1939年前后，我党制订了抗日救国的纲领，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胜利结局。这时，抗日战争的结局和未来中国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便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需要将抗日战争及其前途放在整个中国现代革命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来考察抗日战争，这样才能一方面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战中坚定信念，和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妥协投降、反共分裂的逆流作斗争，从而更好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另方面，为将来抗战胜利后形势向有利于人民方向转化作准备，为建立一个新中国作准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典范，是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辩证法的重要篇章。列宁、斯大林论述过殖民地民族问题，指出殖民地人民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进一步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两种，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它不仅是我党建立革命根据地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力量和任务的认识，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已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实践意义和科学性，已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检验和证实。

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题的基本的根据。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为基本依据，还是以“本本”为依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态度。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 这就为认清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条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

如何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出发，来认清中国的国情呢？

首先，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分析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便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中国后，中国又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一贯强调矛盾分析法，他在分析了旧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之后，紧接着又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的斗争及其尖锐化，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诸种矛盾的同时，还从矛盾的联结与转化上，阐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他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历史的时代。"①这就是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时，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显而易见，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各阶级的特点，进一步作了具体分析，特别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进行了具体分析，明确得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一科学的结论。

他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而且还具有独特的优点。它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

少见的；它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等等。基于上述理由，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成为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

根据对中国国情、时代特点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具体分析，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则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从而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三、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确地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任何社会意识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都是为建立和巩固一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既然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占有领导地位，那么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也必须居于领导地位。离开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就不能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就必然引起文化的变革。毛泽东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①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前者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影响和作用。革命文化的能动作用，就在于它能指导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认为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以无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反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战线的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 他还强调，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革命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若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

毛泽东在做了这些分析之后，科学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关于政治纲领。这个纲领的基本要求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国体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即政体，既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在组织上，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构成形式。

关于经济纲领。其基本要求是铲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主要是没收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城乡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关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特点已如前述。毛泽东还充分地论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批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问题上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既明确地反映了民主革命的要求，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深刻地体现了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思想。

四、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阐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革命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创造性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毛泽东认为，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因此，他一方面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整个性质来讲，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买办资产阶级，革命的锋芒只能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可以争取的同盟者。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

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而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它的任务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由于这两个革命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任务不同，所以这两个革命的性质也不同。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样，两个革命过程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上升运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互相衔接的，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作好准备，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道路。

他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既是革命阶段论者，又是革命发展论者，反对在中国革命步骤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只看到两者的联系，未看到其区别，因而不了解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上的不同，急于超越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

对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企图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一次革命论"实质上是不要革命，是一种纯主观的空想。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两个革命阶段截然分开，只看到两者的区别，未看到联系。他们不懂得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道理，因而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这些观点，从哲学上说，都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体现。

毛泽东在批驳"一次革命论"的同时，还批驳了国民党企图用三民主义包括一切革命的"一个主义"的谬论。他科学地分析了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同部分与不同部分，明确指出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基本政纲相同的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而蒋介石国民党所谓三民主义，则是反动的假三民主义。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还在于宇宙观不同，革命彻底性不同以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等等。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间就有质的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除了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外，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我们是革命发展论者，在条件具备时必须将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容许在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我们又是革命阶段论者，主张革命是分

阶段的，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不容许搞“一次革命论”。这就是毛东所阐述的革命发展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创造性地提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思想。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

一、毛泽东伦理道德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重视道德修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古老文化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诸如义利关系、群己关系、志功关系（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知行关系以及人性善恶论和“克己”、“内省”、修身养性的道德自律等，在历史上都曾经起过道德调节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视伦理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道德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说明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它与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超阶级”道德不同，公开声明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结和概括，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

思想武器。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文化优秀伦理道德思想的批判继承。毛泽东虽然没有写过伦理学方面的专著，但散见于他一生当中各种论著、演说中的伦理学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重视伦理道德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他开始接受的是封建教育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后来，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在杨昌济的指导下，读了《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等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仅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下了1.2万多字的批语。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世界观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因而他的伦理学思想也开始向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转变，在实践中认识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人类的解放"的伟大意义，转而赞颂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宣传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伦理道德思想。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了无数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典型人物。如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坚定信念；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等等。毛泽东在许多讲话和著作中，高度赞扬了革命先烈们的这些优秀品德。为了

提高革命队伍的无产阶级道德水平，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思想，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给徐老的一封信》、《为人民服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地、概括地表述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也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把无产阶级伦理道德进一步具体化，集中地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个命题既是党的最高宗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最高原则和集中体现，又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特色，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既是无产阶级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又是无产阶级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本质，还是共产主义道德评价的标准即价值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核心。它充分体现了革命队伍中新型的人与人关系的要求，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作用。

任何阶级的道德都有自己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以后逐渐演化为"三纲"的封建道德原则。资产阶级的道

德原则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根据列宁的论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就是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集体主义原则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在道德准则上把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把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主要行为规范。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全面深刻地论述了集体主义原则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紧密相联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集体主义原则的核心；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实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方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集体主义原则应用于个人思想行为上，要求人们树立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或大公无私的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这就是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提出了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最高道德标准。他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可见，毛泽东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

观，他讲的革命第一、他人第一，民族和群众利益第一的思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道德观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阶级实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本质，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道德理想是人的理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们在道德上努力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它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理想人格。一定的道德要求以道德上完善的个人形象表现出来，为人们提供一切高尚道德品质的样板和应当追求的最高典范。无产阶级道德理想是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衷心向往的理想人格。道德理想的核心涉及“人生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人”等这样一些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对“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回答，它解决了无产阶级道德理想所追求的人生奋斗目标，其根本点是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道德理想。

生死观问题，是道德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生死观。生死问题更突出地体现一个人的道德价值观。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

是死得其所。”①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他还强调每一个革命者要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提倡英勇牺牲的精神，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所以这种精神是最高贵的，最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要求。他曾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张思德、白求恩发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建国后又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每个人都以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为榜样，做到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就为广大人民树立了共产主义道德追求的完善的个人形象和道德品质的最高典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是无产阶级道德评价的标准即价值观。道德评价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所作的好或坏、善或恶的一种道德判断。判断善恶的标准在阶级社会中以一定的阶级利益为准绳。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因此把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作为善的标准。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行为，就是善的、好的、道德的；反之，就是恶的、坏的、不道德的。毛泽东把“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和“为人民服务”作为“作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评判标准，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毛泽东认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主要在于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贡献自己力量的品格，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就具有最高的价值。毛泽东以白求恩、张思德等同志为楷模，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的真谛，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5页。
②同上，第906页。

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他看来，大公无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我党我军的革命本质，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在道德评价和价值观问题上，还有一个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在善恶的具体判断标准上，自古以来存在着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派。前者认为应该以行为的动机为根据，后者认为只有行为的效果才是评价善恶的根据。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坚持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他指出：唯心论者强调动机否认效果，机械唯物论者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和狭隘集团的动机固然不好，但仅有为大众的动机而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他也不管的一样。他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那些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人，无论他怎样在口头上宣扬自己动机的善良，他的行为也是不道德的，应当受到人们的谴责。

动机和效果如何统一呢？毛泽东认为，根本的一点还是要由实践来解决。因为动机和效果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统一起来，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有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他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在这里他既承认人的行为的动机，也承认人的行为的效果。人的道德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实践过程。

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

毛泽东在动机和效果问题上，还强调行为效果上的革命功利主义。他指出：“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功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核心，体现了道德的社会作用。

道德修养对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发挥无产阶级道德的转化作用，使人们通过自觉的主观努力即自觉修养，形成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作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毛泽东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时指出，工人阶级有一个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过程。共产主义道德这一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实践同科学共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道德并不等于一般的工人阶级道德。为了建立新社会的新风尚，普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依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在他主持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些公德，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人们共同生活的客观要求，是评价和判断我国公民道德行为的标准，就其基本精神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共产主义道德在新时期的主要规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革命队伍内部新型的人与人关系的要求与体现。人们的道德关系同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权关系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关系。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发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这种矛盾归根到底是物质利益的矛盾。道德的基本问题正是调节、制约和规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标准是调整人们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

由此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论从共产党人的道德实质和阶级属性，还是从共产党人的道德原则、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修养来看，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这种道德，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毛泽东对道德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他对道德的评价，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及其符合人民利益的效果为基本依据的；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道德人生观、生死观的论述，都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主要标准的。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经常以

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一种感情。"①这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国家环境里诞生，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表现出对自己的祖国由衷的热爱，从而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这种神圣的感情成为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伟大、崇高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祖国"将落入于异族侵略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廓将非复我之城廓"的国难，他激励爱国有志之士，英勇奋起，使"无数之义师继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他大声疾呼抗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②这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之情。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事业，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总结。他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光辉著作，就是论述爱国主义的一篇典范之作。在这篇著作中，他专门写了"中华民族"这一章。他认为，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贯串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格。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和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毛

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6、67、30页。

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

他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这就是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是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的联合”，“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革命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爱国主义就和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传统的爱国主义给予马克思主义解释，使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紧密联系，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加以区别。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所以，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根据其内容的不同，有各种的爱国主义。毛泽东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条件下来决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反对的。”① 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区分各种不同的爱国主义，站在正确的立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6页。

采取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强调民族自尊和自信的教育。他指出：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华儿女世世代代，无不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作为一种高尚的美德来颂扬和追求，把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视为可耻的卑劣行为加以谴责和鞭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千古佳话。从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岳飞，讨还故土、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痛击英国侵略者的林则徐，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世代为人民所敬仰。毛泽东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族英雄充满了崇敬，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歌颂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可贵气节；他歌颂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他还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他为耸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时写道：“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些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精神力量。

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把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思想。他明确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

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两者之间其所以有内在的联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也是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和支援分不开的。同时，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又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有力支援。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无产阶级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首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才能有效地支援世界革命，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另外，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才能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联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他还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阐明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日不仅是中华民族保卫祖国、自救解放的斗争，同时又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争取本民族的解放，也就是为解放全人类作贡献，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已经获得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甚至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后来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承担民族牺牲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伟大表现。

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的伦理思想

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著作的时候，正是我们党为了顺利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战争而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的前夕。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刘少奇的这两部著作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被列为党的整风文件。另外，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写的《人为什么犯错误》一文，着重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人们犯错误的原因和如何少犯错误以及对犯错误应采取的态度。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补充。刘少奇这些著作的发表，对于培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它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道德问题，又是一本很好的伦理学著作，为毛泽东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立场，以承认人的社会性、实践性为前提。

刘少奇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他以人们在同样的经历、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锻炼，所受的影响和结果却并不相同的事实为例，进一步证明了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总是离不开自

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有的人进步得快，有的人进步得慢；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在革命实践中落后了。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思想基础，而且也由于他们的主观努力和修养不同。

刘少奇提倡在社会实践中修养，同我国古代的那种唯心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修身养性，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由此可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道德观，强调基于实践的道德自我修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刘少奇还指出：在革命实践中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的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总结了我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

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共产党人党性原则所决定的。

正是从集体主义出发，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到服从的地位。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必要时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维护党的利益，这是每个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也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解放。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完全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就是服从人民的利益。离开党和人民的利益，去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还从集体主义出发，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光荣与耻辱、勇敢与怯懦、忠实与虚伪等道德范畴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倡以多做工作、当人民公仆为荣，沽名钓誉、居特殊地位为耻；以患难时挺身而出为勇，遇艰难设法避开为怯；以对自己缺点有如"日月之食"、勇于承认和改正为强者，以怕得罪人而求"洁身自好"、迁就错误为弱者；以诚恳坦白，"事无不可对人言"为忠诚老实，以投机取巧，"看人看势说话"者为虚伪等等。对道德价值观，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而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

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对善恶观，刘少奇也有许多论述。他指出善与恶的问题，历来是争论不休的。以往的道德家大都爱提所谓“善良之心”，但这只是虚妄的空话。只有共产党人才具有真正的人类的同情心，它表现为对同志“忠恕”，与人为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而对敌人，对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等著作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重要论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

第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开展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系统清算了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深刻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一、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一个伟大创造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运动，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

学、宣传辩证法的思想教育运动；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运动；是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整风运动也是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运动，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竞赛，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可以说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前后历时五年，分为三个阶段，即高级干部联系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实际学习理论的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高级干部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延安整风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心问题是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整风运动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首先，从思想路线来看。

1935年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只是着重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1936年瓦窑堡会议才着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到延安后，毛泽东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又进行了深刻分析。但是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有极大欺骗性，因之在思想上彻底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还远未完成，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未彻底解决。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新形势下，他从“左”转到右，抹煞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正确论断，鼓吹“不分左中右”、“凡抗日者皆吾友”。他还反对毛泽东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鼓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迎合蒋介石“统一军令政令”的要求。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

当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党内又一度出现“左”的倾向。有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就要分裂，怀疑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的论断，不注意团结中间势力，在统一战线中只讲斗争，不讲联合，产生了“左”倾关门主义。

党内“左”右倾思潮不绝如缕的事实，说明错误路线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① 为了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避免“左”右摇摆和盲目性，还必须把理论交给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他们识别和抵制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水平，这就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同时，还必须采取系统有效的步骤和措施，把理论化为政策，化为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以保证理论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毛泽东又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从政策上和工作方法上提供了抵制“左”右倾错误的理论武器。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主观主义，解决全党的思想方法问题，需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0页。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作出正式结论，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分析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找出改正这种错误的详细办法。整风运动正是适应当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而开展的。

其次，从党的建设的需要来看。

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为新党员，并且出身于农民或其它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许多人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未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不熟悉党的历史。这就为主观主义在党内的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开展整风运动，正是为了从思想上建设党。

第三，从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来看。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即最困难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实行“扫荡”和“三光政策”，从对国民党作战为主改为对共产党作战为主。我党根据地急剧缩小，人口减少，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加之国民党又配合日本对我方进攻，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战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以战胜困难，为转入战略反攻，迎接胜利作好思想、组织和物质方面的准备。这时党采取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两项根本措施，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四，从整风运动更深层更根本的目的来看。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叶青曾在三十年代《论学术中国化》一文中提出“中国化”的概念①。但他指的完全是另一种涵义。他借口中国的“特殊性”、“国情论”，偷运

①参见《艾思奇文集》，上卷，第553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他说，"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依据中国的特殊经验，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根本修改，使之变成另外的东西"，"它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中国化"①。他认为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改变，"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②。

叶青的上述观点在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中遭到了艾思奇的驳斥。后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艾思奇在同年4月武汉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率先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③

毛泽东吸收和借鉴了上述论战成果。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他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公开发表时的称谓）的号召，提出"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④。1939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这一概念，他从两个方面表述了马

①参见《艾思奇文集》，上卷，第553页。

②同上。

③同上，第387、38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⑤同上，第667页。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方面任务：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革命实际，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运用它以使“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使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文化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化。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1年9月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他又提出“使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用以说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理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实际上，从1940——1941年，延安“新哲学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旋律发表了多篇论文，如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和培元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张如心的《论创造性的学习》和《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艾思奇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都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艾思奇更进一步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它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①

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信中也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并指导这种实际……。”② 1943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也都

①《艾思奇文集》，上卷，第551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2页。

分别提到马列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由此可见，随着毛泽东一系列理论著作的发表，在延安理论界和中央领导人中都已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已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是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著作。

整风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广大干部参加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群众运动。整风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从通俗化、大众化向着具体化、中国化发展。国外学者也注意到这点。如英国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整风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困难环境中的团结和纪律，向战争期间发展的党员灌输马列主义知识；另方面，提高党员的觉悟，“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①施拉姆还承认，在整风运动结束时，毛泽东“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他也确立了自己离开莫斯科而独立的领导地位”。

二、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

延安整风的最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解决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矛盾。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给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936年毛泽东写作《两论》，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展开了对主观主义的哲学批判，分析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表面性的关

①施拉姆：《毛泽东》，第188、190页。

系，论证了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根源。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从各个方面和角度进一步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判，把反对主观主义提高到学风问题即党的思想路线上来清理，大大深化了对主观主义的认识。

反对主观主义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突出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主要是在同主观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特点决定的，也是由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决定的，是由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决定的。

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它一切哲学的根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长河中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具体哲学形态，无不体现这种统一，这是它内部发展的共性。但是怎样体现这种统一，从哪些方面去体现，体现的程度、范围、方式、特色等等，这些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里又由于所处历史条件不同，而各有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任务是创立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铸造革命的思想武器；列宁的任务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俄国的实际，解决如何使一国革命率先胜利的问题。

毛泽东的历史任务不同，不是要去系统地创立另一种新哲学，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是"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用这一理论，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途径，并在结合、应用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

义理论。这就必然要和反对这种结合和统一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处的历史条件，也使反对主观主义成为突出的历史课题。

首先，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标志，社会主义已由科学的预见和理论，变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现实，在革命由准备阶段转入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工作方法正确与否，亦即主观认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兴衰成败。这就使批判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在当代国际共运中突出出来。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为了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和哲学理论形态上的唯心主义如拉萨尔主义、杜林先验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论战。不批判这些理论形态上的唯心主义，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廓清道路。但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在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形态上的唯心主义如叶青、张东荪之流的观点并无多大市场。哲学上的两军对战，主要表现为实际工作中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哲学论敌的这种变化，使得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再次，二十年代后期，国际共运中出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潮。共产国际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否认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得不和共产国际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指导作斗争，和硬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作斗争。

第四，中国党内易于产生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党内许多同志的理论水平不高也有关。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立

即投入革命运动之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十多年，它是幼年的党，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苏联十月革命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特别重视外国尤其是苏联的革命经验。但是党内许多人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列主义的词句分开，不善于应用外国的经验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或者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其根源都来自教条主义，来自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的词句，搬用苏联的经验。所以反对教条主义，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践中的唯心主义，和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有关。中国哲学文化的特点是实践理性。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历来倡导经世致用、学以致用，倡导习行哲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曾经长期争论不休。这些对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进行深刻哲学批判，解决理论与实践，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不无影响。

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批判了以米哈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社会学。1918年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他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对主观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① 列宁特别批判了主观主义用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偷换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他说，“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①

由此可见，列宁在同国际共运中“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时，已注意到揭露其认识论方面的根源，特别是注意批判他们用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偷换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但是列宁还没有直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没有提出解决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他还没有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解决理论和实践结合之根本一环，作为反对“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之关键来抓。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只是把主观主义（主观盲目性）作为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而毛泽东则已将主观主义具体分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着重分析了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列宁提出了“主观主义”的概念，但没有来得及展开和发挥，没有把它作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作为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工作路线相对立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来分析批判。

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进行系统、深刻的哲学批判，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毛泽东哲学思想提出和承担的。正是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起来。为了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深刻、系统、全面地论证了主观主义的实质、表现、特征、根源、危害及纠正办法，卓有成效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中，毛泽东首先对什么是主观主义作了科学分析，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学风。学风不单是学校的学风，也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所以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又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他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概括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几种表现，即：（1）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忽视客观实际的存在；（2）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3）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不是为了找立场、观点、方法，而是单纯学理论，一心向往“万古不变的教条”，理论与实践脱节；（4）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文风上华而不实，形成新八股、党八股；（5）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表现为宗派主义。总起来讲，主观主义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1942年在《中宣部宣传要点》中，他又指出，“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②

主观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在思想形态上也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1页。

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8页。

主观主义不管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是“左”倾冒进，还是右倾保守，其认识根源都是在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违背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路线，都是脱离实际，把一般真理或个别经验看成纯粹抽象的公式或万能的灵丹妙药。他说，“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①他还说，“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②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③

主观主义的根源也来自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无论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④，“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乱套。”⑤思维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是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根源。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所以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僵化、凝固化、程式化。“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⑥他还分析了主观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性，“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⑦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2—113页。
②同上，第432页。
③同上，第42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页。
⑤同上，第2卷，第286页。
⑥同上，第3卷，第785页。
⑦同上，第2卷，第196页。

鉴于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强调，“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他把主观主义的危害性，把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来加以阐述，这在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所以整风普遍开展后不久，毛泽东就表示决心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彻底，搞好，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实质、根源和危害性，而且指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实际工作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在国际共运史上首创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自觉地、有效地克服主观主义的成功经验。整风运动对犯了主观主义以及各种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和风细雨的、有系统的党内思想教育运动，是克服主观主义、改造世界观的有效途径，是在全党进一步端正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工作路线的有效途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途径。在整风中，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另方面从总结党史，总结中国革命的正反面经验入手，使广大干部从切身体会中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线，认识主观主义的危害；第三方面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述三者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号召。他将整风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和意义相比较，指出五四运动是从封建老八股、老教条中解放出来。① 延安整风则是从“左”倾教条主义即党八股、洋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之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党八股、洋教条是对五四运动积极精神的反动。1942年3月他在中央白区工作总结会上讲，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高高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整风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统一和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因之，这是比五四运动更深刻得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革命文艺领域中的运用

1942年5月，毛泽东两次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发表了讲话。5月30日他又到鲁迅艺术学院检查整风学习，重点谈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即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着重论述了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中当时存在的各种见解和争论，归根结底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而产生的。他还指出文艺工作中也存在唯心主义、教条主义、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空谈以及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歪风，因此文艺界也要整风。文艺整风的目的正是反对上述错误倾向，解决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

毛泽东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到立场、态度和世界观上来分析。他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才能彻底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而这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①。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例外。”②他针对文艺工作的特殊性，着重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的关系，既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又指出“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③。“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④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⑤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⑥。他批评了那种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②同上，第809页。
③同上，第3卷，第826页
④⑥同上，第831页。
⑤同上，第815页。

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的错误论调，指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确实会破坏创作情绪，但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习社会，深入实践斗争的过程。所谓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① 文艺工作者只有通过这两个学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和改造，从而将立足点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到工农兵大众方面来，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反映论角度，着重论述了文艺的源泉问题。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他说，“人民生活中本来蕴藏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② 他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们实际上“不是源而是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②同上，第817页。

他指出，文艺中教条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在文艺源泉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作为观念形态的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当作文艺的源泉；把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把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变成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他指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生活，研究和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和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进行创作，这样才不致于成为鲁迅所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文艺来源于生活，从而和唯心主义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而且还论述了文艺又高于实际生活并作用于生活的能动的反作用。他指出，文艺和生活相比，“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所以人类的社会生活虽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实际生活而要求文学艺术。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后者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鼓舞人们去实现更高的理想，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论及文艺批评、文艺作品的价值评价标准时，他提出政治和艺术、动机和效果、内容和形式、歌颂和暴露（光明和黑暗）等等的辩证关系。他说文艺批评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反对进步，拉着人民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弱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那么，这里说的政治和艺术标准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他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他继续发挥和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他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或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① 无论是政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都要看社会效果。

那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又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认为，任何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其次，政治又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有些作品其政治内容是反动的，但却可能具有某种艺术性。这种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我们则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第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认识论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统一起来，指出文艺作品中的爱与恨等等都离不开革命实践、阶级斗争实践需要的判断。爱是观念的东西，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0页

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他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当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带有当时时代的特征。例如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较多，又把政治归结为阶级斗争；又如只强调阶级性，不加分析地批判“人性论”等等；但这也要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来分析，不可作脱离历史的苛求。

四、刘少奇对王明主观主义的批判

整风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也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是批判教条主义的重要著作，后两篇当时都列入整风文献之中。

1939年，刘少奇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思想，重点论述了共产党人要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主观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的必要性和途径。

刘少奇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

务。”①。他指出，“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②这也正是整风的目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尖锐批判了王明理论与实践脱离的教条主义错误，分析了学习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根本对立态度。

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说，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马列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把这些书籍中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中去。他尖锐指出，党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列主义的术语，就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去……拥护他为领袖”，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

他指出，与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相反，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种人，“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③只有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他还强调，“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有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

①《刘少奇文集》，上卷，第98页。

②同上，第99页。

③同上，第106—107页。

丰富和发展。”①这种提法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少奇还论述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的统一关系。

他批判了一些人的经验主义倾向。这些人以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就完全行了，有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没有关系。他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为例，说明不掌握马列主义这个思想武器，不加强理论修养，就不可能在情况复杂、变化剧烈的环境下确定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方针政策。他还论证了学风问题是一个立场和思想意识问题，从而为整风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值得指出的是，刘少奇早在1939年在《论修养》中已三次提到“实事求是”。他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②又说，“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③；他还说，有旧意识和个人杂念很多的人，“不能敏捷地、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各种问题。”④但是这里还未将“实事求是”作为和主观主义对立的一条思想路线，还未能从哲学高度对之展开论述和发挥。

在1941年7月发表的《论党内斗争》中，刘少奇重点提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分析了中国党内经常产生“左”倾错误的历史根源。

他强调，中国党内斗争，其错误不在于放弃斗争的右倾，而在于斗得太厉害的“左”倾。产生这种“左”倾错误的原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0页。
②同上，第106页。
③同上，第114页。
④同上，第115页。

因，在于我们教条主义地照搬列宁反右倾的经验，而忽视了中国建党的具体条件并不同于列宁建党的条件，列宁主要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背景下建立苏联党的，因此列宁当时着重批判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十月革命前，在苏联党内"左"倾还未成为系统的倾向性错误。直到1919年—192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党内才产生"左"倾错误，列宁因而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着重对之进行批判。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并未受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大影响，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议会斗争，没有产生过工人贵族，中国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占相当的比重。好的一面是，一开始建党就是列宁式的党，有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的传统；坏的一面是不注意反"左"，只讲斗争或斗争过火，对列宁反对右倾的著作较注意，而对列宁后来的论"左派"幼稚病的著作则研究不够。

除刘少奇外，党的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在整风中也都批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

五、《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主观主义的总清算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领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一份重要文献，是整风运动的丰硕成果。它总结了自党成立到抗战爆发，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历史，对十年内战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这个文献为七大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对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团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决议》是毛泽东领导下的集体创造的产物。其基本内容和重要思想观点都来自毛泽东，并经他亲自修改审定。1944年

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就整风过程中党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这就是《学习和时局》一文，它确定了《决议》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1944年5月中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是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四人。1945年春又成立了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的各个小组，以讨论《决议》草案。在张闻天对《决议》修改稿的抄清件上，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决议》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正反面经验。它重点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特别批判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指出王明的"左"倾路线比李立三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分别对它进行了批判。《决议》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判了"左"倾错误，指出"一切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①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更特别表现为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估价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②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决议》对主观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8页。

②同上。

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的特征、根源，它和教条主义的共通之处也作了分析，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都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就有许多共同的错误认识。经验主义又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和"附庸"，教条主义正是借助经验主义而得以实现其统治。

《决议》还分析了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特点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而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囿于小生产的狭隘性、保守性，其思想方法易表现为经验主义。总起来看，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表现为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把局部当成整体。

总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总清算，是整风运动的总结，是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系统全面的总批判。

第二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通过延安整风，批判主观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趋于全面成熟，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

场、观点、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就是化为指导思想，并体现于革命实践中的哲学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它最能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实事求是既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青年时期熟读孔孟儒家著作，受顾炎武、颜元、王夫之、李塨等人“经世致用”的“实学”的深刻影响，也受曾国藩思想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他研读的上述诸人的著作，也来自他的老师杨昌济。

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在《讲堂录》中摘抄了潘耒为顾炎武的《日知录》所作的序言，对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足迹半天下”，“留心当世之故”以及“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很是佩服。在《讲堂录》中，他还记下曾国藩的格言“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表明了对曾国藩的实事求是的心服。在给黎锦熙的通信中，他还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早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表现在追求“大本大源”上，深受宋明理学和曾国藩的影响。

五四运动后，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这些都与反对虚学，强调“实学”有关。他提出“讨论事理，应当‘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

"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目标。

青年时代他还学习顾炎武采用"游学"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反对闭门求学。五四运动后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1920年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讲到，对中国地盘内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青年时期实事求是思想之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他通过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接受了康德的二元论的影响。他当时所写的《〈伦理学〉批注》，阐释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思想，强调道德实践，强调实践理性，这与杨昌济对他的影响也有关。所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前，中国传统儒学的实用理性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对他已有深刻影响。

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治学方法和学风，到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如前所述，毛泽东青年时期受过儒家"实学"的重大影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重视调查研究。五四运动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更注重从客观现实出发，从中国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状况出发，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写过《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十年内战时期，他在井冈山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已包含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特别指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完全

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从而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说，有一种方法是要学习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①这里实际上已包含从敌我双方的“实事”（实际）中求“是”的思想。在《两论》中，他从理论形态上完整地阐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实际上论述了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又以最完备的形态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写的其它著作如《论持久战》等文中，也都包含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正式提出“实事求是”命题是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那里，他说，要说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这里已指出“实事求是”是科学的态度，是与“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态度。

1941年1月31日他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提出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

②同上，第3卷，第623页。

注意学习科学，不要得意忘形，否则“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①。

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第一次明确地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相对立，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命题进行批判改造，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涵义。他指出，在学风上和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即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他说，“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实事”就是事物（“事”即“物”），“是”就是“理”，也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论述，批判继承了曾国藩将朱熹“即物穷理”和汉学“实事求是”相贯通的思想。但是他又赋予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以崭新的内容和生命力，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需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这里和曾国藩等儒家学说根本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明确提出“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更在于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去实事求是。这就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命题，可以说，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将“实事求是”和“思想路线”直接加以联系，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但是他已说明实事求是的学风，并非单指治学方法或求实学风，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他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②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他在“七大”纪念册上又题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八个大字。“七大”又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了党章。从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确立下来，成为和主观主义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精辟概括，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综上所述，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去作政治和阶级估量”，“马克思主义是要学的，但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同上，第771页。

和中国实际结合”，到三十年代中期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再到四十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后概括出“实事求是”这个命题，这一过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不断结合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不断深化和概括过程，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过程。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命题的丰富内涵

“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的总体性范畴，它有多层涵义。

第一，实事求是是一般唯物论的中国化的表述。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和核心。出发点问题是根本问题，是认识路线问题。实事求是对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实事”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则是从客观事物中“求”出来的，亦即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过程中把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运用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中，化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实事求是就是“有的放矢”，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涵义赋予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和主观主义斗争的一个丰硕成果。

对实事求是，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理论的巨大作用，强调正确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什么是理论呢？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

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①]另方面他又反对把马列主义理论看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和现成结论，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整风中，他对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1941年3月以后，他在读书批注中批评了那种用马列主义理论词句，随便解释事物的恶劣习气，认为“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③]这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只有在应用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称得上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结合，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

第三，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涵义，就是能动的反映论，即反映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实事求是过程，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概括的认识的能动的飞跃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求是”过程不仅是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同时又是主体主动地逼近客体，用科学理论去把握客体及其内在规律的过程。“求是”的目的正是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②同上，第778页。

③《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3页。

律的主观能动性，以便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毛泽东说，“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①

实事求是就是不停留在客观事物的现象上，而是要去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实事求是包含着两个飞跃，包含着认识过程的推移和运动。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出发点不同（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原则或先验性经验出发），而且在于前者没有“求是”精神，不懂“是”是认识不断飞跃的结果。客观存在的“实事”不断运动发展，人们对“是”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发展，因此实事求是永远不会完结。

第四，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其涵义和完整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这三句话，综合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依次上升的整体。作为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主观和客观相符合，首先要解决是从主观到客观，还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路线问题，即出发点问题。这里所说的从实际出发，是一个科学的原则，又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是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内容和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要从“实事”中“求是”，要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还不能停留于从实际出发，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确定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获得正确认识指明了方向，它是把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正确工具和方法。

---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作为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针对主观主义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必然要求反对主观主义；同样，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特别注意实际工作中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正是达到主观和客观一致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五，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的这一层涵义，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涵义。它表明实事求是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用中国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来表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实事求是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其所以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和革命的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充分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作用，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节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思想，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问题的创造性成果。它和认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方法、思想方法一起，构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方法论问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特别突出。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哲学原理转化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原则，制订出党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调查研究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般与个别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是哲学从理论形式向应用形式、从原理向科学方法和工具的转化，是哲学向现实的飞跃，也是哲学自身的实现环节。

一、毛泽东历来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重视哲学原理或思想路线转化为方法和工具的功能和作用

哲学只有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科学方法，才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什么是方法？方法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黑格尔曾说，“方法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①方法既与客体相联系，又与主体相关联，是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为达到特定的目标而采用的手段或方式，是主体把握客体及其内在规律的过程、步骤及规则。方法虽与主体相联系，但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从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它既受客体特点的制约，又被客观规律所规定。

方法是哲学原理、哲学世界观的转化形式，是理论达于实践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方法较之哲学原理，具有更大和更明显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特点。没有方法这个中间环节，理论就不能

①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207页。

解决实际问题。只有通过方法，理论才能过渡到实践中去，才能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能动的飞跃。方法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手段。

毛泽东历来重视方法论的研究，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他在1939年1月致何干之的信中，将自己重点研究哲学，称为“作工具的研究”①。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又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单独的方法论。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种统一，当然并不等于两者等同。那种以为学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能自然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科学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统一一面，又有差别性和矛盾一面。正确的世界观可以为科学工作方法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前提，但它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工作方法本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强调把理论、世界观转化为实践的方法，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不懂得把理论转化为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把理论看成不可转化的僵死教条，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哲学原理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化过程和新的表现形式问题。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系列中间环节，认为只有通过这些环节，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相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结合。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并强调了中间环节的层次性。他指出，首先要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纲领和路线；其次转化为政策、方案、计划；再次转化为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不是某个哲学原理的简单应用，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对诸多哲学原理进行有机结合和综合应用的结果。所以，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哲学原理在指导实践中的综合应用的特点，表现为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统一。

二、整风运动不仅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要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长期过程中，一贯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同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相对立，并将反对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看作反对主观主义，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一环。他从三十年代初提出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到四十年代初整风运动中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这一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是反对主观主义的过程。

早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提出在反对主观主义时，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提倡马列主义本本要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表明已认识到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关系，并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和命令主

义。1934年他又专门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是当时的两大任务，强调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同时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具体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他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如果说，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以前，对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还只停留在较一般的论述上，那么从《两论》开始，他就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从哲学高度，从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来论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并且逐步概括和总结出普遍性的领导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理论的飞跃时期。他已明确提出将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化为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通过这一中介，前者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起指导作用。他也强调，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不仅表现在学风、文风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方面，而且表现为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工作方法。因此整风运动不仅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也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工作中的体现。

1943年毛泽东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正式提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对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理论的系统形成。他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什么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呢？毛泽东指出，“不注意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②这就是主观主义领导方法的特征。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这是错误领导方法的根本特点。

三、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扩大红军、查田工作、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而且积累了抗战时期边区和根据地进行各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延安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提供了重要的领导工作经验。在这个基础上，1943年毛泽东写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系统地概括和提炼了几种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同上，第855页。

合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认识论中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的体现。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认识一个个的具体事物，进而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然后再在一般认识的指导下，深入认识个别的事物，以丰富已有的一般认识。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在领导方法上体现为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般号召是动员广大群众，但它还必须和具体个别指导结合，做到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指导一般，并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同时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否则一般号召就有落空的危险。

这个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从过去党积累的长期工作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特别是1942年的整风提供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例如延安马列学院的整风、文艺界的整风以及各军分区的整风运动都既有共性，又各有特殊性、特色；既经过共同性的一般号召和动员，又都按照各自特点进行各种具体的个别指导，取得了具体经验，然后利用这些经验指导一般。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个别指导就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也就是后来总结的试点、蹲点等方法。个别指导和一般号召相结合也就是以点带面。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不能脱离一般。毛泽东说，任何领导人员，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

（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历来认为，领导方法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紧密联系群众的问题。他指出，凡属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是联系群众的；反之，则是脱离群众的。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这个过程正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过程，因为实践正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

这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一切为了群众，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同上，第995页。

一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由于领导者总是个别和少数，群众相对于领导者就是一般。而群众又大致分为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因此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毛泽东提出这一方法，也特别根据了1942年的整风经验。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①。但是领导骨干必须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②

二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方法，也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的发展和组成部分。因为无论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还是坚持下去的过程，都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将群众中的个别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而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然后再拿这一般意见到个别单位中去试点，去总结经验，去指导工作，这种坚持下去的过程，也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然后再集中新的经验，再形成新的指示去普遍的指导群众。这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认识的过程。

三是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重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同上。

工作任务的布置，上级部门应找下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而不应当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应当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并推动全体人员去做。“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方式”。这种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工作方法，在战争年代保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的指挥，非常必要和有效。

四是统筹全局、决定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应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种原则时，必须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决定工作重心的领导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方法，即辩证方法。毛泽东将《矛盾论》中“抓住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的思想运用于领导方法之中。由于任何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有许多矛盾存在，这些矛盾地位有主次之分，作用有大小之分，结构有层次之分，因此根据矛盾发展过程中居于主要地位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即主要矛盾，来确定工作重心或中心，是非常必要的。决定工作重心就是抓住现实生活中对全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的矛盾。我们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对诸种矛盾不能等量齐观、平等对待，而要注意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既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又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将这个“统筹全局，决定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的方法，

概括和发展为“抓中心”和“弹钢琴”的方法。

（三）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方法，是我党重要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智慧结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趋向系统化和成熟也是在延安整风期间。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关于农村调查》两篇文章，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制订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我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理论总结，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态度和基本方法，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升华。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具体环节，看作理论和实际沟通的桥梁。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就要了解情况。“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①他说，“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②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他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科学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②同上。

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惜许多同志常常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

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重要方法和基本一环。他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指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①。在他的倡导下，1941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延安时期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形成的重要方法和标志。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制定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开好调查会，如何眼睛向下、详细占有材料同时又抓住主要矛盾以及如何进行典型调查的方法等等。他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即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包括观察、分析和综合。观察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观察只能看到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的印象，这是初步的、笼统的认识。而要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他把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形象的称之为"四面受敌法"。他说，"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②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为了大规模地系统地开展周密调查，延安时期，党中央及各中央分局都设置了调研局等机关，收集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组织各种类型的调查团深入下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张闻天1942年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一些县作调查，回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深刻体会到调查研究是“打破教条的囚笼”的根本办法。他还提出“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①。延安思想文化理论界的其它同志，1940年后在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方面，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总之，毛泽东制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用中的转化形式，是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的中间环节，是理论达于实践的桥梁，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应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都是适用于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它们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工作方法上的体现，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绝然不同。

毛泽东把实际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他经常说，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方法问题，而是党性问题、世界观问题，是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整风运动不仅从世界观的高度解决了思想方法问题，也解决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大大提高了干部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水平。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清算了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改造了党的

①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6日。

学风，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认识大大提高；同时在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经验又进行了讨论，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样，全党达到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这就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并规定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从此，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全党公认和接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形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指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逐步形成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定时间内，毛泽东思想发展所达到的程度（理论深度和广度）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则是指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何时和怎样产生和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使用，无疑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脱颖而出，已臻于完善和体系化，已为大家所公认和了解，并已在实践中表明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

化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形成和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和使用，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即从1935年—1943年“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和1943年—1945年“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到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阶段。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已开始萌芽和初步形成，毛泽东已写了一些重要著作，但当时党内先是右倾后是“左”倾错误占居领导地位，毛泽东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尚不大为人所知，同时也还未形成系统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情况开始变化。经过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党的高级干部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1935年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党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认识的一次飞跃。

1935年毛泽东到延安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1938年他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后，围绕这一概念，必然要求进一步对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名。

实际上从1940年至1941年，延安“新哲学会”和理论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旋律，已发表多篇文章，酝酿着“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表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机业已成熟。

1940年杨松发表了《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①，阐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发展过程、成绩及不足，并论述了今后的任务。他提出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把中国文化、中国学术马列主义科学化的双重任务，这是毛泽东1941年提出使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先声。

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先兆。他还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②同年4月他在《解放》周刊第127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讲得更加明确。在简略地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几个例证之后，张如心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它原因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

1941年5月30日在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几天，张如心又发表了《论创造性的学习》的文章，重点批评了教条主义的一个表现，即"对于我党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马列主义中国化上许多的成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典型的著作底研究重视不足，甚至某些加以漠视"③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毛泽东"创造了许多第一流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底古典著

①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载《中国文化》，1940年，第5期。

②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

③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周刊，131—132期。

作”。“近几年来我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获得了大的成绩”。他还说：“当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不研究和熟悉毛泽东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把毛泽东列入马恩列斯导师之列，提出成为毛的门生，把创造性的毛泽东旗帜高高举起。”①

1941年6月和培元发表了《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文中也指出“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研究，更能使我们知道怎样才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怎样才能中国化”②。

同年8月，艾思奇发表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实际应用和中国化的成果和辉煌范例，其中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朱德、张闻天等人的文章。

由此可见，在1940年至1941年间，随着毛泽东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两论》、《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的发表，延安理论界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是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著作。

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经过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全党思想认识更趋一致，加之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整风的几篇文章，这时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也纷纷使用“毛泽东的路线”等概念，到了1943年更直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①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周刊，131—132期。

②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2、3期合刊。

1943年8月周恩来在《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同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②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同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还说，“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等等。

当然，1943年，毛泽东本人曾表示过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他在4月22日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③

1943年—1945年是“毛泽东思想”概念从提出到为全党所接受，并被“七大”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

从1943年王稼祥和邓小平先后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起，到1945年5月党的“七大”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正式作出科学规定和系统阐述止，历时共两年。这期间，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正

---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

②《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页。

确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等提法。在我党历史上刘少奇的《论党》(1945年5月)对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他正是在延安理论界和党的领导人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阐述的基础上，作出这种概括和集大成的，也是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的。

在《论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节，刘少奇首先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他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正式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②。

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中(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中。

刘少奇接着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政策等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①

刘少奇还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可贵与不易。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极大的特殊性，由于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也由于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例如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象欧洲以工人为主要群众，中国革命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等等，这就使得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使其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成为“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以成功的。

接着他分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必要条件，指出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这就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作精确分析。同时还需要无限忠于人民事业，相信群众，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具备上述素质和精神，才能依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他称颂正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一“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

“七大”的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是“七大”党章的最大特点。

1945年后，“毛泽东思想”概念在全党普遍使用。它既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两种涵义未严加区分。而随着建国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完全被理解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直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进行界定，突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明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界限。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过程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过程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1945年前人们虽尚未明确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概念，但随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也在酝酿之中。

1937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938年6月他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要求。在这之前的两个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也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任务。

1938年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了主观主义，全党进一步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经验，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总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更加关注。这时在延安理论界和党的高级干部中，已经常论到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着重指出毛泽东其所以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他说，“从毛泽东手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按：该提纲只编了一部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别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①

1941年6月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讲授提纲》，指出“特别是对立统一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

①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周刊，第127期。

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①

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哲学部分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部分单独分离和突出出来，这在1942年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②一文中已开始出现。他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总体分为三个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列举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1942年在整风运动中，大家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部分已有深刻认识。正如陆定一在《为什么整顿党的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一文中所说，“有了这七年来的历史（注：指遵义会议至1942年），我们就不仅在事实上看见什么叫主观主义，而且也在事实上看见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名词和抽象概念，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现在已经被解释成活生生的事实，变成了通俗的中国化的人人可以了解的东西了。马列主义被发展了，被推进了。我们的党已经把辩证唯物主义由‘自在之物’变为‘自为之物’。”③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很好概括和说明，也是对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作的酝酿和准备。

1942年7月1日陈毅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写的《伟

①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2，3期合刊。

②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19日。

③陆定一：《为什么整顿党的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解放日报》，1942年5月13日。

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之一，就是思想方法的新创造。

同年8月11日，艾思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文中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这里，艾思奇实际上已接近提出中国自己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概念。

“七大”召开前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对比党内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思想方法的角度，也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过程，指出毛泽东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第一天起，就着重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七大”前后，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已被多处翻印。但直到建国前，“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概念尚未产生。当时使用的意义近似的一些概念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毛泽东代表的“人民的革命哲学”等等。但当时人们已十分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将毛泽东哲学思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作为党的理论基础来理解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条件及意义

确立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党的指导思

想，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已被全党所公认、肯定和接受。这需要具备下列几个条件：

首先，毛泽东思想已体系化，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

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包括哲学、政治、军事、党的建设、政策和策略等各方面，而不是关于某一方面或某个问题的论述和思想。它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已较完整地显现出来，例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理论，都已基本形成。而且这一思想体系的总体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运用和发展，也已显现出来。

其次，毛泽东思想已为实践反复检验，证明它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的科学思想，在指导实践中它已发生重大作用。

毛泽东思想此时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是因为党已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挫折，在正反面经验的反复比较中，认识了毛泽东思想之正确和教条主义之错误。正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毛泽东思想脱颖而出并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总结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所带来的危害，是毛泽东思想为大家所接受的一个重要条件。王明的教条主义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用马列主义“本本”吓唬人，有很大欺骗性。只是在这种“左”倾错误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惨痛损失后，党内大多数人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之可贵。另方面，遵义会议后七年，党在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更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

再次，毛泽东思想已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即已理论化。

所谓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就是说这种理论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已上升到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和揭示，而不是具体经验的描述和个别政策的制定。同时，还体现在已写出一批较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著作。党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写了一些理论著作，为毛泽东进行科学的集中概括，提供了思想资料。

第四，这种思想已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即已具备有自身特色的哲学。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总的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不同于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代表作是《两论》。《两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批判了党内盛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深刻揭示了“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在《两论》基础上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突出和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最后，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接受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整风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通过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毛泽东提出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广大干部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大为提高，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个统一的思想基础，无疑就是毛泽东思想。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已产生重大的积极的思想成果；表明

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的党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表明全党有了团结和统一的思想基础；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运动已取得丰硕成果。总之，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也是必然的。当然，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随着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认识和研究强调不足。这就对建国后逐渐滋长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十章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及其哲学基础

抗日战争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益尖锐。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个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围绕着两个中国之命运，在哲学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哲学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两个中国之命运及其哲学论争中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一节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及其唯心主义哲学

随着抗日战争后期形势的发展，蒋介石集团更加强化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统治。1943年3月10日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唯心论哲学的集中表现和发展，是强化封建买办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

蒋介石集团为适应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炮制了一整套唯心主义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妄图以此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抗，为强化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提供哲学理论依据。

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是由蒋介石、陈立夫等出面炮制的。它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主要是将中国儒家哲学中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潮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等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它代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传统哲学的消极因素和封建糟粕的倾向，并企图使之现代化，以为蒋介石反动统治服务。

早在1932年，蒋介石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和《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等文章中，提出了“行的哲学”。1933年，陈立夫先后在《进展月刊》上发表了《唯生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以唯生论为题发表演说，系统地阐述了唯生论哲学。但是，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和真正关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情况不同了。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1944年陈立夫又发表了《生之原理》，使力行哲学和唯生论相结合，并作了进一步发挥。由于蒋介石集团以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作为他们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哲学基础，因而造成了广泛的有害影响。于是，批判这种反动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理论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场反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斗争，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这一场政治大搏斗在哲学上的反映。

唯生论的唯心主义本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体论上的唯心论。陈立夫声称世界统一于"元子"或"生元"。什么是生元？他说，生元"相当于《易经》的太极，太极是无形无象之本体，亦即《易》无体之体。"[①]"它具有神妙的智慧与伟大的能力"，是"宇宙间有生无息大智万能的主宰，西洋人所谓'上帝'，我们之所谓'造物者'。"[②]他还认为，"元子"是一种具有精神能力的实体，一身兼有物质和精神两种特征，世界就是由这种既为物质，又为精神的元子的不同配合而成。"宇宙间一切的东西，都是由精神和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之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不附丽于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无精神的物质。"[③]表面看来，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精神与物质的综合，似乎是一种二元论。陈立夫也标榜："我们不主张唯心一元论，亦不主张唯物一元论，而主张唯生一元论。宇宙之本体是生，我们可名之曰生元。"[④]然而，进一步剖析，唯生论在本体论上仍然是唯心论。从陈立夫对"生元"的解释就不难看出它的唯心主义实质。他还说，这种"唯生一元论"，"并不是说宇宙之本体是物质。因为我们不承认宇宙间有死的物质"。这就更加暴露了他们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实质。

唯生论对"诚"的解释，也暴露了它的唯心主义本质。唯生论从中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借来了一种表示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的"诚"的概念作为世界的创造者。陈立夫在《生命的动力

①陈立夫：《生之原理》第23—24页。
②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18页。
③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28页。
④陈立夫：《生之原理》第20页。

（诚）》的文章中提出，"'诚者物之始终'……如果没有'诚'，就是没有元子，也没有动力，当然更无所谓物了。所以说：'不诚无物'"。①他还说："诚为宇宙之根本原动力"，"这诚因为是领导一切存在去组织其散漫之力量，领导宇宙之进化者，所以我们名之曰生命（即存在）的原动力。"②蒋介石也极力鼓吹"诚的哲学"。他说："诚是革命的原动力"。"唯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③在这里，唯生论把人们的精神状态，即所谓"诚"，夸大为具有决定作用，成为可以决定物质的东西。这种夸大精神力量，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唯生论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唯生论的唯心主义还表现在为信仰主义作论证，鼓吹在"人的宇宙"之外的无限大的空间和时间是神的境地。陈立夫说："我们所知道的时间之极短的一段与空间之极小的一部，我们就叫他是'人的宇宙'。而人的宇宙，始终不是整个的宇宙……然则我们所不知道的那部分无限长的时间与无限大的空间，又是什么哩？又将何以别于我们刚才所讲的'人的宇宙'哩？我们无以名之，统名之曰'神'，或'神的境地'。"④陈立夫不但在理论上为"神的境地"作论证，而且承认事实上的超人类的鬼神的存在。他说："比人类更有精神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也一定是有的——如假传之鬼怪神仙之类。"⑤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唯生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哲

①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117页。
②陈立夫：《生之原理》，第149—161页。
③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④⑤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8—9、29页。

学。

第二，社会历史观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蒋介石集团把唯生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便形成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即所谓民生史观。

蒋介石集团否认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宣扬人类历史是求生存的记录，是"唯生而不是唯物"。蒋介石说："人类全部历史即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既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证明人类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①陈立夫把人类历史歪曲为强者和弱者相互结合与相互争斗的历史，说什么在原始社会，强者以智识能力的强大，可以战胜野兽，取得生存，弱者以智识能力的薄弱，必须依赖强者的保护而取得生存，这是"强容弱时期"；后来，野兽一天天减少，人类日益繁殖增多，为争"食地"而互相残杀，于是进入了"强凌弱时期"；之后，农业有了萌芽，"强者因为怜悯所俘虏的弱者而不加杀戮，只叫他们来做种田牧畜等生产工作，自己可以安享其成。奴隶制度，于焉形成，而封建制度随即发生，专制政体也渐渐盛行。"②这是"强奴弱的时期"。所以，在唯生论看来，奴隶制的产生，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与阶级压迫的结果，而只是智力不同的强者和弱者，在求生存中，以强凌弱的结果。

民生史观还宣扬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是社会进化的动力。陈立夫说："我们认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动力，正是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③蒋介石进一步说："人类求

①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②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54页。
③陈立夫：《生之原理》，第197页。

生存的意志和努力，足以推动社会的进化，而中外古今所有革命的事业，唯有依于人类生存的天性而出发，才能解决当前问题，增进人群幸福，促进世界大同。”①在这里，他们明确地承认，“人类求生存的意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根本上否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种将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归之于人类求生存的天性，是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儒家人性论相结合的结果。

民生史观还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立夫攻击说：“阶级斗争离不开人与人争，是野蛮而又消极的劫取而已。”②“‘阶级斗争’，是人类当进化时，因为物少，不足以维持人类的生存而发生的一种病态。”③他还污蔑说：“我们只应当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之分子不能以全体之利益为利益，而自私其阶级利益时的变态。所以阶级斗争的产生，唯在人不知其共生、共存之道时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上的堕落。”④在这里，陈立夫否认阶级产生的经济原因，否认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且攻击阶级斗争是“病态”，是道德上的“堕落”，这就清楚地反映出民生史观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公开反对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力行哲学是蒋介石集团唯心论哲学的另一组成部分，其主要的唯心主义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歪曲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把“行”说成是超时空的绝对，说成是决定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后本体。蒋介石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因

①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②③陈立夫《唯生论》上卷，第62、63页。
④陈立夫：《生之原理》第200页。

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①。什么是“行”？蒋介石解释说：“所谓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说的‘实行良知’”。“‘行’为性之表，所以‘行’亦与生具来”，“人之生也，是为‘行’而生，那么，我们的‘行’，也应当为生而‘行’。”②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对“行”的解释，当然不是指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而是指人类的先天本性，这种本性可以创造一切，支配一切，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

第二，宣扬“诚”是创造一切的原动力。蒋介石把自己的哲学又叫做“诚的哲学”。他说：“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的起点在于‘诚’，诚是由于不忍人之心，发于不能自已之势，古人说：‘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的神髓，可以克服一切，战胜一切”。“惟有诚乃能尽已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惟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惟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③他还说：“惟有至诚，始可以无妄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能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④在这里，蒋介石把精神的“诚”说成是创造一切的动力，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第三，力行哲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蒋介石说：“知识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

①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
②蒋介石：《行的道理》。
③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④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163页。

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①“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良知之知为内在的生而知之的知。”②这就是说，人们的感觉、认识或知识，是先天赋于的，人们只要内求于心就可以认识一切，把握一切。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宋明理学“存天理”和“反求诸已”的翻版。

蒋介石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宣扬这种先验论。他说：“所以总理常讲：‘你们一般党员只要照我讲的话，实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求另外的知’”。③这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把领袖美化为生而知之的先哲，而“一般党员”只要照着领袖的话去干，在“行”上盲从就够了。这是十足的蒙昧主义的愚民哲学。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化、系统化。《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早在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七月，他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专政”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思想。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公开提出法西斯主义。他在《国民会议开会词》的讲话中指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

①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162页。
②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
③同上。

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蒋介石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有三种政治理论，即“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 “自由主义之政治理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蒋介石说：“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之政治理论”“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以致“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唯“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

在蒋介石的带头鼓动下，国民党中蒋派人物及其御用文人开展了相当嚣张的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公开叫嚣：“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鼓吹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要“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等等，公开出版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籍，办了若干专门刊物。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法西斯主义狂潮。

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国民党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蒋介石的讲话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买办法西斯理论。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方针；1939年3月又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鼓吹“救国之道德”和“建国之信仰”就是蒋记“三民主义”；同年5月，蒋介石又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演讲，对封建买办法西斯理论作了全面阐述。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更是强化封建买办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系统著作，对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了系统

的发挥。

《中国之命运》一书共包括八章和一个结论，分别论及“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革命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等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作了歪曲的论述，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其主要的论点如下：

第一，歪曲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鼓吹封建儒家“固有德性”的思想。

蒋介石用封建道德决定论来说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他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所谓“固有德性”，就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就是所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中国立国的纲维”——“礼义廉耻”。他认为，“在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五千年的治乱与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并说：“由此种德性的推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宗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①这就是把封建统治的道德教条看成中华民族的象征。

蒋介石极力赞扬封建伦理道德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维

①以下引文均见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不再一一注明。

系作用。他说："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他还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是"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这样，蒋介石就直接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新道德，鼓吹继承儒家的道统，即君臣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和窒息人的个性的伦理道德。他鼓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把维护等级隶属关系的纲常伦理绝对化，企图以等级名分制和人际依附关系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他直接宣扬封建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智、仁、勇）等道德规范，鼓吹"恢复固有道德"以束缚人民。

第二，曲解中国近代史，制造反共、反民主的历史依据。蒋介石不承认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然而，他无法否认近代中国国势衰落的事实。但认为衰落的原因是"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

蒋介石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说：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因此要作“彻底改革”。这是蒋介石为反共反民主制造的一个理论根据。

第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使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系统化。

蒋介石认为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是中国命运的决定者，以蒋记“三民主义”为建国的唯一指导原理，他说：“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还说：“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正式宣布“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所谓“内政”，就是反共反人民。并说，中国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两年之中”。这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但制造了反共反革命的历史根据，而且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不等抗日战争结束，两年之内就要发动彻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唯心论哲学的批判

从理论上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唯心主义哲学，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1943年3月此书一发表，党中央立即组织党内外人士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一批判分三方面进行：

一是由党中央领导人发表讲话或文章，如朱德、林伯渠、王稼祥等于同年7月发表文章批驳蒋介石鼓吹的反动理论，并且向全国人民发出“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号召。周恩来于8月2日和16日分别发表《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讲词》和《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等文。10月毛泽东以《解放日报》社论形式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二是《解放日报》从5月到10月连续发表社论进行批判。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质问国民党》、《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底末日》、《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主义》、《国民党与民族主义》、《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这些重要社论对蒋介石集团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叫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三是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委托刘少奇组织领导这场斗争。刘少奇在延安召开了理论工作者会议，要求在认真研究这本小册子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展开对它的批判。接着陈伯达发表全面评论《中国之命运》的论文《评〈中国之命运〉》。其它如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齐燕铭的《驳蒋介石的文化观》、何思敬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续范亭的《感言》、邓发的《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绍苎的《中国法西斯主义之命运》、徐律的《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摧毁出版事业》以及胡绳的《论“诚”》等等，从政治、思想、哲学、文化和法律等各方面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反动理论的

本质，粉碎了蒋介石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为迎接抗日战争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对《中国之命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

抗战以来，毛泽东对法西斯主义的谬论及其实质不断地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1939年，他在《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等文中，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政策。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的反动实质，指出：蒋介石集团"'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①这就是汪精卫式的"反共人物了"。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还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一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叫嚣。指出："'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说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2页。

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①同年，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揭露了蒋介石的所谓“统一”的谬论。指出：“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是行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批驳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叫嚣。指出：“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②毛泽东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并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专政的斗争任务。

周恩来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集中系统的批判，他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讲词》和《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等文中，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特别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他指出，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③“蒋介石提倡力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②同上，第3卷，第873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5页。

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其不抵抗主义。"他还指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周恩来还批判了蒋介石的“诚”的哲学和唯心主义的道德观，指出蒋介石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他都没有诚意。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周恩来指出：从蒋介石这一思想体系，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二、对唯生论的批判

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唯生论哲学，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等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艾思奇在1941年发表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地对唯生论哲学的反动内容和实质，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首先，分析了唯生论的阶级基础与反动影响。艾思奇指出："陈立夫先生的唯生论，是在抗战以前很久就发表了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代表着十多年来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世界观，并且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与辩证唯物论相对抗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这种思想不象辩证法唯物论那样，在中国的青年中间受到真实的关心，然而因为是与政权的力量相结合的缘故，在中国十年左右的思想战线上，却能够保持了相当的影响。"①唯生论虽然早在1933年就已问世，但国民党用力宣传它，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以来，特别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其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动用了一切刊物与杂志对唯生论哲学加以宣传和阐述，这种哲学与反动政权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63—564页。

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逆流。

其次，分析了唯生论哲学的实质。艾思奇指出：唯生论哲学“主要目的是在于反对唯物论”①。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心与物的综合，就这一点说是二元论的表现。因为在他们看来，精神不是物质的反映，不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与物质永久平行地存在于宇宙中的东西。宇宙的一切万物是由“元子”所构成，而“元子”就是一种生命的单位，也就是“生元”，它是物质与精神的配合体。“这种‘见地’，并不是新的发明，而只不过是‘物活论’的一种中国的再版罢了。”②唯生论认为，所有的物体都具有生命、感觉或思维的能力，这就完全抹杀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质的区别，取消了意识只是具有高度组织的物质的特性。

艾思奇进一步指出：“唯生论只是在表现上是二元论的，在本质上却是完全唯心论的。”③这是因为唯生论不但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超人类的鬼神存在，极力给宗教迷信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从中国封建哲学中借来了一个精神性的范畴“诚”，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主张精神决定物质，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种精神性的“诚”派生出来的。显然这是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观点。

再次，艾思奇还分析了唯生论的思想渊源，论述了唯生论和孙中山宇宙观的本质区别。艾思奇指出，唯生论哲学是以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为渊源，但唯生论哲学本身，并不就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而只是对他一部分思想加以歪曲、附会、夸大的产物。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用“唯生论”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的宇宙观。而且，孙中山讲到生元，“只是指的构成生物的细胞，是有一定范围的科学名词，并没有用它泛指宇宙万

①②③《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64、566、567页。

物的构成单位。”①艾思奇的这一分析，划清了孙中山所讲的“生元”和唯生论所讲的“元子”的原则界限：第一，“生元”是指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精神）的客观存在——生物的细胞；“元子”则是指具有精神性的东西，是物质与精神的混合体；第二，孙中山没有把“生元”作为构成宇宙万物的单位，更没有把宇宙统一于“生元”；唯生论则声称“元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最微小的单位，认为宇宙万物不是统一于物质，而是统一于具有精神特性的“元子”；第三，孙中山虽然承认精神的作用高于物质，但并没有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存在；而唯生论则把精神的作用夸大为无所不在，连矿物都有精神。所以，孙中山的思想到了唯生论那里，已被附会夸大到十足的唯心论的地步。

艾思奇进一步指出，唯生论虽然同孙中山的思想“在某些论点上有渊源关系，然而思想本身和社会性质，都有很大的改变了”②。对此，艾思奇既从总的方面作了论述，又具体地作了分析。总的来看，唯生论是将孙中山具有革命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变成了具有浓厚的大资产阶级反民主色彩的哲学；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哲学改变为以唯心论与神秘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哲学。其具体表现是：前者尊重科学，反对迷信，后者则为“神的境地”作论证；前者的心物并重的思想，基本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后者则把精神的东西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前者讲旧道德范畴，如智、仁、勇，但努力充实新的内容，后者虽然运用新科学的新名词，如原子、电子，而实际上却注入了封建道德的旧内容。艾思奇的这些分析有力地揭露了唯生论所谓发展孙中山思想的种种欺人之谈。它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所谓发展，是向唯心论神秘主义方向的发展。

①②《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66页。

三、对力行哲学的批判

蒋介石集团的力行哲学，与唯生论一样，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艾思奇、胡绳等对它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艾思奇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中，从力行哲学论“诚”的思想、论知与行的关系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异同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首先，艾思奇批驳了力行哲学关于“诚”的思想所提出的各种命题的唯心主义本质。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以孙中山的名义谈到“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动之日”①。对此，艾思奇质问道：任何事情，任何主张计划，只要“吾心信其可行”，就一定行得通吗？他列举很多历史事实进行驳斥，例如秦始皇自以为皇位可以传到万世，结果第二世就灭亡了；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统治一千年，结果只维持了二十一年，等等。这些分析有力地揭露了力行哲学的所谓“诚”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艾思奇还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心”的作用，然而信心只有建筑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是主观妄想。

关于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命题。艾思奇指出，《中国之命运》竭力论证“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②，是和孙中山的思想有区别的，“如果说，‘心为万事之源’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里，有时还有某些接近合理的因素——当把这‘心’解释为‘万众的心’，解释为‘人群之需要’的时候，那里面就

①蒋中正：《中国之命运》第125页。

②同上。

有着某些可以接近唯物论的桥梁，那么，经过了《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的引伸，附加上中国旧封建时代的'诚'的思想，那合理的因素就完全没有了。"①这就是说，蒋介石把这个命题同"诚"联系在一起，把孙中山思想篡改成完全的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艾思奇进一步剖析说："什么是'诚'？干脆地说，这里之所谓诚也者，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词。庙宇的菩萨，都要向善男信女要求诚心诚意的去敬它。"②"唯心论和宗教是相通的。'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我们的许多寺庙里，许多测字摊上，常常挂着'诚则灵'的招牌，……蒋介石也有一块'诚则灵'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样，不过是勒索贡品的幌子罢了。"③这就指出了力行哲学的唯心主义同信仰主义的联系，揭露了蒋介石宣扬力行哲学为他的法西斯统治服务的政治实质，就是要人们诚心诚意地跟着蒋介石干下去。

关于"不诚无物"的命题，艾思奇指出，《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不诚无物"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是本源的，第一位的；精神，'诚'，是派生的，第二位的。"④因此，应该是：一、"无物不诚"；二，"不诚无物"。艾思奇的这一分析，是以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他说明了，物质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无物不诚"；其次，意识具有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不诚无物"。如果抛弃唯物论的前提，否定"无物不诚"，而侈谈什么"不诚无物"，这只能说明力行哲学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

关于心理建设"为各项建设的起点"的命题。艾思奇揭露

①②③④《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81、681、683、682页。

了《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建国工作之要目，是唯心史观颠倒程序的作法。因为，“蒋介石主张建国工作必须从心理建设开始。在他所举的五个要目——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中，他认为‘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而把政治与经济建设放在程序的最后一步”。①艾思奇指出，“这一唯心史观的颠倒程序的意义，就是要把物质的诺言推到渺茫的将来，同时又梦想用这空洞诺言来换取国民今天的愚忠。”②这一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力行哲学是一种不顾人民的物质需要，而极力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愚民哲学。

其次，艾思奇批判了力行哲学在知与行关系上的错误观点。

针对力行哲学在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唯心论观点，艾思奇指出：“《中国之命运》里所谓出自‘人类本性’的‘真知’，除了把它看做这种盲目的信仰与盲目的服从之外，是找不到别的解释的；因为它把经验的科学的知识都降到‘表面’知识的地位。试问世界上除了实际经验所证明的知识，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有什么真正合理的知识？”③所以蒋介石所谓的“真知”，实际上就是无知，其目的是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群众糊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的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

艾思奇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中国之命运》反复宣扬的“行”的观点。他指出，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实践，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第一，蒋介石所要求的“力行”，是凭借“诚”，凭借着所谓出于“本性”的“真知”，凭借着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84页，
②③同上，第1卷，第684、687页。

对于“主义”、“领袖”的偶像化的信仰，那就是宗教式的崇神行为。这种凭借着所谓“诚”、“本性”的力行，不是真正革命的行为。真正革命的行为，必须有科学的客观规律知识为指导，必须具体而深刻地了解周围实际情况，必须正确地认识民众，尤其是工农劳苦民众的希望和要求。第二，蒋介石所要求的“力行”，是盲从的行为，它要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想把封建时代愚民政策的统治施行到今天，所不同的，只是曲解和利用了“科学方法”的名义。显然，这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行动是背道而驰的。第三，蒋介石所要求于国民的“力行”，“是保守旧社会，遵循既有秩序的行为”，“要学习孔子一流的礼、乐、射、御、书、数”，“学习封建时代统治者所崇尚的行为”。可见，蒋介石的“行”的哲学是极端的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因此，艾思奇指出：“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我们应该揭破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①

再次，艾思奇还揭露和批判了力行哲学对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歪曲。

力行哲学一再宣扬它关于“知难行易”的观点，来自孙中山的思想。艾思奇指出：“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思想，和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是有根本不同之点的。”②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反映着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情况的。他之所以提出“知难”，是表明自觉地认识到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知识之艰难。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有着进步的唯物论的因素，合乎中国的客观实际。而力行哲学则抛开中国的实际情况，说什么“求之于己”的“知”，以及获得这种所谓“知”的艰难，因此，

①②《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91页。

“力行哲学”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而孙中山的思想则有进步的方面，有合乎科学和理性的方面。

孙中山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说明人的“智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不是如蒋介石所说，出自什么神秘的“人的本性”。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存在一些弱点，但力行哲学不仅是对这一弱点的简单重复，而是“尽量利用和扩大了他的旧的弱点”。这样，借着孙中山“行易”哲学的名义，来制作一套极不合理的唯心论的、鼓励盲从的愚民哲学。

力行哲学所夸大的孙中山关于“知难行易”思想的弱点是什么呢？孙中山的知难思想过份夸大“知”的困难，认为广大群众与知识无缘，只有少数人能获得正确知识；把知与行完全对立和隔离开来，认为“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等。力行哲学把这种观点进一步夸大为只要有一个精神的因素“诚”，就万事大吉了，“诚”是一切的原动力，“诚”是行的出发点。这样，在知与行的问题上，孙中山思想中的唯物论因素，全然被遗弃，剩下来的只是被推向了极端的唯心主义。

对力行哲学，胡绳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在1943年发表的《论“诚”》一文中，对力行哲学的“诚”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

首先，胡绳分析了力行哲学把“诚”当作知识的根源和出发点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在知识上把‘诚’当做基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法就一下子招来‘诚则明’、‘致良知’、‘明明德’那一批亡魂。这批亡魂之反科学是

①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

异常明显的。”①

胡绳进一步指出，如果用孙中山对知识的看法来说明“诚”，那么“诚”的意思正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应有的一种态度。“诚”的态度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在科学上是不能有一点虚伪在内的，非诚诚实实不可。科学上的“诚”的态度就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但是，象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来说明“诚”，“诚”就会一变而为知识的本体。认为知识都在人的心中，不必外求，只要反求已心，即可得万事万理，则“诚”就不是求知的态度，而成为知识的根源了。象这样不顾外物，去探索自己的“良心上的知觉”，是什么知识也得不到的。这种做法，无非是企图由主观愿望来杜撰一切知识。

其次，胡绳分析了力行哲学把“诚”看做是行为的原动力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在谈到知识论和行为论的关系时，胡绳指出，从根本上说，是实践（行）产生知识。但在人类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后，则行为又必须以真实的知识为基础。对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我们断然坚持，勇往直前，这也正是“诚”的态度。对于真理越是坚持着，越是用全心全力来为真理搏斗，行为也越是有力。“诚”的态度对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把“诚”看做是行为的态度，而把它看做是行为的原动力，以为行为不必对科学的知识有所依傍，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那么“诚”就被当作只是“决心”的意思。而决心又只是主观意念的产物。这样的行为论，其结果只好与法西斯的“行为论”异途同归。胡绳还说，东方专制主义的“诚”的神秘主义和近代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严格否定这种专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在实践中发扬“诚信”与“真诚”的精神，才是

①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45页。

对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

再次，胡绳批判了力行哲学用“诚”来解释宇宙社会的一切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用诚这空洞的概念来说明社会政治的原动力，其意义不过是抹煞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要求的作用。用属于人事范畴的概念来说明宇宙，其意义也不过是把物质世界化为有目的精神，而完成其唯心论体系。”①这就是说，把宇宙世界的本源归结为精神性的“诚”，这只能说明蒋介石集团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本质，其目的就在欺骗人民，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

胡绳还从诚与明的关系上对“诚”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作了分析。他认为诚是指内在的态度，它不能脱离客观的标准，而成为抽象的教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诚，而求得十分之知是明。认真的科学态度本就是‘诚’的态度，有这种态度才能求得真正的‘明’。能‘明’也就掌握了客观存在的法则与规律”。“所以倘把主观的‘诚’的精神脱离了对客观存在的‘明’，那么所谓‘诚’也可能只是武断、迷信。但反之倘只有客观的‘明’，而不能激发主观的‘诚’，只是把客观的法则当做外在的标准，那么纵然一时能一步一趋，那仍是勉强的，有动摇可能的。”②这里胡绳把诚和明的关系比作主观掌握客观法则的关系，指出客观决定主观，主观能动地作用于客观。而蒋介石集团的“诚”的哲学却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夸大主观的作用，认为主观可以脱离客观，仅凭主观的“诚”，不管客观事物的法则，就可以做到“明”。这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最后，胡绳还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集团“诚”的哲学的反动作用，他指出，把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一个“诚”字，并把

①②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46、139页。

人变成这个抽象概念的附属品，于是它也就变成了蒋介石一类“巨奸暴君酷吏”进行反动活动的“护符”。“所谓‘天人合一’论的作用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所谓‘尽性致诚’论的作用也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的实践。所以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下，‘诚’这一个概念，本是因企图说明人的合理关系而产生，却在神秘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殿堂，使人们顶礼膜拜，作为欺蒙与麻醉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揭穿的。”①

总之，批判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的这场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上的争论，而是关系到以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选择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把哲学问题，作为他“建国的根本问题”提出来的，是在中国维护其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因之，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国避免这种黑暗的前途和命运，争得一个民主的光明的前途，从思想理论战线上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节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的哲学思想

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根本对立，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指明了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抗日战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论述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论联合政府》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

①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44页。

之命运的光辉典范，在民主革命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当时，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

第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已为时不远。在欧洲战场上，1943年2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33万人，根本扭转了战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从此，苏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在我党的“七大”开幕时，“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在东方的抗日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着严重危机。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的伟大胜利，为美英军队提供了转机，使他们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方面来，发动对日本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和八路军、新四军，在粉碎了敌人1943年秋冬的大规模“扫荡”后，开始了带战略性的局部进攻。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在局部反攻中取得很大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下，日本法西斯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困境。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第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于1942年开展了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清算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大批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了思想，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端正了思想路线。在整风的基

础上，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这些都为党的“七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1943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以及灾荒所造成的严重物质困难，增加了人民的革命力量和胜利信心。总之，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1945年“七大”前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自卫军1000万人，建立了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19个解放区，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

第三，由于蒋介石集团推行内战和独裁的反动方针，中国存在着内战的危险。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抗战以来一直推行一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他们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妄图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抢占人民胜利果实，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当时蒋介石依仗在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都优于共产党，又有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帮助，于是1945年，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假惺惺地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可是又说：“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在国共两党的谈判中，他们提出，可以允许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是，共产党必须把军队和解放区交给国民党，决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下，蒋介石和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积极进行大规模反革命内战的准备，妄图使中国

仍旧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失败已成定局，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然而它们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反动势力还在作垂死挣扎，历史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大反攻的前夜，国民党在政治上极端腐败，它在全国人民中陷于空前孤立。蒋介石手下的军队，由于长期以来对抗日实行观战、避战政策，其作战能力大大削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越战越强，已经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它在“援蒋抗日”的幌子下，积极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阴谋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国民党反动派则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谋划在抗战反攻阶段到来时，即发动全国性的内战，妄图消灭英勇抗战的人民军队和并吞人民解放区，以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国各阶级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拖向黑暗，拖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旧中国去；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反动派，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是当时全部中国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4页。

《论联合政府》中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战胜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他在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①毛泽东所指的前一本书，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一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可见，《论联合政府》是与《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作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斗争的产物，是继《新民主主义论》后，又一篇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重要著作。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至理名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基本线索。毛泽东从这一观点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准确地预见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正确地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的战斗任务。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表明，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仅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既有顺利的一面，又有困难的一面；既有光明的一面，又有黑暗的一面。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历史的总趋势是什么，形势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心。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明确地指出，当时时局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4页。

的衰落；二是在反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这两个基本特点表明，当时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般逆流。虽然中外反动派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因此，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赢得进步。"① 世界历史的命运只能由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来决定，决不会由中外反动派任意摆布。因为历史的客观规律是：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进步必然代替落后，光明必然代替黑暗。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总是要求进步，要求革命，要求光明。任何企图改变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势力都会被历史潮流所抛弃，任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都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毛泽东还分析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期间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指出：1945年的世界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因为这时苏联人民已有了强大的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空前提高了；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新创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倒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当时，尽管人民群众的力量暂时在数量上还小于反动力量，反动力量还能猖狂一时，但是，历史的发展是由人民群众的斗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虽然使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空前有利。只要我们吸取三个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就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

三、唯物辩证地分析了两种可能性，论述了争取光明前途的条件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形势，预见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且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全面分析了革命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他告诫全党：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能够胜利，但要准备迎击困难，从最困难处着想。“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①。“谁要是只看到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②他通过对形势的具体分析，作出了革命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的论断，指出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种前途；另一种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我们要尽力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1页。

②同上，第1042页。

途，争取第二个前途。

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呢？毛泽东通过对矛盾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所处地位的科学分析，指出：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他在“七大”的开幕词中，对实现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的种种有利条件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同时在“七大”闭幕词中作了《愚公移山》的报告，号召大家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困难，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困难，敢于胜利，把党的纲领和政策变为现实，达到革命的目的。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新中国制定革命纲领提出战斗任务

为着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不但精辟地阐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而且结合当时的形势，对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现阶段的正确的具体纲领、具体任务和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国情和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经验，阐明了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主张新民主主义政治，即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党主张新民主主义经济，即坚持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所组成的经济制度；我们党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即主张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党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这个一般纲领，对于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来说，是最低纲领。这两个纲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及其同情者，一方面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为实现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一般纲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具体纲领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社会的根本矛盾——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没有改变，因而民主革命的一般纲领也不会改变。但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引起革命的对象和具体任务的变化。例如，北伐战争时期主要是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势力的矛盾，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现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战后的主要矛盾又将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变化，将使我们的具体纲领随之变化。他在《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

联合政府》中，还详尽地论述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各种具体纲领，即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自由和统一；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取缔官僚资本，发展中国自己的强大民族工业；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友好邦交。这些具体纲领，为完成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成为广大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强大武器。

在论述党的纲领和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衡量一切政党的纲领和政策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归根到底在于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他用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制定了党的纲领和政策，指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②实践表明，毛泽东当时为党规定的纲领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以至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

五、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而奋斗

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不仅需要有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有正确的思想作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行动。

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我们党的作风上的体现，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②我们党正是在同这种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培育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群众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是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我们党的作风上的体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是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但永远只是人民的一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他指出："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①这就是说，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去自己解放自己，反对任何恩赐观点和包办代替的作风；一切共产党人必须以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利益，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持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老爷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体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毛泽东说："二十四年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①把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上，他批判了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②并且强调说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关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采取的根本态度和克服缺点错误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们只有在不停的运动中才能抵抗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我们党只有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的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法，才能抵抗政治灰尘和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③同上，第1045页。

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他强调指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有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因为它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相信自己的事业完全合乎正义的，为了这个事业，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错误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

毛泽东关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论述，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从而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成为实现中国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他在“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以及《“七大”工作方针》和闭幕词《愚公移山》等一起，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文献。

第十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最后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最后胜利；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及时地分析和预见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矛盾，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重要思想，从而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新鲜内容，为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　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哲学分析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和重大的

变化。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观点，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刻地揭示和阐述了我国革命发展中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可能性，并相应地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党和人民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和斗争方向。

一、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科学地分析革命形势，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从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世界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却又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为了把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后不久，就在他撰写的许多讲话、文件和党内指示中，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及时地和科学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我国革命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地指出了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及其斗争的实质和集中表现。他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立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斗争。目

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①这就是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支配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日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时集中地表现为建立什么国的斗争。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保卫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

为了正确地把握和预料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向全党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分析和观察形势发展的科学方法。他指出，对于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会不会向我们党和革命人民篡夺胜利果实的问题，“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②从过去的历史来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积极投靠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深渊，妄图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这种全国范围的内战才没有爆发。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力图恢复它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实行空前的吞并掠夺，把敌伪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所建立的各种金融机构、庞大工业和一切商业财产据为己有，达到了官僚资本发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6、1070页。

展的最高峰。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内战，把他们退缩在西南后方的军队运下山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并把日本侵华时期所有的汉奸军队，更换名目编入蒋介石军队的序列，充当内战工具。他连续发布反动命令，公然让日伪军队“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许我军对敌伪军队受降，而要“就地驻防”，命令国民党军队，以收缴敌伪武器为名“加紧作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日本投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达八十万人，抢占了被我解放的城市三十一座。上述情况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夺的。

毛泽东在分析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的同时，还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他指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①还在抗日战争进行之中，美帝国主义就利用“援助”中国抗战的名义，积极扩展其侵略势力，企图在战后代替日本在华的地位。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在中国活动的全部中心，就是扶持蒋介石反动派积极准备内战。它不仅用飞机运送大批国民党军队至内战前线，以便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而且美国军队直接在中国的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在运兵、驻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同时，美国政府又给予蒋介石大量的贷款和物质援助，使蒋介石能够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进行内战。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范例，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9页。

对提高革命人民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深入分析和揭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保证了我们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在蒋介石进行和平欺骗和武装袭击中，革命力量不但没有遭到损失，而且在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之时，由于党和人民早有准备，就使他们的反革命图谋化为泡影，就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妄图消灭人民力量的反动派自己遭到消灭。

二、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间的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制定了我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正确方针，为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为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在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上，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国内存在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可能性的论断。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

的。”① 这是因为：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一百多万人数的革命军队，这是一支维护和平、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力量；其二，全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苦难之后，渴望和平，这是人心所向；其三，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其四，在国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人民普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等等。在上述种种因素和力量的影响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就有可能沿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也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毛泽东指出，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应该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能否实现和平是矛盾双方的事情，而不是由我方一厢情愿决定的。就我方来说，我们是愿意和平的，但蒋介石一方却并非如此。“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②

根据对当时存在着的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毛泽东为我党确定了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正确方针，这就是：一方面，要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并在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冲突之时，也尽量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准备以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6页。

②同上，第1071—1072页。

主义的新中国。

第二，在争取和平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反革命两面派的表现，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把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的思想。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反动派对付革命人民，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军事镇压，一手是和平欺骗。反革命的两手，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并用，有时以军事镇压为主，有时则以政治欺骗为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另一方面由于需要部署内战的时间，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玩弄和平阴谋，曾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和平谈判。他说要用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却又把西南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中前线，准备内战；他一面消极谈判，一面又在上党、邯郸等地进攻解放区；他一面叫喊还政于民，另一面又在重庆、成都、昆明镇压学生运动等等。

针对美蒋反动派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即以政治斗争反对政治欺骗，以武装斗争反对敌人的军事进攻，把政治斗争同武装斗争、谈判斗争同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②这就是说，在对敌斗争中，不仅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而且要采取和平谈判的政治斗争形式。在进行这种斗争时，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选择有利的时机，既不是不看客观条件而拒绝同敌人谈判，也不是随随便便地去同敌人谈判。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反动派为了争取时间发动内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5页。

战，企图利用当时广大人民的和平愿望，通过谈判使他们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的阴谋是：如果我们拒绝谈判，就把破坏和平的罪名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接受谈判，就乘机布置内战。我们党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这一行动反映了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党充分做好了击退敌人进犯的作战准备。这样，通过政治谈判，既表明了我们的和平诚意，又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欺骗阴谋，教育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解放战争做好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并且，在同敌人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紧密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必需把立足点放在武装斗争上。谈判斗争和群众革命斗争，必须把重点放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上。毛泽东指出："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不会发善心的。"① 又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② 同反动派谈判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不是依靠谈判，而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谈判的局面只有在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出现。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是不会愿意同我们坐下来进行谈判的；即使坐下来同我们进行谈判，要取得谈判的胜利又必须直接依赖于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例如重庆谈判得以进行，就是和绥远、上党、邯郸等自卫战役在战场上的胜利分不开的。上述几次战役，共歼敌十一万多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及其内战阴谋，事实证明，只有把立足点放在武装斗争上面，才能立于不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0、1105页。

败之地。如果我们没有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作好了打的准备，就不能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粉碎他的进攻，就不会有1949年全国解放的胜利。

第三，在和平谈判问题上，毛泽东从维护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地论述了坚持原则和作出必要让步的关系，提出了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在同敌人谈判的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保卫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容许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某些必要的让步。在重庆谈判中，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国民党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妄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我党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曾经作了某些让步。比如，曾主动提出让出南方的八个解放区，这样，就给国民党宣传机关制造的"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的谣言以粉碎性的打击，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很大的主动。他在谈到这些让步时指出："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同时，他又指出："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①比如，对于除南方八个解放区之外的其他广大解放区，我党在先后提出的四个方案中，始终坚持必须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这一原则，坚决不把它交给国民党。因为，解放区的革命政权，是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是人民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的保证，是人民继续发展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强阵地。毛泽东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0页。

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们作战。”关于人民军队问题，我们也同样作了一定的让步，即同意我们军队作一定缩编，重划军区，国共两党军队的比例可为七比一。但是在军队由谁来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我党始终坚持它必须是人民的军队，它必须保持在人民手中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历史的发展证明，正是因为我党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始终坚持了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保持住了革命的武装和解放区的革命政权，才能在以后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的人民实施武装进攻时，用革命的武装和它对抗，并彻底粉碎反革命的武装力量，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还强调，要自力更生，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国际支援，来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第四，在如何对待和平协议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论述了既要信守谈判中已经达成的协议，又要同时保持高度警惕的指导思想。对于在和平谈判中已经达成的协议，毛泽东认为，既要坚持执行业已达成的协议，继续争取和平，又要高度警惕敌人的内战阴谋，坚决回击敌人军队的进攻。在我党和国民党《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即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②毛泽东还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阶级本质的分析，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果然，《双十协定》刚一发表，蒋介石就动员了一百二十七万国民党军队和五十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7页。

②同上，第1102页。

七万日伪军在十一个省的范围向解放区进攻。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诺言"的虚伪性。他绝不会也不可能因为协议的签订而放下屠刀。因此，我党在执行协议的同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揭露反动派，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进攻，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毛泽东指出："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的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①

实践证明，我们党对待和平协议所采取的上述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我们党始终信守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保持高度的警惕，没有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没有因为签订《双十协定》而放弃斗争，因而才能在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时候，处于有准备的状态，能够用革命的战争粉碎他们的反革命战争。

三、进步的光明的历史总趋势

如上所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围绕着建什么国的斗争进行的。国民党反动派要使中国继续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要把中国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围绕着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展开了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揭示了进步的光明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去战胜美蒋反动派，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5页。

首先，毛泽东指出，分析形势要坚持全面的观点。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①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有政治的、军事的，有和平的、战争的，有合法的、非法的等等。国内形势，既存在着内战的严重危险，又有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对于美蒋反动派，既要看到他们早已定下了发动内战的方针，又要看到他们立即发动内战所面临的困难。当时有些人对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不理解，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们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去同他们谈判。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一定谈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②这就是说，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内战是肯定无疑的，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他感到要立即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已大大加强，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是不可小视的。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在全国的影响愈来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希望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愈来愈高。在国际方面，各国人民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和民主的斗争表示同情。这就使得蒋介石不能不邀请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说，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多方面的全面地看问题，采取多种的斗争形式，既作好战争的准备，又通过和平谈判斗争，揭露敌人，教育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才能争取主动，取得对敌斗争的胜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3、1103—1104页。

利。

其次，毛泽东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在谈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①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② 他透过对解放战争时期敌人表面上暂时强大的现象的具体分析，深入地揭示了反动派的腐朽本质和敌人必然灭亡、我们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他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③ 他还说："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④

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的宗旨把困难想的更多一些。有的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8、1109页。
③④同上，第1190、1161页。

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①毛泽东在胜利的形势下，总是同时指出困难，提出新的革命任务，这就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节　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战争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一次最后的和最光辉的战争实践。在这空前规模、决战决胜的伟大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过去几次国内革命战争相比较，解放战争的特点使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有新的发展，它的发展着重在以下三方面：

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由长期的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进入一个根本转折点。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也经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在这关键时刻，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人民军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敢不敢和能不能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式装备打败得到美国支援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思想。

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光辉思想的实施时期。与之相适应，在军事战略上从抗日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转入以运动战为主，辅以阵地战，最后转入几十万人大兵团作战的攻坚战、正规战。这就必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集1109页。

然使军事辩证法得到新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

三、这一空前规模的战争实践，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能动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此时更臻于理论化、系统化。

正是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便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于1946年7月公开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美蒋反动派仰仗其军事优势，气势汹汹，狂妄叫嚷“只需三个月至六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打败蒋介石，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而在当时，一些曾经参加过和平民主运动的投机政客，如张君励等人，迅速地投奔到反动阵营去了；一些好心的国内外朋友，对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能否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也抱有怀疑和忧虑；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迷惑，表现软弱无能，不敢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为了回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廓清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增强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对解放战争的指导，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

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总结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早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把这一思想正式概括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在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应当重视敌人。后来毛泽东又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等文献和讲话中，针对国际斗争的新情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战略和策略思想。

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的认识之上的。毛泽东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②]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成是纸老虎，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泥塑巨人"、"空架子"一样，都是从本质上讲的。从本质上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它们终究要被人民所推翻。可是，它们在未被人民推翻前，总是掌握着政权，掌握着武装，暂时还有力量，它们手里拿着刀，武装到牙齿，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垂死的挣扎。它们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屠杀革命人民，它们会吃人。这就显示出他们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

②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6页。

真老虎的一面。因而人民斗争事业不能不走许多曲折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分析了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指在整体上，全局上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恐惧敌人的思想，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他们。所谓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指在局部上，在每个具体问题上，要认真对待敌人，要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决不掉以轻心。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不被表面上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所吓倒，才能建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这是在战术上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做到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根本前提。如果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不敢与敌人战斗，那就根本谈不到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同时，也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每一个具体的现实斗争出发，实事求是地估计敌我双方的状况，投入优势的力量，采取有效的作战方法，争取每一战役战斗的胜利，才能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削弱敌人，使战略上藐视敌人有可靠的基础。如果只是提出革命战争的战略目标，不在每一个具体战斗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从而一步一步地争取胜利，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战略上藐视敌人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战胜敌人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和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过程。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了这一道理，他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

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是说，由真老虎到纸老虎是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反动力量的灭亡和新生力量的胜利，不是一个早晨可以实现的，而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才能实现。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这些思想，正确地指挥了各次重大战役，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蒋介石反动集团则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了。

毛泽东还指出，如果违背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统一思想，就必然产生右的或左的错误。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能推翻他们，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军（……），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党内错误倾向的产生正是这样。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力量，不敢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不敢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同他们斗争，犯了投降主义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斗争中急躁轻率，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急于夺取中心城市，不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革

命发展的形势，及时地反对和纠正了党内的某些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对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保证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二、十大军事原则与战略战术的新发展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他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而十大军原事则的基本内容却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撰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总结》等文章中，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十大军事原则是解放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新发展。

早在全国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向全党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他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规定了我军作战的各项基本原则，正确地指导了我军的作战行动。他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一文中着重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必须如此。”并强调指出：“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①这时，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暴露出战线太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毛泽东及时指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

"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一九四七年三月，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集团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党中央根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毅然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以便诱敌深入，待机歼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蒋介石对延安等地的"重点进攻"很快就被粉碎了。

经过一年的作战，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人，使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①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战略计划，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②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③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总结了解放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4、1187、1188页。

战争以来的作战经验，根据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统一了我军的作战思想，大大提高了我军的战略战术水平和作战能力，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列主义普遍原则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军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几十年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前期的作战经验，进一步研究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这样就形成了系统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并且，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充分显示了人民性，只能为我所用，敌人是无法运用的。

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突出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使原有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作战要求上，毛泽东论述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和保守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①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当然，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并不否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守城市和夺取地方，恰恰相反，保守必要的城市和地方正是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有利条件。毛泽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东说："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和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①这就是说，对于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和地方，该守而又能守的一定要守，该夺的一定要夺，只有这样，才利于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作战方法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歼灭敌人和集中优势兵力的辩证思想。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②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③并指出，这种战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④。只有打歼灭战，才能使敌人的人力物力不断减少，士气沮丧，越战越弱，才能够使我军不断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人心振奋，越打越强。但是，实行歼灭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因为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就无法对敌实行四面包围，不形成四面包围，再大的优势也难于全歼敌人。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⑤由此可见，集中优势兵力和打歼灭战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集中优势兵力是打歼灭战的客观要求，是实施外线速决进攻战的重要条件；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又是集中优势兵力的直接目的。例如，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进行的孟良崮战役歼灭敌人所谓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4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221页。
③④同上，第4卷，第1143、1141页。

“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例。从这个战例可以看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是量变质变的辩证法在指导战争过程中创造性的运用。

在作战形式上，毛泽东阐述了“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①这是毛泽东为我军作战形式规定的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力求运动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加强研究和运用阵地攻击战术，歼灭坚守据点和城市的敌人，夺取敌占据点和城市，以彻底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解放战争的新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②又说：“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的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③我军在1946年进行的苏中战役、定陶战役，1948年进行的豫东战役等就是以运动战取胜的。在解放战争的中期和后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在战略上转为守势，妄图据守重要据点和城市，阻止我军进攻，以便争取时间，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挽回其败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必须以有力的阵地攻坚战来配合运动战。我军正是由于贯彻了毛泽东这一军事辩证法思想，既在运动中大量歼灭了敌人，又攻克敌人许多坚固设防的城市，加速了全国的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作战方向上，毛泽东论述了夺取乡村和中小城市与夺取大城市的关系。“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1131、1143页。

城市”[①]这一作战方向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在作战方面的具体体现。攻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同攻取大城市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方面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可以为攻取大城市创造条件。因为夺取中小城市和乡村，可以不断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敌占的大城市就会陷于孤立，易于为我最后攻取。另方面，攻取大城市，是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必然发展。我们要全部消灭敌人，就得彻底摧毁其赖以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巢穴。

在选择作战对象上，毛泽东论述了打分散孤立之敌和打集中强大之敌的关系。“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先选择弱敌打。先歼灭了分散和孤立之敌，集中和强大之敌就会失掉掩护而处于孤立地位。同时，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容易使我军形成绝对优势，实行四面包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为我军歼灭集中和强大之敌创造条件，以便从根本上打败敌人。我国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在攻城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辩证思想。他说：“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②]这就是说，夺取攻占据点和城市，必须对敌人的守备程度和我军的攻坚作战能力等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对守备之敌区别对待，先弱后强地予以夺取，把我军的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战斗作风上，毛泽东论述了作战与休整的关系。他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② 同上，第1192页。

连续作战（即在短时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①同时又指出：“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②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是我军优良战斗作风，而为任何反动军队所不能有。有了这种战斗作风，就能够坚韧不拔，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敌人。但是勇敢战斗、连续作战，并不是不要休整。“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部队，经过一段作战之后，必须进行一定的休整。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总之，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所阐述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出发，它们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三、坚持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运用于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在论述十大军事原则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有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1192、1192页。

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是反人民的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还指出："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军队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① 三年来解放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参战，我军才能如鱼得水，完全主动地作战；正是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参战，才能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付敌人，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和瘸子，迫使敌人发生过失，就我范围；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参战，才能使我军的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在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实行高度的机动，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参战，我军才能有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补充，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不断提高战斗力。可见，只有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充分发挥我们政治上的优势，弥补武器装备等不足，取得战争的胜利。仅从著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来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在辽沈战役中，有三十多万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在淮海战役中，有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战斗；在平津战役中，有几十万华北民兵直接参战。三大战役中，各地支前的民工达五百多万人，担架十万多副，大车三十八万多辆，牲口一百多万头，粮食九十五亿多斤。其中淮海战役就有支前民工二百二十五万人，担架七万七千九百副，船只一万三千六百三十只，汽车二百五十辆。事实证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

毛泽东不但论述了实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而且为组织人民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他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①在农村中，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雇农和贫农，团结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中农；另方面，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城市中，除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配合农村的土改运动和全党的整风运动，还特别在人民解放军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②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和实施，有力地促成了从军官到士兵、从军内到军外、从乡村到城市、从解放区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发动，充分发挥了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淹没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战争的海洋，赢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②同上，第1189页。

第三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在解放战争后期，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围绕中国革命发展前途问题的斗争，变得突出和尖锐起来。我国统一战线内部的一部分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张中国革命应当走改良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国共两党之外走英美式资本主义道路；而美国统治集团则公开发表《白皮书》，肆意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把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前途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中国革命胜利转折时期的表现，也是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严重思想障碍。为了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廓清革命发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器，对“第三条道路”和美国《白皮书》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全面地和深刻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未来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发。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胜利。

一、第三条道路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

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是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或第三条道路，就是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切实际的。它开始提出时，在向国民党

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当新中国建立在即，国民党又解散了民主同盟之后，再标榜中间道路，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了。

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中间派是一个范围较广，成分复杂的阶层，其中多数是坚贞的民主战士，即所谓中间偏左分子，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也有一些中间偏右的新旧政客，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对第三条道路及其唯心史观的批判属于中国共产党教育和争取中间派，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的一种思想政治斗争。事实上，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绝大多数中间人士，后来都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时代的条件和本身的国情，根本没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按照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不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决定中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否则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提倡中间路线的人却主张既不走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提出经过改良的道路，实现美英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这种主张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经济上不能独立发展，政治上又受排挤，因此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与工农群众有矛盾，害怕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采取中间态度，幻想走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出现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就打起过第三条道路的招牌。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的“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中间道路的主张。他们幻想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和执政的直系军阀的承认和支持，上台组织政府，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人，提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① 这也是在标榜中间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既不满意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也不赞成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幻想在国共两党、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斗争之外，走所谓“第三条道路”。邓演达、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即所谓“第三党”，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新军阀，又不同意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既不能属于蒋介石或改组派的国民党，也不能属于共产党，而是属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拥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条件下，实现“民主”“自由”“独立”的愿望，但是随着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的加剧，他们的愿望已成为泡影。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中间路线的主张一度活跃起来。中国历史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了各派政治力量注目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积极地宣传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今天中国既不能走旧式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便只有我们自己的中间的改良道路”。“中国今天不仅在国内应当走中间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道路，在国际上也应当走中间道路。只有在国内能够走中间的道路，在国际上才能走中间的道路。国内国际的中间道路，就是和平的改良道路。”①换句话说，他们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

在建国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它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历史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已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提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首先，帝国主义国家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作为它们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因此，帝国主义既不允许这些国家顺顺当当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去同它们竞争，也更不可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也不允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百年来饱经风霜的中国人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既不能救国于衰亡之危，也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吸取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不仅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

①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主义的奋斗纲领，因此决不允许历史的车轮倒转；再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出现过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国民党统治集团破坏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堵塞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可能。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介石集团，决不会放弃独裁统治而接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些都说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又说，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①

中间路线的唯心史观一个重要观点，是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的道路，另一条是暴力革命的道路。”“改良的道路是今天中国一切中间派所要走的道路，因为中间派在本质上是改良派。同时，改良道路又是今天中国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所应走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在今天正是代表整个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②他们一再说明“不赞成暴力的革命行动”③，“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不可参加中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②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报。

③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共的军事行动”①。他们还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说什么“历史上所有的革命皆会遭遇的一种矛盾，即从革命的动力上说，必须诉诸感情的冲动，类乎发狂那样。”“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换言之，即成就太少而浪费太多”。②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反对暴力革命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一面讨厌旧秩序，不满意蒋介石统治，一面又害怕大革命，不想去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因此，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中间，希望统治阶级让步，调和阶级矛盾，企图在不触动蒋介石封建法西斯统治基础的范围内，求及微小的社会改良。这种理论是一种违背了阶级斗争规律的唯心史观，在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针对这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路线，毛泽东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的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的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选择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

①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8日。

②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1948年7月初版。

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什么‘中间路线’。”①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这是对中间路线的和平改良道路的有力批判。

中间路线的唯心史观，还表现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上。他们说：“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强大独立的地位，不仅对于促进和平可能‘有决定的作用’，甚至对于实现民主也可能有‘决定的作用’。”②又说：“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全、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③他们还一再表示，中间势力对整个社会历史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针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中间路线“看不到人民，认识不到人民的力量，是由于对历史尚少正确的了解，对人民的苦痛和要求尚少深刻的了解”④。中间路线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其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社会基础狭小，政治上软弱无力，因而不可能成为“解决当前政治问题”的决定性的力量。中间路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唯心史观必然彻底破产。

二、毛泽东对美国《白皮书》唯心史观的批判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②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

③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④潘梓年：《谈民主须能认识人民的力量》。《群众》第13卷，第7期，1946年12月2日。

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经过三年时间，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所粉碎。到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已经消灭了中国大陆上国民党军的主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侵华政策宣告彻底破产。在这个时候，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混乱和严重争吵。以麦克阿瑟、周以德、诺兰为首的一派，谴责美国总统杜鲁门援助蒋介石太慢、太少（其实美援占蒋军费开支达50%以上），他们主张更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干涉中国，以积极军事行动参加中国内战。他们认为美蒋的失败是美国国务院政策错误的结果。而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一派则不服，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对华援助不力之处，他们强调美蒋的失败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并非美国政策的错误。他们认为，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是客观形势所不许可的，最好的法子是采取迂回的战略，通过扶植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搞"第五纵队"来破坏中国革命。为此，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

《白皮书》主要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止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白皮书》的发表，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若干反革命真相，在客观上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供状和其反动政策在华惨败的记录，也是其唯心史观的彻底暴露和破产的记录。

《白皮书》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编造了一套近百年来中美两国"友谊"的史话，

把美帝侵略中国的历史说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史。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说：“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尽管距离及背景上的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是结合中美两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业上和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这种友谊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善意措施予以证明，诸如利用庚子赔款供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内的废除治外法权，战时和战后的广泛的对华援助等。这个记录表明，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种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①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把侵略说成是“友谊”。

其次，它歪曲中国近代史，把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口过多和外来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是白皮书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艾奇逊说：“在形成现代中国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国民党曾企图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的则遭忽视。国民政府在今日所面临的难境，大部分正是因为它不能使中国有充分的粮食。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主要是关于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种种诺言。”②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观念的冲击”。他说：“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高度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

①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29—30、30页。

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十九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些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为以前的外国侵入者所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因为这些特点，一部分因为满清统治的衰微，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和不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是二十年代初期在俄国革命的观念形态的影响下组成的。”② 意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是完全受外来观念的影响，由外因所决定。

再次，它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示继续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敌到底，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表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美国政府公开厚颜的宣称不可能“不干涉中国内政”。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强权政治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

对于这一点，艾奇逊说：“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1. 完全摆脱一切牵连；2. 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3、一方面援助

---

①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31页。

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①在这三途中，艾奇逊说：“第一途，我相信那时美国的民意也如此感到，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的努力以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及我们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第二途，在理论上和回顾起来可能引人心目，却是完全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望。在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之过去任何时期为强大，且已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部队的无能，这点后来可悲的表现出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可以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允许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后让我们的军队负担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途。”②艾奇逊还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还表示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

美国白皮书发表以后，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和讨论。毛泽东于1949年8月至9月为新华社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这些评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一，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之基本观点，揭露了美国对华

①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5页。

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他指出，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从鸦片战争开始，所有资本主义强国其中包括美国竞相侵略中国，在中国封建势力的配合下，贪婪地从数万万中国人民身上吸去大量的膏血，对中国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针对艾奇逊们编造的所谓“友谊”的诺言，毛泽东尖锐地揭露说：“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① 近百年来，美帝国主义一贯执行着侵略中国的政策，它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或参加了多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侵略活动。一八四四年，中美两国签订了《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共34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它除了强迫中国开辟五口通商以外，还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就是搞精神侵略。一九〇〇年，美帝国主义公开出兵参加帝国主义同伙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订立卖国的辛丑条约，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所谓“供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实际上从事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出于“国际责任”及“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又拿出四十五亿余美元，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国内战争，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从惨痛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美帝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主义的这个所谓“友人”，恰恰是仇敌；艾奇逊所说的“友谊”，恰恰是侵略。

毛泽东特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更注重精神侵略，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①据材料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设立的。从一八四四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经营了一百多年，其目的不是别的，都是为了侵略和征服。

毛泽东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性，指出：“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②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是称霸全世界。正因为它有如此大的野心，所以才在日本帝国主义被赶走以后马上跟了上来，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妄图一举占领中国这个亚洲的战略中心。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正如艾奇逊在他的信中所说：“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1428—1429页。

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①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的失败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确系无奈何之事。

第二，毛泽东批判了《白皮书》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唯心史观，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等基本观点，对艾奇逊编造的中国革命发生的两个因素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泽东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②这里毛泽东指出了阶级矛盾和斗争、阶级压迫和剥削才是引起社会革命的真正动因，而根本不是由于“人口过剩”。他还正确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是因为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北伐战争之所以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7—1448页。

的反革命首领；国民党统治区的失业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三座大山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落后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广大人民处于啼饥号寒的极端贫困之中。所以，不是人口问题引起革命，而是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才能把人口纳入有计划的生产轨道，只有革命才能解决旧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还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替中国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历史辩证法。他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①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② 除上述的中国革命的物质条件外，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1—1422、1450页。

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①

毛泽东从矛盾论关于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基本观点出发，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出发，批判了艾奇逊的所谓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西方的观念的影响”的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观念决定论。他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②同时他也阐述了由于中国具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客观的革命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革命所发生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固然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就是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也和封建主义思想武器一样，又是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了产。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1、1451页。

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但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①帝国主义暴力侵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使中国国家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数万万中国人活不下去，这就是中国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则是这个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阐述了人民和敌人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逻辑。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它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胜利的人民仍然要继续进行捣乱。他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②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2页。

②同上，第1423—1424页。

即帝国主义的本质、本性出发所作的科学分析，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腐朽力量的行动规律和历史命运。

毛泽东在总结人民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还阐述了人民的逻辑，即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他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① 革命的事业必然经历着艰难困苦和挫折，人民的斗争必然出现弯弯曲曲的道路，但是人民经过反复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必将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革命的逻辑。

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和其他论著中对美蒋反动派的唯心史观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唯心史观所进行的批评和教育，澄清了当时许多人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念和糊涂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第四节　揭示民主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深刻地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论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客观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必然性，提示了一系列实现革命转变的理论、政策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和工作方法的理论。

一、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

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我国的革命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形势的变化，揭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领域中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地揭示并论述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主要矛盾。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我们党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揭示了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和相互斗争的必然性，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并存，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发挥其历史作用。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为基础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分；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则具有两面性，既有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面，又有有益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面，对它必须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早在1947年12月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① 因此，在1949年全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中，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对于广大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则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经过合作社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的五种经济成分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那样，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②

其次，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反映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相联系，在政治上主要存在着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8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7页。

专政的国家政权。由于过渡时期这种特定的阶级结构，由于工人阶级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定的历史任务，因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在政治上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①

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②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③与此同时，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变得更尖锐、更复杂了。搞得不好，我们的政权会得而复失，就会失败。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否则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1370、1364—1365、1365页。

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①这就告诉我们要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认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特点，自觉地有效地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针对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毛泽东在进城前夕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强调要加倍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企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②他教导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努力。

为于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为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以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等项重要规定。

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分析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进一步丰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②同上，第1376页。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论的思想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否定革命发展阶段的“一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发展阶段凝固化、绝对化的“二次革命论”时，曾经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思想，提出并论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把整个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明确指出，我国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两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革命转变论的思想。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不仅明确指出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而且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他指出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明确告诉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为了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任务，使全党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好了充分准备。

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分析了旧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的状况时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政策，以保证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首先，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中国的现代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其次，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还必须尽可能利用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又必须采取限制的政策。如果放任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和无限制发展，这是错误的；反过来，如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多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主义，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再次，对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是错误的。没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8页。

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必须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能最后地解决。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出发，从对现有的经济成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出发，此时已基本上规划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和颠覆活动；注意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

在外交上，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宣传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于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不改变其敌视态度，就决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既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等等。

这些理论、方针和政策，指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保证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转变，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转变。

三、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根据革命转折关头和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移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进一步运用于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的方法。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局面下，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迎接全国胜利后各条战线极其艰巨复杂的新任务，而在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制度方面作出的保证。

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①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同时他还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②一切重要问题都应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之后，然后分别执行。强调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的方法，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的新发展。在"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的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决策的正确，必须加强党委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党的领导正确，根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2、1283页。

本条件之一就在于它是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但是，强调和坚持集体领导，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形象地把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比作“班长”和“一班人”的关系，同时强调党委要保持团结，书记和委员之间互相谅解和支持，要“互通情报”，“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一班人”动作整齐，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才能确保党的路线和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和执行。

针对全国胜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毛泽东强调，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还要处理好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不懂得的东西要向下级学习，没弄清楚的问题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① 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委的决策和命令有可靠的根据，才能保证党委领导的正确。他还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②毛泽东还强调党委领导必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

第二，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关系的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阐述了抓中心“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和工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1页。
②同上，第4卷，第1770页。

作方法。

针对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胜利后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任务的新变化，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全国胜利后还会增加。“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① 领导工作要善于在工作繁多、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区分主次、轻重、先后、缓急，进行适当安排，集中主要精力抓好中心工作，解决重点问题。那种不分主次地平均使用力量的工作方法，是形而上学均衡论的表现。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决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次要矛盾。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中心工作。因此，应该在抓住主要矛盾、做好中心工作的同时，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比喻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②“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③ 因此，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要互相配合，不能只抓中心工作，而忽视或放弃其他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防止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工作方法，也要注意防止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以中心工作代替一切其他工作的“单打一”的方法。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②③同上，第4卷，第1380页。

毛泽东认为，做好中心工作以带动其他工作的方法，不仅要在认识上明确，而且要在行动上抓紧。他指出："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①他还说，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抓紧，样子象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所以"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②。

第三，运用质和量辩证统一的原理，阐述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③这也是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学会领导经济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要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质，而且要认识事物的量，从质和量的统一上加以把握。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不仅注意敌我军队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十分注意数量上的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有关军事著作中，用较多的篇幅对敌人兵力的分布，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进行基本的数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时，还要认识到，一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一般的数量关系，而且要从一般的数量关系中找出基本的数量关系，即要"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旧中国的经济状况，指出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④同上，第1150页。

右。他紧紧抓住这两个百分比，并从这一情况出发，制定了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后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可见，掌握事物基本的数量关系和主要的百分化，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制定正确的政策，有重大的意义。

在把握事物数量关系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①所谓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一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的关节点。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事物的性质就起了根本变化。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界限。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土改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这个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决定中农和富农的数量界限。有了它，就有了执行政策的准则，在土改中就可以贯彻执行好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路线。

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②因此，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和坚持胸中有数的科学方法，从而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重视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在我党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方法。在全国胜利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又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②同上。

还是要发生问题”。上述健全党委制、加强集体领导、抓中心、“弹钢琴”和“胸中有数”等领导方法的提出，既丰富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理论，又加强和改善了党在新时期的领导，保证了历史转折关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

第五节　建国前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建国前夕，国家问题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课题。如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样，毛泽东也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形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一、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既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指导纲领。

如前所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反抗阶级压迫，曾经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长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期的英勇斗争，但是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民没有自己的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民有了自己的民主政权。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①如果没有这个法宝，或者有了这个法宝又把它丢了，那末，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对这一政权的领导而言，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制度或政权组织形式，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创造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这种政权以工农兵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为民众政权的形式，“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②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这种政权形式的实质，只看到当时实际参加政权的成份只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认为这个政权不必担负在政治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中间成分的任务，甚至还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实行过“左”的政策。毛泽东同这种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1440页。

②同上，第1卷，第58页。

"左"的错误进行了斗争，他指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①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党认为必须实行政治策略上的转变。毛泽东根据党中央决议，提出了把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对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及其各项政策作了充分的说明。他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②因此，我们过去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府，"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③这就是说，把我们的政权由过去的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扩大到包括非劳动人民——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毛泽东强调指出：这种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不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④在这里，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共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9页。
②③④同上，第144、142、145页。

国的政权性质及其各项政策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具体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权，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①又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②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已基本成熟，它的内容和理论体系也已初步形成，人民民主制度已经在广大的人民解放区付诸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提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③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637、699页。

③同上，第4卷，第1314页。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①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辉著作。他在这篇著作中，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也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二、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人民民主国家即将建立前夕，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上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和各个不同国家的特殊本质，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以及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②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国家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都是一种暴力机关。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一种革命的暴力，是无产阶级用来维护人民利益，镇压国内反动派的工具。这是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无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1375页。

②同上，第1413页。

阶级专政的国家，除了具有这个共性以外，还具有同以往剥削阶级国家不同的特殊性。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阶级对绝大多数被剥削阶级所施行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广大的被剥削阶级对少数反动的剥削阶级所施行的专政，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专政，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专政。毛泽东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①这就指明了革命的专政同反革命的专政、革命的暴力同反革命的暴力的根本区别。反动派竭力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是"独裁"、"极权主义"等等，毛泽东严正地回答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②历史的辩证法证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没有革命的专政，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专政。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辩证关系。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群众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组成自己的国家，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于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人民民主专政由相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页。

②③同上，第1412页。

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民主只给人民而不给敌人，专政只能对付敌人而绝不能对付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反动派和反动阶级实行强有力的专政；也只有对敌对阶级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他们的一切反抗和破坏，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才有保障。对人民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对敌人的专政只能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和理论，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的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贡献。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全面论述了各阶级在人民的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要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①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离开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他指出："人民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与其建立巩固的联盟，用工农联盟的力量去战胜一切敌人。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②

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还论述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的基本经验之一：“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③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很小，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是，这个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1416页。
②同上，第2卷，第606页。
③同上，第4卷，第1409页。

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①。

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和职能。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和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同一切旧思想开展斗争，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的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次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一或几次大规模的战斗，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但是不能没收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意识形态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会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克服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旧思想、旧习惯，提高思想觉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必须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②。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做经济工作，不但会革命会打仗而且会建设。最后，人民民主专政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②同上，第4卷，第1414页。

国家还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民主。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民主，才能使我们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

四、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消亡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深刻论述了阶级专政同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渐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①这就是说，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但是，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又是有条件的。"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但是，现在还不能"消灭国家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针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消灭国家权力"为借口来阻挠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诞生的企图，鲜明地指出，关于要不要"消灭国家权力"的问题，"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页。

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从长远看，阶级、政党、国家是要消灭或消亡的；从现实来看，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又必须加强。想要消灭它，必先加强它，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证法。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当前我国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虽然已经消灭，但是同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相联系的各种敌对分子还远远没有消灭，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因此，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为了取消这种专政准备条件。

毛泽东在我国建国前夕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制度的性质、职能和任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阐发。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崭新贡献，它为我国建国以后国家制度的建设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1413页。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第２卷
作者＝
页数＝６８８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历史条件
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面经验的哲学总结
二、分析和解决抗日战争空前尖锐和复杂的矛盾的需要
三、三十年代国内新哲学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前提
四、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和几本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哲学活动
第二节　　《实践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一、对实践范畴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发
二、全面和集中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第一的地位和作用
三、深刻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四、明确提出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
第三节　　《矛盾论》的基本内容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一、全面、深刻地阐发了“矛盾”概念
二、明确提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
三、系统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
第四节　　《两论》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对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理论总结
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三、提供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宝贵经验
第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展开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一、揭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分析“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
二、唯物辩证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
第二节　　运用矛盾转化原理提出军事战略的转变
一、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客观依据
二、正确处理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辩证关系，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第三节　　论述抗日战争中诸矛盾的辩证关系
一、战争与政治
二、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
三、防御与进攻

四、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
五、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
六、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四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决定力量
二、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
三、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第八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运用和展开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哲学思想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三、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四、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阐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丰富和发展
一、毛泽东伦理道德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
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的伦理思想
第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
一、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一个伟大创造
二、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革命文艺领域中的运用
四、刘少奇对王明主观主义的批判
五、《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主观主义的总清算
第二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过程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命题的丰富内涵
第三节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历来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重视哲学原理或思想路线转化为方法和工具的功能和作用
二、整风运动不仅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要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三、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过程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过程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条件及意义
第十章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及其哲学基础
第一节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及其唯心主义哲学
一、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化、系统化。《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唯心论哲学的批判
一、对《中国之命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
二、对唯生论的批判
三、对力行哲学的批判
第三节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府》的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
二、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客观依据
三、唯物辩证地分析了两种可能性，论述了争取光明前途的条件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新中国制定革命纲领提出战斗任务
五、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为实现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而奋斗
第十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哲学分析
一、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二、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三、进步的光明的历史总趋势
第二节　　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二、十大军事原则与战略战术的新发展
三、坚持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第三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一、第三条道路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
二、毛泽东对美国《白皮书》唯心史观的批判
第四节　　揭示民主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一、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
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思想
三、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五节　　建国前夕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一、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二、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辩证统一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
四、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消亡